

人性的超越

安子 著

深圳社会 索录

100万临工大扫描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凡益
封面设计：赵学青

ISBN 7-80542-680-5/I · 18
定价：6.20 元

深圳社会启示录(纪实文学系列之一)

人 性 的 超 越

——100万临工大扫描

安 子 著

海 天 出 版 社
(中国·深圳)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曾凡益

装帧设计 赵学青

人性的超越

——100 万临工大扫描

安子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深圳)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7.1 字数 146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542-680-5/I · 164

定价：6.20 元

深圳社会启示录(纪实文学系列)

主 编：杨作魁 曾凡益

**图书特色：推介深圳热点 实录特区真情
横断社会丑恶 褒扬人间正气**

内容提示：

《人性的超越——100万临工大扫描》

100万有志青年，冲破种种世俗偏见，从祖国的大江南北奔赴南国边陲，投身经济特区建设，掀起了当代中国一股“人口大迁徙”的热浪。这些被称作打工仔打工妹的青年临工，以他们的奉献精神和辉煌业绩，展示了自身的生命价值，揭示了青年的人生真谛。

《都市浪漫曲——特区歌舞厅内幕》

深圳特区歌舞厅内，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它既是艺术家们献歌献舞的文艺舞台，又是深圳市民调节紧张生活的娱乐场所；它既是万千青年临工丰富工余生活的好去处，又是少数不法分子寻欢、肇事的发生地。欢乐背后有哀怨，云团前面是撒满金晖的阳光。

《暴涨的身价——房地产市场探秘》

炒卖房地产，被人们认为是当今最快最易最无风险的发财之路。于是，从深圳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中城市，涌现了一批专事倒卖房地产的“炒爷”。他们用自己的甜酸苦辣，编织了一串串传奇和幻想、故事与现实，有的终于成

了身价暴涨的“大亨”。其秘诀，尽在书中。

《理性的复归——“8.10”股市狂潮追击》

金钱的魔力，驱使数十万人涌上街头，相互争斗。有人贬斥他们是丧失理智，行为返祖；也有人褒扬他们是驾驭时局的弄潮儿，为精明之举。股市狂潮的是与非，功与过，固然还有待历史定评，但它为股份制企业插翅添翼，给一部人带来丰厚的实惠，乃是十分清楚的。

《黄金街寻梦——“中英街”时空跨越》

祖国的神圣领土，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屈辱。在近百年中，沙头角“中英街”，两种制度、两种势力大搏杀。人们送走了葬身大海的逃亡历史，迎来了黄金满街的辉煌现实。

《铁血雄关——海陆空缉私档案》

辽阔而漫长的边防线，神秘又庄严。走私与缉私，偷渡与反偷渡，在空中、地面及海上进行，使得国门内外“无声的战斗”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这里有美与丑的较量，有正义与邪恶的搏斗，有生死予夺的抗争……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流浪者的舞蹈	(7)
1. 特区屋檐下	(8)
2. 旋转的都市	(28)
3. 千厂百楼走遍	(48)
第二章 烟火人间事	(63)
1. 宝安的天空下	(63)
2. 水一样的蛇口女孩	(91)
3. 深圳打工族咏叹调	(107)
第三章 在靠近太阳的地方	(127)
1. 一个传奇或一个梦	(130)
2. “我愿是一株木棉”	(146)
3. 白衣使者传福音	(153)
4. 敢问路在何方	(162)
第四章 百万临工忧思录	(185)
1. 炒鱿鱼这道菜难吃	(186)
2. 押金的妙用与身份证件的异化	(189)
3. “罐装沙丁鱼”与“胜利大逃亡”	(192)
4. “无形杀手”在游荡	(195)

5. 半夜惊梦几时休	(201)
6. 老板姓“赖”,工人姓“欠”	(204)
7. 谁是赢家	(209)
8. 希望在人间	(213)
后记:深圳是一棵月亮树	(218)

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从北到南的大移民，都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三国以前，最富庶的地区是黄河流域，长江以南的地方还是刀耕火种。到南北朝时，因为北方的战乱，加之南方地广人稀，北方劳动人民带着先进的生产经验大量南迁，福建、广东和广西等蛮荒之地始得开发。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日之中国，倒过来了，最富庶的地方是大陆的南端——珠江三角洲及沿海诸省。大约起始于 70 年代末期，80 年代的初叶，沿着深圳到广州，深圳到惠阳的两条大动脉展开的几百公里的扇面上，几年之内，忽然冒出了几千家外商独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经营电子、成衣、手袋、玩具……等来料加工的工厂。因为南方的相对富裕，中国再一次出现从北至南大“移民”的历史现象。

在深圳市计划局、工商局的档案里有这样几组数字：

1982 年深圳人口 70 余万，其中外来临工 40 余万。

1985 年深圳人口 130 万，其中外来临工 75 万。

1991 年，深圳人口 238 万，其中外来临工 140 万。

深圳的外来临工竟占人口总数的 1/2！一个流动的城市，一个新组合的城市，一个“移民”的城市。

20 出头的年轻人，被诗人们比喻为“一群不安分的太阳”。

他们不愿意守在一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忍受着常年的劳累和贫困，总想挤身于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闯荡一番，痛快一番。

于是，一条颇有诱惑力的路就展现在他们的面前。在这条路的尽头，是一片金光闪烁的黄金海岸。

他们来到了深圳。

整整 12 年，他们用双手——几十万双手，把《羊城暗哨》影片中的那个小小渔村，建设成一座现代化城市。

圣西门说：“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这是多么壮丽的事业，这个目的有多么伟大！”

不知道这位社会主义空想家当时有多么激动，想象有多么美好。对着眼前一群群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的人们，你不得不承认：没有他们的辛勤汗水，改革开放下的经济特区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这民工潮，经济潮，使人不禁想起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工业靠拢那种惊心动魄的场景。20 世纪 90 年代的今天，这浪潮将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他们的劳动给城市繁荣带来了活力，给大千中国农村播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

1993 年 1 月 22 日，《深圳特区报》头版报道了新华社记者的传真照片《包机暖人心，打工妹飞家乡》：

“春节前夕,深圳有数千打工仔、打工妹,包乘专机 20 余架,喜气洋洋地返故乡。这是深圳特区建立以来,在春运期间出现的新鲜事。

去年,深圳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一些企业的负责人为了使在深圳工作的打工妹、打工仔安全、快捷、舒适地返回故乡,免受火车、汽车长途劳累,用包机送职工返乡欢度春节。浙江肖山市投资深圳的企业——深圳东亚纺织有限公司的职工近 2000 人,大部分是肖山籍的女工,公司包了中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客机 6 架,使 600 多名女工当天就回到家乡。肖山市投资深圳的另一家企业——深圳中丝绸服装公司为职工包了客机两架。四川投资深圳的一些企业也用包机送职工回家乡。”

深圳,这些默默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打工仔、打工妹,正在受到大家的重视与关注。伴随特区经济的发展,深圳百万临工大军,大大超过全市常住人口。有人将临工比作小草,比作“铺路石”;也有人认为,如果深圳是一头开荒牛,那么构成其骨架的是干部、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正式人员,而浑身的肌肉、血液就是临工;更有人断言,没有临工,便没有特区经济的繁荣!

1991 年 12 月 15 日一早,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关涛大姐,在市妇联主任张宝琴和南山区委书记虞德海的陪同下,来到了蛇口华丝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制衣六厂,当关大姐得知厂长余志琴是从打工妹中成长起来的时候,便紧紧握住她的手问长问短。从工厂的生产情况,到她的工作、学习、生活及婚姻问题,都问得十分详

细。她听说余志琴的每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上时，高兴地拍拍她的肩头说：“你创造的价值高，收入也应该高。”

从华丝厂出来，关大姐来到了广进化工厂女工宿舍。她敲开了一间打工妹的房门，毫无准备的打工妹们有些拘束。关大姐和蔼地问她们：“生活习惯吗？”“每月收入多少？”“寄钱给妈妈吗？”“有时间学习吗？”渐渐地，打工妹们活跃起来，一一作了回答。随后，关大姐弯下腰去，仔细地浏览了打工妹们的床头书架，并鼓励她们多看业务书，不断充实提高自己。关大姐来到另一间宿舍时，被女工们贴的座右铭及摆设的小礼物、小装饰器吸引住了。她对张宝琴同志说：“我们的打工妹是多么热爱生活啊！”

从女工宿舍出来，关大姐又来到工人俱乐部，与女工们一起唱起了“明天会更好”，然后又与打工妹代表进行了交谈。她说：“特区打工妹不是传言中那种低档次的，她们是充满理想的年轻一代，她们是用艰苦的劳动在创造美好的生活。”当听到张宝琴同志说将有几位女临工代表参加南山区和深圳市即将召开的妇代会时，关大姐高兴地说：“在下次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也一定会有特区女临工的席位。到那时，我们将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你们！”

“我们将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你们！”关涛大姐看望蛇口打工妹的一席话，在《深圳特区报》刊载出来后，引起 100 多万打工同胞的强烈反响！

从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到今天，深圳走过了飞速发展的 12 年。12 年的风雨里程，12 年的巨大成就，不仅为中

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而且其经济发展速度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惊奇。深圳,寄托着无数有志者的向往和追求,也凝聚着百万临工的青春和热血。12年来,百万临工伴随着特区的诞生而出现,伴随着特区的发展而成长。他们象布满苍穹的繁星,照亮了自己,也点缀了特区的星空,闪烁着璀璨耀眼的光芒,在特区政治、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毫无疑问,没有百万临工的辛勤劳作和无私奉献,就不会有深圳今天的辉煌;没有百万临工的献身精神,深圳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得到飞速发展和前进。

如果把深圳喻为激流勇进的航船,那么,百万临工便是辛勤的纤夫,充满冲浪的勇气。这支百万大军不仅为深圳走向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对中国整个现代化建设必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据《广东邮电报》报道:全国经商大军“下海”热点的深圳市,1992年通过邮政汇往内地的人民币高达44亿元。据分析,汇款业务急增的最重要原因,是深圳“三资”企业中的百万“打工仔”汇回家乡的汗水钱占汇款的比重较大。

12年来,随着特区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百万临工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他们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家乡,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特区建设中发挥了生力军和主人翁作用。他们大多数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几年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不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受到了锻炼和熏陶,而且在深圳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据统计,截至1992年12月,深圳市共有

外来工 160 多万。这些临工多数在企业从事生产、管理工作。他们在现代化工业生产管理中学到了知识、技术，也为特区创造了财富。许多外来临工成为技术业务骨干和管理骨干。深圳宝安 60 家外来企业中，生产技术熟练工 95.6% 以上是临时工，87% 以上的班组长由临时工担任。这里 3000 多家“三来一补”企业中，有 1000 多名青年临工当了厂长。外来临工为特区建设创下了功绩，同时带动了沿海地区和部分省市青年整体素质的提高，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发挥了“钟摆”和“穿梭”作用。江西有个县每月收到从深圳汇去的钱达 50 万元，这对当地脱贫和发展经济起了积极作用。12 年来，从特区返回家乡的临工约几十万人，他们带回了新的观念和现代文明，成为当地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带头人，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现代化建设。

第一章 流浪者的舞蹈

众所周知,经济发达地区的资金和技术向经济落后地区流动,而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则向经济发达地区输出,这是不可抗拒与逆转的世界性潮流。正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双向流动与交融,在 60—70 年代孕育和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奇迹。进入 80 年代,从沉睡中醒来的东方巨人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国门,大批投资者蜂拥而至,他们不愿放弃地球上剩下的投资宝地和最大市场。紧邻港澳,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珠江三角洲,首先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在短短的几年内,广东迅速崛起大批“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因此,就有了对劳动力和人才的如饥似渴的需求,南粤大地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寻梦者”。但是,流传起这样的民谣:“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于是,几乎每一趟南下的列车,都载来一批到广东闯世界的外乡人,旋即卷起了“百万移民下珠江”的打工潮。

1. 特区屋檐下

黄志忠说过“山里小伙闯海来”的故事。他总结道：深圳，有人把它称之为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要么使人沉没，要么让人游到胜利的彼岸。不管怎样，敢以涉足的弄潮儿还是纷至沓来——

门开了，一位风尘仆仆的小伙子出现在门口。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会拐弯抹角，一开口就直说：“我找工作——”

“嗯……找工作？”办公室里，一位理平头的官儿闪动着鼻梁上镜片的光芒，用一双令人难以忍受的怀疑目光审视着门口的小伙子。

小伙子汗水渍渍，浑身散发着一股酸涩的气味，即将裂口的皮鞋满是尘灰，腰间夹着一把饱经风霜的半旧雨伞，背上的兜兜把两边肩膀压得失去平衡。一看这副跋涉者的模样，便知道他从内地来深圳闯荡江湖的。正是！小伙子从蜀地山道而来，是刚从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本来，小伙子是南方一家单位特地到学校去要的，但是，当他踌躇满志地告别母校来到南方时，那个单位却把名额照顾给了熟人，说是名额已满，让小伙子自找出路。这当头一棒，是小伙子人生第一次的打击，仿佛一夜之间从阳光灿烂的天地坠入万丈深渊。20出头的他，人生地疏，两眼一抹黑，到哪里去找归宿？近一个月里，小伙子只

好夹着雨伞背着兜兜，东南西北瞎折腾。今天，这已是小伙子来南方碰的第 16 个门槛了。

“好啊，欢迎，我们这里正需要笔杆子呢。”那位理平头的从沙发上站起来，边说边顺手把那张刚刚看完的报纸递了过来，“好吧，既然是学新闻的，现在就请你根据这篇报道的事实，写一篇 500 至 700 字的小评论……时间嘛，45 分钟，开始吧！”

小伙子象死囚犯接到赦令似地，又惊又喜，顾不得放下兜兜，也来不及擦一下满脸的汗水，甩下雨伞，便象黄牛钻进青草丛似的扫瞄起报纸来。小伙子眉头一展，目光忽闪，疾地从桌上抓过几张稿纸，趴在茶几上便“唰唰”地写了起来。

趁着小伙子炮制文章之际，理平头的轻松地在来回踱着，不时描上几眼。嗯，浓眉大眼，身体壮实……

还没来得急盖上笔帽，小伙子便恭恭敬敬地把写好的稿子递到理平头的面前，忐忑不安地说：“……写得不好，请指教……”

“嗯，用了 35 分钟！”理平头的接过稿子看了看表说。

这时，小伙子才意识到还不知道对方什么官呢。于是灵机一动，走到办公室的门口抬头看了一下牌牌，慌忙折回身，从上衣口袋里摸出早已揣得皱巴巴的“红塔山”，说道：“副，副主任，您，您看行吗？……”

副主任眉头一皱，伸手把烟一挡，目光仍然没有离开手中的稿子，全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小伙子心里象揣了只兔子“嗵嗵”直跳：“糟糕，准是

嫌我的烟太低档了……”

“……嗯，不错！论点正确、鲜明……论据充分、准确……论证严密、合乎逻辑……”副主任平板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好吧，你先回招待所去，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对了，你把简历写一下，我和主任商量一下，我们一定负责向组织推荐。行不行，到时通知你。”

窗外，烈日炎炎；室内，空调风悠。小伙子心头热乎乎的，一双期待的眼睛闪着光芒。

“好，小伙子，祝你好运！”副主任伸出手握着小伙子手说。

回到招待所，小伙子正琢磨送礼的事。他想，副主任看似城府很深，讲话耐人寻味。这“祝你好运”——唔，想必大有文章！看来，今晚非扛“炸药”冲桥头堡不可！

一阵电话铃声，把小伙子从胡思乱想中震醒过来。

电话是副主任打来的：“小伙子，局党组同意接收你啦。人事部门要我转告你，请你回去尽快把档案转过来。……什么？我的门牌号码？表示点意思？告诉你，千万别搞这一套！我们看重的是你的人才，而不是钱财！你要是送了，不论多少，我们立即把你的档案退回去！懂吗？”

电话搁下了，小伙子倚在窗前，看见墙根已准备好的国酒名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望着眼前鳞次栉比的摩天楼群，终于得出了一条颤动心弦的道理：深圳，只相信本事！

第一次来深圳，激动、欣喜、茫然，20多年的梦似乎

都能在这片小小的边陲之城成真。

那时正是8月，深圳最烤人的季节。

没有更多行囊，T恤、牛仔裤和一双已穿好几个春秋的平跟凉鞋。背袋里挤着几件皱巴巴的衣裙，走在街头，仿佛欲把深圳倒回数年，显得那样格格不入。

在仅有的一位朋友帮助下，袁梦有了落脚处，余下的时光还够不上欣赏特区的旖旎风光，就挤身于如滚滚红尘般的求职大军。

在四川，作为记者的袁梦，生活多姿多彩。大学毕业，有了让人羡慕的工作，还有让人争得头破血流的二室一厅套房，收入虽不高，也够一个“单身贵族”过上小康，特别是那一帮能够彼此欣赏、彼此理解、彼此“侃大山”，然后呷自制“鸡尾酒”，然后念几句自编的歪诗，然后沉沉大放厥词理想梦想童话的穷哥们！还有一帮与她攻“托福”不知白天黑夜然后去了美国、澳洲然后寄回一张神气十足的某学院门前留影附有“死（誓）不返乡”的童年玩伴；更有被她劣制“鸡尾酒”灌得飘飘欲仙天天电话非她不要砍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的痴情郎君。

而这里，一切都是陌生，从那陌生的摩天大楼到匆匆撞过英俊得叫人发怵的陌生先生脸上冰冷的神情。没有特权，没有关系，没有父母的绿荫，也不再是“无冕之王”。

毕业证、结业证、记者证、身份证和个人简历等等凡是能证明身份提高身份的所有所有复印件，以及一张破旧肮脏、沉默寡言的地图“向导”，成了那个时期她朝夕相处、随身携带的忠实“伴侣”。

每天第一件事便是拖着鞋，打着呵欠，睡眼惺忪地走到街头小摊，买一份当天的《深圳特区报》，如饥饿的人搜寻面包扫遍报角每一个广告。梳洗，打扮，包装，焕然一新地端坐于每一位经理、副经理（含助理）、公关先生小姐、临时应付人、勤务工等等凡是可以接待她考她甭管她（他）有无经验有无职权负不负责管不管事的大人物小不点面前，她的态度永远是谦卑的，神情永远是虔诚的，微笑永远是真诚的。口才可以充分发挥，推荐绝不可以夸张太大，虽然烈日下的衣裙略散异味，浓妆下的面容憔悴难睹，袁梦始终以第一流的热情迎接每一位欲踢她出门的掌生死大权者。

8月的深圳，蒸笼般闷热，无风无雨无云丝，天空始终是湛蓝的。骄阳犹如一个肝火旺盛、易动怒气的魔怪，尽情地向人间倾泻他至高无上的淫威。阳光下的她，单薄、渺小，无助又无奈。肚子在叫，干燥的嘴唇已结了厚厚的壳，虽然满街都是冻冰箱冷饮店，可袁梦是绝对舍不得花一个子儿。实在熬不住，才用汗津津的手犹豫半天地掏出四毛钱，数了又数，既怕又希望能多数出几张，买一支最廉价的雪批，并在心里为自己如此“奢侈”而辩解不已。

记不清走了多少家单位，也记不清写了多少封信，红脸白脸笑脸冷脸见惯不惊。不理不睬可以稳坐泰山，“请你出去”就是“欢迎光临”，终于，某天等来面试电话。一位富态和气的港商接待了她，谈了半天也谈不上正题，精明的眼睛把她周身搜了个倒海翻江：“小姐，你很漂亮，很女人味，”然后一丝笑容浮在那张已不能算年轻的脸上，“只

要我愿意，可以马上录用你。”诱饵美丽迷人，可是“一月一千把元的工资不是太委屈你嘛，”袁梦心中窃喜，乖乖，这可是从前半年的数目。“行，行……”语无伦次，激动得不能自禁。“我可以给你买房。”哈！真乃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她懵懵懂懂，惑然不可理喻。他欠欠身：“我们就实话实说，你要多少钱一个月，开个价……”不知后面还有什么，她已逃到街上，在炎炎烈日下，又哼起：“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泊，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伤口，”她一无所有也就一无所求。

早餐绝对克服，中午晚上方便面充饥，然而本来所带不多的钱却一日少于一日，等待的工作依旧遥遥无期。

初到深圳，乘车也不知东西，常常邻坐的先生总想给你带来一份什么样的惊喜。而或故意用身子紧紧挤住你（8月的热浪在某种欲望下悄然退却），而或偷偷地，假装不经意地在你盖着裙子的大腿上轻轻摸一下，以满足他的说不清的某种感觉。袁梦就遇上了这么位先生。车一启动，他就开始魂不守舍地不时地扭头瞅她（不知在数次这种不正常的扭动下，他的脖子是否酸痛），结果慷慨地邀她共进晚餐，并许诺会赠她一个难忘良宵。这倒是一个富有诱惑的建议，特别是对一位极端孤独，极端失望，极端疲乏，极缺营养的小姑娘。然后他骄傲地翘起手指，向她晃晃那硕大的金戒指：“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袁梦笑了笑，故作天真状：“是黄铜吧？”他在下一站就下车了。

夕阳西下，深圳的夜生活伴着红灯绿灯霓虹灯而到来。袁梦踟蹰街头，茕茕一身。富有的先生和雍容的小姐

翩然而走，袁梦已疲惫不堪，是如此的近，却又如此的远，明天又如何？

在这里找工作，你必须具有“五心”：坚强的信心，打持久战的耐心，没有工作的开心，自得其乐的童心，遭人拒绝而不伤心。还必须具有“五劲”：缠劲、懒劲、说劲、玩命劲和脸厚劲。无论如何，你不能退缩，更不能自暴自弃，要学会自我安慰，自我爱恋，自我调节。这里，没有谁向你施一点廉价的同情，也没有谁会注意到那个靠在路旁树桩已累得病得十分羸弱的小女孩。无数次打击，只出不进日益干瘪的钱袋，即便“自我感觉良好”也不得不放低条件。凭着自己的绘画天赋，有充分信心和能力去应聘 300 名只需初中文化的填图女工中的一员，月薪 300。午间时分，烈日当空，热浪逼人，骄阳的火苗舔痛她细嫩的肌肤，街头了了数人，狗在树荫下喘粗气。袁梦读着地图，寻寻觅觅，乘车向目标挺进。三拐五转，谁知不幸地演了一场精彩的“搭错车”，越走越远，最后只好坐“11 号”专线。头顶火球，经过 3 小时马不停蹄的步行，行程约 10 余公里，付出衣衫里里外外全部透湿的代价，再爬六层高楼，终于荣幸看见招聘桌后几位姑娘可爱的芳容：“我行吗？”“有没有广东户口？”“没有。”“不行。”“我不需要调动，仅解决一个工作，一个工作而已。”“也不行，办不了暂住证。”“……”半分钟的对白变成 3 小时的价值，来不及反应，却又要打道回府。另一位姑娘见她目瞪口呆的傻模样，略为歉意地说了句：“对不起。”轻飘飘地，如同天边轻飘飘的云丝。哦，小姐，所有的解释都属空白。

袁梦不知道是怎样一步三摇地下了那高高的楼层。斜晖不再盛气凌人，街上的行人渐渐增多。路灯已亮，拉长她孤独、疲倦、瘦削的身影，在晚风中，湿漉漉的衣衫慢慢吹干……回程用了4小时，中午的方便面耐不住咕咕乞求的肚子，而明艳富丽酒店的华灯下，有人正开怀痛饮，笑声不绝。袁梦感叹万千，若有所思。放弃内地优厚的条件来深圳寻梦，而梦在何处？

大学毕业，所考的“托福”分可以使她在美国任何一所第一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此刻却流落於街头，画饼充饥，直到那时，她终于明白：深圳，并不是一个遍地都铺满了黄金的地方。

幸运的是，不久她有了一份美好的工作，在深圳一家有名的大公司做事。同样幸运，在求职的过程中，她遇到了许多“同是天涯沦落人”，几多苦水，几多无奈，都在那年轻朝气的浅浅笑容中化为灰烬。我们失败，但绝不退缩！

上班那天，袁梦买了一盆小小的仙人掌放在床头，直到今日，它仍然倔强地生长着。

小时候，夏秋做过许多梦。一个当影视演员的梦，一个当厂长经理的梦。

一位昔日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曾被人戏称为“三等公民”的夏秋，3年后戏剧性的被宾馆总经理聘任为餐饮部经理，眼下正领旨北上，来到生她养她的革命老区“招兵买马”。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夏秋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不知是激奋，还是悲愁，昨天的辛酸，今天的喜悦，明天的憧憬，象打翻了五味瓶，使她不得开心颜。

初中毕业时，父母指望她报考重点中学，已是三个指头夹田螺，十拿九稳的事，她离经叛道，暗地里在报考志愿表上填写“职业中学”。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父母的企望化为泡影，随之而来的是惊愕、责骂、怒发冲冠，后来竟发展到断绝关系的地步。

她多么需要温暖、理解和支持，谁能帮助她，唯有自己才能摆脱困境。生米已煮成熟饭，让他们去说吗，她要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路，一个神奇的梦。

12年寒窗苦，苦尽甘来。学校毕业分配时，按成绩排队，她名列榜首。电子厂、手表厂、纺织机械厂等单位目不暇接，任她挑选。她好不神气，好不潇洒，许多同学和家长日夜苦恋和翘首以盼的招工单位，挑来拣去，却未有令她如意的“郎君”。

她毅然放弃了难得的招工机遇。转眼间，父母的责怪，同学的疑虑，老师的厚爱苦心，如雷灌耳，欲罢不忍，欲做不成，事到如今好为难。

七月流火，她检点行装，独自一人，悄悄地离开了父母和老区，踏进了梦寐以求的“花果山”——深圳，赶大潮来了。

深圳，这座新型美丽的城市，高耸入云，鳞次栉比的宾馆大厦林立；南来北往，川流不息的豪华汽车比比皆

是；人流如潮，摩肩接踵身着五颜六色时装的人们，急匆匆、慢悠悠、怀着各自的意向，去寻觅、去筛选、去奔忙。

“同志，我是来应招的。”她大胆冒昧地来到宾馆人事部。一位鼻梁上架着浅茶色眼镜，约摸 30 来岁显得十分秀气的青年人，放下手中的笔，漫不经心地抬起头来，凝视须臾后，说：“满额啦，你怎么不早来呢？”一半是惋惜，一半是无可奈何。

走了一家，又一店。一天，二天，一个星期过去了，她还漫无边际地在栉风沐雨中寻觅，应招。咳，想到如今，悔不当初。真是在家千日好，出外步步难啊。几天的劳碌奔波，心中不知不觉地打起了退堂鼓。

“开弓没有回头箭。”灰溜溜地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

她茫然地来到海滨的一家中外合资的宾馆，径直朝总经理室大步流星地走去，见到总经理，40 岁上下，便半信半疑递上鲜红的旅游专业的毕业证书，说明来意后，想不到总经理快人快语地说道：“试用一个月，取舍事宜待定。”

新的生活开始了，巧遇伯乐相马，她欣喜若狂。

她发誓过，“不到长城非好汉。”到那时让人们刮目相看。

走进打工妹的宿舍，一间 10 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四张床，而且是双人的，占去了大部分面积。衬衫、裤衩、毛巾、袜子占领了所有的空间，使人沉闷，感到窒息。这就是她落脚谋生之地。

尽管生活环境不尽如人意，她还是那么好奇、好强、好胜。打工本身就意味着吃苦耐劳。

一天，港澳旅游团的客人蜂拥而至，中餐厅、西餐厅人满为患，她极力谨慎小心穿行在涌动的人群之中。“哐啷”一声，托盘已滑出手心，碰翻掉地、水洒四溅，周围的客人叽哩哇啦，看得出是不满情绪。她木然地站着心悸不安。内疚、怨恨、后悔在脑际中萦绕。

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总经理面前，俯首恭候发落。

“作为一个合格的宾馆职员，遇事要果断敏锐，要有超前的防范意识，象我们五星级的宾馆，更不能出半点差错，宾客就是上帝……”

她好懊悔，30多天来仅有一次“犯规”动作。

她懊悔地回到宿舍，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痛苦与懊丧，理想与现实交织在一起，使她身在曹营心在汉。走，离开这苛刻无情的地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经过一番悔恨与冷静的思考、选择，终究使她下不了走的决心。她坚信，有些胜利，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试用期到了。一天下午，总经理把她请到办公室，只见他站在窗前向外眺望，听见她来了，沉默片刻，转过身来，左手轻轻的朝墙边的沙发上指去。她酷似起跑线上的运动员，时刻准备着他的发令，心里象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跳个不停。

“我决定聘用你为本宾馆餐饮部领班，这可是破格聘

用，在我宾馆尚属首次。”总经理一字一句宣布他的决定，呷了口茶，然后又用商量的口吻继续说道：“不过，你如果另有高就，我也不勉强，我倒希望你能留下。”一颗紧绷的心，瞬时松弛下来，她的心里荡漾着春天的希望。

夏秋这个不甘寂寞，不守“规矩”，位卑职微的“三等公民”，自身的价值得到了人们的承认。

坐着南下列车闯特区的许多人，有的是为了工作而来；有的是为了赚钱而来；有的是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否精彩而来；而有的则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怀理想而来。莫镇贤，属于最后那一类。

那天到达特区时，天还没亮，带着旅途上的疲倦，找个旅社先休息下来，下午就开始奔波找工，找了3、4天，都因户口问题，连考试的机会都没有，第五天就想改变答话。早晨来到贴有招聘广告的厂门口。

“老师傅，这里有招工吗？”他问着门卫。

“有，你是哪里人呢？”门卫道。

“广东省的。”门卫便带他进去，指着他对主任说：“主任，他来找工的。”

“我们需要有技术，熟练的。你熟练吗？”主任怀疑地问他。

“我技术很熟练。”答得很真诚。

“哪里人呢？”又问。

“广东省的，先考试一下好吗？”他道。

“可以的。”主任说着，就带他到机器旁边，指示怎样

做。他就认认真真地做了两个很完美的模品给他看，主任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去办公室找厂长登记一下，明天来上班。”

“谢谢！”他高兴地回答。到了办公室，顺着写字楼人员的指点，他走近了厂长办公桌旁边，看厂长的样子，十分清闲。他说明了情况，厂长就说：“你先到那边看一下厂规，再来登记。”

看过厂规，交上押金 300 元，就登记了。明天就可以上班。

这厂在一个村庄的工业楼里，宿舍是铁皮屋，雨天时，大雨噼噼啪啪地敲打着铁皮，有的角落还漏雨。如果一连几天下雨，便满屋霉气，熏得人恶心想吐。寒冷的夜晚，北风呼呼地从破洞的窗口直吹进来，冻得你一直紧裹着棉被，等待天明。炎烈高温的天气，整个宿舍热气腾腾，中午根本没办法休息，晚上要到河边乘凉得很晚才回来睡觉。

面对着工作位置，流水线作业来不得半点怠慢，只有跟着机器的速度一样运转，不然老板会阴沉着脸望着你，管工会训诉你。

工友说：“经理是老板的弟弟，这个位置永远是他坐的，而不象别的公司是公开招聘的。”

管工走过来，每位工人都沉默。拼命地干活，不然，讲话会扣钱的。跟小娟谈话，她知道很多，这些管工都是老板的堂兄表弟或大姑小姨之类的亲戚，没有一个大专毕业文化，没有一个懂得企业管理。管工走后，隐约又传来

又是失钱，又是丢鞋、又丢雨伞、失饭盒之类的讲话声了。这类问题都是没有解决的希望，只能是工人的痛苦呻吟而已。管工又走来了，车间一片沉寂，车间里忽大忽小的喇叭声正播着《一无所有》的歌，但噪音比歌声更响亮，模糊的喇叭声与机器的刺耳声交织着，非常刺耳，令人觉得窒息恶心。等待着下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清新一下身心。每天什么都不变，唯一在变的是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消失了，一张张陌生的脸庞增加在工作位置上。

下班了，沉重的脚步，第一个目标就是走向没有桌子和椅子的“食堂”，宿舍是睡觉的地方，也是吃饭的地方。

“只有饭和唯一的白菜，怎么又没有煮熟，叫我怎么吃下去？”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整天不是没熟，就是太咸，太淡。”小红又叹气地说。

宿舍里工人哀声叹气，议论纷纷。

厂里每次计划都加班到 11 点 30 分，要是客商催货，或货源多，又紧迫，就加到凌晨 2 点，甚至通宵。

这个厂没有节假日，除非等到没货接着做，才能放假一天半日，那可要等很久。这里的周末、周日、节日都是他们觉得更难度过的日子。

这里其他都没变，在变的是青春的身体在一天天地消瘦，青春的容颜在一天天地褪色。

下午上班，黑板上总有扣罚名单，只不过是工人轮换登场而已；唯一的，灵活的奖励条例是很难达到的。一直刺激着新来的工人超负荷地劳作。

下班了，又得赶快吃饭，赶快冲凉，还得快一点应付

加班。冲凉房是几块坏砖头叠起来的，上面盖着铁皮，每次都要排队冲凉，冷水滑落身上，寒风从小洞直吹入，身体一直在发抖，冷天都要这样坚持冲完凉，加班时间可能将近了。

一个月辛辛苦苦工作等待的就是发工资的这一天，拿着钱上街买一件大减价的衬衣，上酒楼吃一顿早茶……平时，电影院、录像厅、舞厅、图书馆都与他们隔绝。在这里生活，那感觉好象又回到原来偏僻、落后的村庄里一样。

他望着苍茫的夜空，长叹一声。工业楼明亮的灯光照着河里混浊的水流。深圳河缓缓地流淌，而所谓现代工业文明的流水线依然汹涌地卷走了许多青年人憧憬的黄金岁月。

有没有暂停的地方？真的不想让现代工业所谓文明的流水线，把青春的秀发染出几根白发；把有神的明眸压得有些呆滞；把活泼的容颜变得刻板沉重；把动人的嘴唇挤成苦涩干枯；把伶俐的话语变得生硬迟慢。真的不想，真的。

赵丽芬在深圳闯荡一年，她如是自白：

一年前，我告别了父母，跟成千上万的打工妹一样，带着惊疑、憧憬，但更多的是希望来到了深圳——家乡人眼中的“花花世界”，开始了我的青春之旅……

初来此地，一切都是如此新奇，我像初出囹圄的井底之蛙，用好奇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大街上见到外国

人，我们也会傻呼呼的瞧上半天，然后，毫无顾忌的大叫“洋鬼子”。上班第一天，当秘书小姐称我们“小姐”时，我们这群“野丫头”竟羞红了脸，觉得挺别扭的。上班时，工长给我一台显微镜用时，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了！激动得这儿照照、那儿摸摸。这只有在生物课上“玩”过几回的宝贝，现在天天可以用了，能不高兴吗？

就这样，在惊喜中开始了我的工作。慢慢地从这里开始了对“特区经济”，对“合资企业”的认识……

节假日，换上最漂亮的衣服，逛街去！不要说“国贸”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使我们目不暇接，单是那滚动的电梯就从没见过。我们这群“工丫头”在人们奇异的目光中，竟嘻嘻哈哈的坐了 10 多次电梯，真过瘾！傍晚的时候总喜欢骑上车，到海边遛哒去！听说，海水是咸的，捧起一喝，赶紧吐出来，哇！一股苦味！众姊妹便捧腹大笑起来……

我们就这样无忧无虑的，好象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真有点“少年不识滋愁味”的感觉。

可慢慢地，当发现有人用鄙视的眼光瞧着我们，用嘲讽的语气讨论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再是刚出门的小女孩，不再沉醉好奇中。我们也学会了矜持，公共场合，不再大喊大叫；也学会了扮靓，没有人说我们“土包子”子。

在我们的字典里，也有了“圆滑”，而不再只是“单纯”。变了，我们变得成熟。可这是难言的改变，总觉得失去了什么……

渐渐的，又多了一份忧愁。每天都盼家乡的来信。吃

着饭堂那淡而无味的饭菜，就想起妈妈炒的那一手辣辣的家乡菜；遇到老乡，单是那浓浓的乡音就倍感亲切；望着海水中航行的轮船老是想起那条养育了家乡几十万人的溪水河，还有河中那条摆了几十年的老渡船。哦，想家了！特别是受了委屈，这种乡愁更加强烈。

许多人看不起我们。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堕落了，但是人们啊，难道树上有几个坏苹果，就能说所有的苹果都不好吗？我们也是好人家的女儿，也有父母的宠爱，也是哥哥、姐姐眼中的好小妹，弟弟、妹妹眼中的好姐姐。为了能看看这外面精彩的世界，顶住世俗的偏见，在父老“叛逆”的叫骂声中背井离乡，来到这陌生的地方，容易吗？

对于人们的流言风语，我们置之不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们活得潇洒！尽管家乡贫穷，我们并非选择逃避。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回去，要使家乡也富有！用我们弱小的肩膀，挑起建设特区和家乡的重任，我们活得有意义！对于家中的不幸，收起信，擦干泪，仍笑对喧闹的人群。我们活的坚强！对于家乡某些人的误解，我们不争辨，只苦涩的一笑，仍相信所走的路没错，对前途我们充满了希望！

我们就是——自强、自立、自爱、自尊的打工妹。

让打工仔走进股民的行列，情形会是如何呢？蒋仕柏描绘了自己排队购买股票抽签表的经过：

抱着掘金的希望，我毅然放弃内地的工作，不知天有

多高，地有多厚，我投身到深圳的怀抱。

是我稚嫩？痴疯？不，曾经手执教鞭在讲台上站过7年，还不成熟？去年，滚响第一声春雷的时候，我便独自来到异地为异乡客了。

好在我贱价“推销”了自己，来到这座年轻的城市不到几日，便有一份工作，面对找工难的现实，我不敢奢求。

然而，打工挣钱，为了挣钱打工，有多少难言之处，有多少苦辣辛酸！工作会有做得不十全十美的时候，难免有无言的泪挂到腮边。有时，真想撕碎自己，一千次一万次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这样选择自己的路，有时退一步想，在深圳处处充满机遇的热土上，总不会永远是个打工仔，还有那一腔腔掘金的热情，能落空吗？目前的我，还是囊中羞涩，欲言无语。

打工毕竟是打工，虽然工资比内地高，但一天十几小时的工作，全是高效率，快节奏，拼死拼活才能挣到十几二十元的薪水。

来深圳几月，便结识了好些朋友，时常与他们沟通。了解到深圳有一个好挣钱的机会，就是买股票。于是留心收集有关买卖股票的信息并万分之万地敲定：去买股。

从报纸上获准信息，1992年8月9、10日两天深圳市在各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经营机构共300多个网点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

8月8日中午我刚下班，一位老乡骑车匆匆赶来告诉我：“你不是准备买股票吗？我刚从几家银行门口经过，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购买抽签表的队伍。”明天才卖，今日

就有人站队了，我着急了，生怕自己多日的希望落空。

勉勉强强吃过中饭，急急忙忙地办到请假手续，准备做为期两天的奋战。及至火速赶到八卦岭中信实业银行门口。哗，一看即时呆了一阵。炎炎的烈日下，一条长龙横在眼前。不能犹豫，我也赶紧将自己才 55 公斤的身体加在队伍的后面，成为拉长队伍的一分子。

午后的太阳象个火球在身边滚动，烫得我浑身如烧红的剑在肌肤上划着。刺得眼睛不能睁开。满脑子在想：发什么财，难道把生命去当金钱，可是别人能这么做，我就退阵？做了两个多月的思想准备，下了几个月的决心等待的正是这次机会，就此罢休？不。

不多时，我就站在队伍中间了。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朋友送来了一条小凳，这回可让又胀又酸的腿解放一阵了。跟前后的人说一声好话，留点空隙出来把小凳子放下。刚想弯腰，前拥后挤，差点把我挤到队伍的外面。好歹我急忙抛开小凳，用力拽住前面一个人的衣服，才幸免掉队。没办法，只好继续辛苦两条腿了。

更难耐的是晚上，虽然没有太阳烤人，但饥渴也步步紧逼，朋友答应给我送晚饭，但不见踪影。特别是心里那种紧张感。因为身上有 10 张身份证件和两年打工的一点积蓄，稍不留意让人从身上夹走就会伤透心的。还是保证自己巍然于队伍之中。我咬着牙，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小时。后来，饥渴问题解决了，疲惫感却又袭来，眼皮上下不停地打架，自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坚持就是胜利。

8 月 9 日，正式卖抽签表了，这比前一天要更艰难，

不能坐着或站在原地等候。队伍前面的人在减少，每减少一个就要蠕动一步，拥挤也伴你一阵，尽管保安人员竭尽全力维护秩序，但时不时有人想近水楼台插在前面。这时候的人就不管男男女女、大大小小了，前前后后挤得死紧，甚至是后一个人抱住前一个人，以防挤出。场地的吆喝声，唏嘘声，牢骚声，骂娘声一片乱七八糟。此时，保安人员不理睬你大声喊叫你饿你渴，划地为牢，不是排队的就别想进入划定的圈子，在圈子里也别想出去，避免混水摸鱼，挤插队伍。我们呀，眼睁睁地看着路边的饮料和面包，也无法买来充塞肚皮。时间就是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挨过去。

不知挪动了几次，眼看我就要买上抽签表了，不知何故，后面的队伍一下子乱套，蜂拥挤向窗口。“停卖！”有人叫了一声，但每一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往前挤。我把全是臭汗的身躯竭力保持原位。因为炎热和疲劳，只觉得手软腿乏，好象是晕头晕脑之中度过了那些时间。

由于公安、武警人员出来一起维持秩序才使我终于买上那 10 张不知是得是失的新股认购抽签表。回来，我如大病一场，肌肤晒黑，身体困乏。但心里仍乐滋滋的，或许是 10 张抽签表都会中的。

谁都想挣钱，谁都想容易挣到钱，打工的我也一样，甩不掉这种诱惑。

2. 旋转的都市

在深圳,形形色色的招聘广告象闪烁的音符,在特区紧张明快的节奏里增添了丰富的色彩。若你留心一下市区的广告栏、宣传栏,不难发现招聘启事满天飞,形式各异。或洋洋洒洒,赏心悦目;或歪歪斜斜,不拘一格。而大多数广告信息是通过政府报刊传递的,每天招聘启事不下一个版。

招聘启事千变万化,需求人员各有所异:有普普通通的洗头妹、酒楼服务员,有各色各样的技工、专业技术人员,还有高薪聘请令人羡慕的总经理……招聘广告的题目也是独具匠心:有老老实实的“招聘启事”,有急于表示诚心的“诚聘”,有显示优越感的“高薪招聘”,还有急迫恳请的“急聘”……招聘广告短小精悍,重点突出,花样翻新。如果有人愿意留心收集研究,相信定能成为研究招聘广告的专门学者。

据说一家外资单位史密斯先生在《深圳特区报》上登出一则广告,招聘一个小伙子到他办公室来工作。广告一出,应聘者立即涌来50多个。史先生选中了一个小伙子,把其他的应聘者打发了。

“我真不明白,”史先生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你为什么选中一个连封简单的介绍信都没带来的小伙子。”

“那你可错了。”史密斯先生说,“我选的那个小伙子

带来的东西可多呢。”他进门前擦净鞋子，进门后带上门，表明他很细心；他见了老人迅速让座，表明他十分善良和体贴人；他一进来便摘下帽子并很从容很敏捷地回答我的问话，表明他很有礼貌及很聪明。

“还有，我故意扔在地上的一页书，只有他捡了起来并放在桌上，而其他的人都毫不在意地踩了过来，他不象别人那样使劲往里挤而是耐心地排队等候；同他谈话时，我注意到他整洁的衣着，有条理的头发和洗得干干净净的指甲。难道你认为这些还不够吗？在我看来，这才是一封意味深长的介绍信。”

而现实中的求职者，又是怎样的呢？

1992年7月29日某报的一条中缝，登出了这样一则广告：

“因发展需要，诚聘下列人员……”招聘职员一共七类，有经理、助理、翻译、文员、公关、外联乃至有出色文艺专长者。但招聘广告却没有招聘单位的落款，只是让应聘者去《南方日报》三楼会议厅报名。

《南方日报》三楼会议厅的里里外外，挤满了报名的人群，广告中谢绝初中程度的应聘者。人群里不时地有人在自报家门“北外”、“武大”、“上外”、“交大”、“复旦”，……大厅里坐满了憔悴不堪的大学生们，第一天报名人数即达5、6百人，报名表格已发完。

大厅外，有一张赫然触目的告示：招聘单位非《南方日报》，乃欧美进出口贸易公司，公司底薪1000元，招聘

各路人才……最后是要求每名应聘者领表并交纳 8 元人民币的报名费方可。

门外排着一长溜没有领到表格的“人才们”，他们正尽力劝说人事小姐先收钱，后发牌，唯恐错过报名机会。而小姐则没有商量余地在门口堵起一张桌子，让他们次日再来，报名时间延续 5 天。聚在门外的学士、硕士、博士们不肯散去，转而去研究门外的告示：

“欧美进出口贸易公司，咦？一般公司的名字是不予以地区名称开头注册的，工商局是怎么通过的？……”一位戴眼镜的先生首先发难。

小姐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昂然道：

“我们是轻工部隶属的公司。”

“国营公司怎么会有 1000 元的月薪呢？”又有一个标准的普通话声音。然而，他立刻遭到了同类的驳斥：

“你是不是嫌钱扎手啊！”

“现在的事啊，不要问得太清楚，闷声发大财呀！”

“发财还远着呢，能有个饭碗就不错了，管他什么公司。”

“请出示一下公司的营业执照，这样我们大家才放心。”还是有人在谨慎固执地坚持着。

“先生你不要弄错了，报纸登广告，都要出示营业执照，没有执照，怎么登广告。”小姐正色反击。

虽然 8 元钱的报名费对没有工作着落的求职者是贵了点，然而应聘心切，还是翻遍钱夹，凑够了钱即刻领表。填完表，主管 10 人一轮地讲解公司简况：“新办公司，招

聘外联人员送往香港培训,要求公司职员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例如懂意大利语的职员,便要包揽意大利一线的全部商务……”末了,他让应聘人员分类在 5 天后面试,面试地点电话通知。

5 天过去了,没有电话通知,再去《南方日报》,大厦门口贴了张告示,寥寥地写着几个复试名单。没有初试名单。没有初试,哪来复试?公司来招聘的人员,早已踪影全无,告示周围,围着一帮人,不断地有人在喊:“受骗了!”“上当了!”

大家似乎都没有接到电话,名单上的复试人也在询问:“去哪找他们复试呀?”

有人在抱怨:“为什么当初不坚持要他们出示营业执照!”

“找报社去呀!登广告不是要执照吗?”有个高个子的年青人在感叹:“大家的智商数出了问题,受骗的有学士、硕士、博士,据说还有一个是深圳大学的教授……”

那天上午,天气很热,李红梅站在《南方日报》深圳大厦的门中,汗水不停地从额上渗出了,太阳一晒,发烫的皮肤如火灼一般地痛。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终于有电话通知她去领回 8 元的报名费。她赶去《南方日报》深圳大厦,底层的小姐竟拒绝入内。

“我来领退回的报名费。”

“噢,你上深圳会堂的大树下看看,他们有时在那退

钱。”

她急匆匆跑去深圳会堂，谁知，一个人影也没有。

又做了一回白痴！原来这是一声“生财有道”的把戏。给她上了一堂课。

来深圳 30 天，遇到过不少好人。有的“小老板”对自己的员工开不出工资，却留她住了一星期（第一次才知道连一个睡觉的地方也不是理所当然该有的）。一个偶然拎起话筒听李红梅找人（并非找她）的浙江姑娘，仅因她的乡音而留她住了另一星期。更多的是引荐和忠告。引荐一般都是引来一场空欢喜，忠告则杂乱无章，令她无所适从，头疼欲裂，在记忆中形成了信息污染。

有人劝她：“万万不可丢掉法律身份，有了法律身份才能有生存空间。”——这是中庸老成之道。

另有人安慰她：“女孩子的出路比男孩子多。”——出路，包括嫁人，也包括莫测高深的“让老板喜欢你”。

她还是宁可回头去研究“法律身份和生存空间”。在此同一基调下的劝告又有好几类。

有人劝她：“扔掉大学毕业生资格和国家干部待遇，按招工指标进来容易啦！”

她也恍恍然觉得真容易了，不料有人当头棒喝：“招工？怎样操作？手续怎么办？”

另有人心急如焚地教诲她：“你们女孩子对规章和条文天生迟钝，这不行啊！怎么能从别人的口中听制度解释呢？必须把白纸黑字拿到手上，自己钻研它，搞懂每一个字！”

她猛然发现自己比“一无所有”的崔健还穷。

刚来的几天,她有胆量提出质疑,深圳不是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吗?现在她才警觉:自己拿什么去参加“公平竞争”呢?

当太阳从这个城市的东面升起的时候,李红梅在心里悄悄地说:深圳,留条缝,我要挤进去。

龚远华有位朋友在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内地家乡的县城工作。干没几个月,便忍受不了那里的孤独和落后。他写信说要来深圳闯世界,字里行间充满了自信。

那时,他怀里揣足了毕业证、身份证、未婚证、边防证,乘一路春风飞越关山来到深圳。

“那些初中、高中毕业,素质低下的打工仔、打工妹都能找到工作,难道深圳会偏偏冷落我这既有文凭,又有专长的大学生不成?深圳有那么多的工厂、公司!”当龚远华向他陈述找工艰难的情况时,他不以为然。

不过,这朋友倒还精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仔细研究过《深圳特区报》后,找出一份最合他口味的广告——一家星级酒店要招聘一名高级文员。第二天,他穿戴一新,精神抖擞去应聘。当乘电梯上到经理室门前时,大吃一惊,“额满”两字映入了他的眼帘。这两个字写得生硬、呆板,仿佛向人们示意它的不可通融。

“经理,不能再挤个位吗?”

“想干,早就应该来了,招聘启事见报后,当天上午就

额满了。”朋友又软磨硬磨了一番后,还是不行,只好礼貌地道了一声“再见”便退出那豪华的经理室。

“唉,假如及时一点就好了。”

“假如?世界上可以‘假如’的事太多了。”龚远华不无同情地苦笑了一下。

龚远华的朋友第一次领教了“深圳速度”后,改变了“作战方法”,自己主动上门去闯。那天,他骑单车兜兜转转来到沙湾,在一家合资厂门前迟疑了一下,毅然走进去叩响了总经理的门,进去,只见一个大约 30 岁的男人在填一张表。

总经理在打电话。

“老总,听说贵公司需要业务主管,我能胜任。”总经理看了看这自信的小伙子,笑着递给他一张求职登记表。

“你们俩条件差不多。”总经理指了指那人转过头说,“为了信守公司的节俭传统,我不敢屈尊你这位月薪要 1000 元人民币的先生。”朋友斜眼瞟了那人表上的“工资待遇要求”一栏,啊?! 他只要 500 元。

“那我只要 300 元。”朋友几乎饥不择食。

“不,300 跟 500 没什么区别,更重要的是你对深圳还不了解。”

“娘的,又完了,我以为深圳遍地黄金。”

朋友是高唱“失败是成功之母”的乐天派,经过了两次碰壁后,还未死心。这次托了位熟人再去试试。这位熟人是“老深圳”,颇能拉关系,一副“公关料”。他的许多朋友、同事都当上了什么经理、厂长、董事长之类的。在口舌

的攻势下,最后在一家装饰工程公司的下属单位定了个额。

正当这位下属单位的负责人要向“老总”请示时,“老总”却刚好在前一天因公出门去了。总经理那位年轻的女秘书说他最少也要2个月后才能回来。就这样,找工之事又遥遥无期。

经过几场的“闯”,龚远华的朋友差不多“弹尽粮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为了“以退为进”,朋友决定打道回府返回广州姨妈家,两个月后再回来。走的那天,他掏出所剩之钱在酒家风光了一番,然后潇洒地招手“打的”去火车站。不料在出租车上,又接受了一次再教育——据出租司机说,他自己当时也是那样走过来的,为了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他足足闯了10个“求职关”。

后来,朋友写信来说:“我首涉深圳虽没成功,可这未必意味着希望的灭绝,深圳那新鲜的一切仍吸引着我,她也使我明白:这里的的世界是欲望与机遇复杂交织的世界。几次的求职事宜上,时间、金钱、诱惑、耐心等字眼都充满了哲学味道……不管怎样,我还要杀回深圳来……”

天啊,他对深圳“一见钟情”!

一个牛仔包,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红豆就随着朋友来到了深圳。

到深圳后的当天晚上,朋友就带红豆到曾是全国第一高楼——国贸去开眼界。一进门红豆就被那里的富丽堂皇惊得诚惶诚恐。站在雅致的餐厅外面,红豆看见那些

平时肯定是养尊处优的白细的手指熟练地捻着白色烟卷，从红嘴唇里优美地吐出一个个的烟圈。朋友望着红豆一副胜似乡巴佬的嘴脸，意味深长地瞪着她说：“孩子，这不是穷人来的地方。”红豆也深情款款微笑着告诉她，总有一天我会脚踩高高的高跟鞋，手拿鳄鱼皮包走进来的，当然是凭自己的本事。

也许红豆和其他到深圳的一些女孩不同，红豆没有手拿报纸自己四处奔波，到处推销自己。红豆等着那位在深圳已经混了几年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拔电话，然后恭候“佳音”。

终于有一天晚上朋友带红豆去见工，于是一副“大敌临门”的模样，好好地“修整”了自己一番，自认为清新别致。

同老板见面没说几句话，就不难看出这位先生油腔滑调很难对付。再聊几句，红豆知道老板对自己不是很满意，从他的眼神看出自己不够美丽动人，而且不够老练、世故。红豆真恨自己干嘛出门时不往脸上涂上一层“伪装粉”，装腔作势地做出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这位老板很是能说会道，他先拐弯抹角说一通工作难办，又峰回路转说着在红豆朋友的份上收留她暂时干一干，然后又请红豆朋友也给他一点面子云云。听到这里，连天生愚笨不懂商场事务的红豆也听出了这次求职是一场“纯真”的交易。红豆进这位老板的公司，红豆那掌握另一公司很多实际特权的朋友私下里要替这位老板输入某些信息，因为他们是同行。红豆突然感到周身发冷，仿佛觉得红豆和朋

友站在珠穆朗玛峰的顶端，四周险恶无比。朋友一脸的假笑望着老板，说了一些生意上的套话。告辞出来，红豆和朋友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说道：喜剧一场。

于是朋友又一个接一个地拔电话，然后她们又恭候佳音。终于机会又来了，朋友告诉她这次介绍人是一位高级工程师，他在公司很吃香，连老板也敬他三分。她满怀信心，“单刀赴会”，就象当年地下党接头一样，她和这位高工见上了面。一看上去这人一脸的成熟和稳重。他把她的身世学历以及外貌认真地审视了一番，表示愿意收她做他的学生，介绍她进公司，红豆感动得差点大喊恩人。然后就开始听他讲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听得她如痴如醉，满脸虔诚，着实被他的沧桑和坎坷，内涵与修养所吸引。望着他闪烁不定的眼睛，红豆想今天这位朋友更让人难以捉摸。红豆也最怕与这种成熟的中年男人打交道。因为在每一个风度翩翩的成熟男人背后对年轻的女孩来说都有一个陷阱，有些是有意设的，有些是无意存在的。红豆猛喝一口茶，鼓起勇气，决定拨开云雾，识一识庐山真面目。于是就向他猛谈人生体味，并且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绝对新潮开放的现代女郎。象什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这类的西方思想被红豆运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这位高工听了她这篇“宏伟理论”，大大称赞如此年龄对人生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和如此开朗乐观的性格等等。然后用他丰富高深的理论术语迂回曲折地阐述了他为人处世的哲学以及红豆跟着他干会是一个个怎样光明美丽的未来。终于红豆从这些含蓄难懂的专业术语中，听出

了她在扮演学生这一角色时，也许还要自然而然地扮演她的另一角色——情人。红豆被自己大胆的表演所获得的成功而欣喜。因为红豆知道一个心怀不轨的男人在一个高度开放的新潮女子面前不会不露出蛛丝马迹的，正如嫖客无需在妓女面前装出一本正经的正人君子相。红豆还是非常优雅热情地向他致谢、告别，可心里在喊，去你妈的蛋。红豆一溜烟跑上公共汽车，靠着扶手杆，才发觉自己真的是精疲力竭。

有一个问题她百思不解，一个女人想要在某些方面获得成功，为什么就那么难，甚至还得付出代价，难道只能把自己的灵魂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才能获得辉煌？那些在深圳混得很不错的高级公关小姐，白领丽人们所付出的又是什么样的代价？在深圳这个充满各式迷宫、各种喧嚣的地方，她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又可爱。

一踏进朋友的屋，红豆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两人又不约而同地说一声：喜剧一场。

于是红豆朋友又一个接一个地拨电话，望着她一脸的焦虑，红豆洒脱地说道，自己可以从打工妹做起，一步一步地做起，明天你就带我去打工。

如果说打工的日子好受，那求工的日子实在难熬。

何作和两个老乡来深圳已两个多月了，至今仍未找到一份可供食宿的工作，这段时间吃的苦，受的累，简直令人不堪回首。

他们是元月3日到达深圳的。下车后，顾不得旅途的

疲劳,分头拜见了几位在深圳打工的老乡,想托他们的关系替自己找份工作,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没办法,他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招工广告上,大街小巷,电线杆等地方到处张贴着千篇一律的治性病广告,让人见了就想作呕。那些江湖郎中认为深圳是性病中心。偶尔从夹缝里看到一则招工广告,就如同抓着一根救命的稻草,一眼就能扫视全部内容。令人不快的是:所有广告已不成文,张贴不到1分钟就被人“揭榜”(用人单位地址)。也难怪,难兄难弟的“危难之处显身手”是为了让得到这个消息的人不多,竞争对手少,当然多一份进厂的希望。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比比皆是的招工广告,也有纯粹是骗取钱财的。某工艺厂,要招收两名喷漆工,在厂门上张贴了一份招工广告,顷刻间,应试者蜂拥而至,每人交报名费5元。他们也加入了这一“充满希望”的行列。4个人一组现场喷漆,在家乡他们从来没有干过这种细活儿,是带着碰碰运气的心理走进来的,所以不知如何着手,左搬右扣,还没来得及摸清头脑,就被列为“不合格的产品”推出厂门。刚走不远,就听到里面哄吵起来,原来是几个熟手识破了主事者的“机关”,喷油枪里面的根本不全是漆,而是掺和有润滑用机油,喷出物不可能沾附上金属表层,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及格。令人痛恨的是:要招的是两名工人,早已内定好了。还有一次,他们见到一则广告,言辞很干脆,大有特区人的风味:“教学电车,包学会,包进厂”,课堂是老板的卧室兼厨房,一台破旧的电车,每天有10来个人上机的实习时间,做老板的只管收学费,招收学徒,根本不辅导,

不讲解。好不容易熬到“学成结业”，闹着要老板介绍进厂，老板眉头一皱，双手一推：“新厂还没开工，等段时间吧！”回转身，理也不理人，又如法炮制他的“生财之道”去了。脚踏异乡的土地，举目无亲，只好自认倒霉。

为了维持生计，在老乡的介绍下他们进了建筑工地，挖墙脚，运卵石，搬钢材、石头，什么活都干，一到夜晚，全身骨头象散了架似的。吃苦、受累为的是有个吃住的地方。春节前后，深圳的社会治安比平时尤为抓得紧，没有办理暂住户口的外地人员，被治安部门抓获后送到“樟木头”去，少则关你半年之久，坐班房的日子叫人想起来就害怕。工地上虽然苦点、累点，多少有点安全感，何况每天还有工钱，然而这样舒心的日子，没过多久就结束了。过小年的那天——腊月 24，包工头通知他们工地上放假了，叫他们迅速离开工地，他保不了他们，然后，发给他们每人 40 元钱，说是给他们的工钱。天呀！他们整整干了一个月，才 40 块钱的工资，他们咽不下这口气，背地里他们扬言要请当兵的老乡揍包工头一顿，明里他们纠缠他不放，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从工地回来，他们连个“窝”都没有了，回家吧？路费都不够。“兵困幽州”何去何从？为了躲避盘查，他们只好“逼上梁山”蹲在当地人为亡故的先人修的灵屋里，权且过夜，虽然跟“鬼”作伴，他们也不怕。晴天，他们的日子还好受，遇上风雨天，雨水飘进来，淋湿了“屋内”，他们只好静坐通宵。吃的问题更是难上加难，5 毛钱的面包打发一天的光阴，实在是熬不下去了，他们便到“露天”小食馆，与乞人为伴，饭没饭味，几次

何作还从菜中吃出蚯蚓、青虫、泥沙，有时甚至两天吃不到一餐饱饭，饥饿常常威胁着他们。

大年 30 的下午 4 时，家乡正是吃团年饭的时候了，他们在灵屋旁就地取材，捡一口破锅，用砖头撑着，煮了几道菜，点燃了香火蜡烛，朝着故土，朝着家乡所有的骨肉亲情，他们一起双膝着地连连叩头，立起身来，每个人都哽咽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是思念？是悔恨？一时他们无法说清。过了春节，他们的日子过得更紧了。入春以来，深圳已阴雨连绵十日，就连建筑工地也没开工，原希望春节过后找厂的计划不得不宣告失败。春节过后，盲目进入广东找工的人数达几十万，给广东省的交通、社会治安等各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广东省人民政府已强令禁止各厂家招收外省劳工，这一决定对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囊中空空如也，望着暝暝苍天，思忖来日，不觉想起楚霸王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情形。唉，深圳并不是黄金遍地。

也许是落进了“隔锅的饭香”的心理陷阱吧，本来已死心塌地在宝华厂打工的高洁，心也蠢动了。

话还得从厂出粮（即发工资）的那天说起。

出粮那天，经理刚刚离开写字楼，写字楼里几个女文员就怨声载道了。谁也不肯放弃这个发泄的大好良机，个个口水多过茶水。

连平时一向斯文的人事部文员刘小姐都坐上了办公室桌，拔弄着头上的披肩秀发慨然叹道：“进厂都快一年

了，工资一分也不提，想到东方美容厅烫个发都是做梦呵。”

高洁的邻桌是生产部文员黄小姐，她正低头试涂一支新买的曼秀雷敦，“可不是，就那几个钱，我买这支唇膏时都寻思了半天。我有个大学生表姐，人长得很靓。前一阵停薪留职跑来深圳，昨天看报纸到一家公司应聘公关小姐，工资嘛，起码这个数。”她伸出两个涂满猩红的手指，言下之意即 2000 元。

高洁吐了吐舌头。她又继续说：“阿洁，你也是大学生，又能干，干吗不出去闯闯？别那么安份，说实在的，你的工资对不起你……”

高洁没说话，但不可以否认，她的心骚动了，开始留意起特区报上的招聘广告来。终有一日，她看到了一则招聘总经理秘书的启事，条件与她颇相符。她从小酷爱文学，学生时代发表了很多文章，曾被誉为“校园作家”，她相信自己“文学素质”不错，还有她能写一手遒劲的行书。光凭这两点，高洁相信自己会成功。

她很认真地书写了履历，附齐有关证件的影印件和一张自我感觉良好的彩照，怀着极为虔诚的心情寄给了那家公司。这封信是自己确信不比别人逊色之后，才斗胆寄出的。

她不过骑马找马，应聘的成功与否对她来说无关痛痒。成功了，若工资更上一层楼或老板任人唯贤的话，自然欣然前往。反之，亦不至于品尝失业的难受滋味。

转眼几天过去了。若不是那封署有某某公司的见工

信寄到高洁手里，她差点忘了有这么一回事。

高洁如约走进了那家公司的经理室。

主考官是一个腆着啤酒肚的中年男子，西装领带打扮，浑圆的头上油光可鉴，属于那种声色犬马之徒。

高洁发现，当她出现在她面前时，他眼睛似乎亮了一下。

“我叫高洁，来见工的，这是贵公司寄来的信。怎么称呼您呢？先生。”高洁有些紧张却始终落落大方。

“我姓贾。请坐，请坐。”他站起来，热情有加地拉她坐下。一种润肤品气味扑鼻而来，高洁皱了皱眉头。

经理室是独立的，檀色的房门已被人事部小姐轻轻带上。就剩他俩，静静地可以听见各自的呼吸声，镶嵌在天花板上的电灯发出幽幽的光。高洁应聘过很多很多次，但从没试过单身涉入这种静谧的环境里面试。

她警觉地看了看正在寻找自己应聘资料的贾经理，下意识地打量自己的装束，还好，密密实实，丝毫没有让男士想入非非的余地。

这时贾经理已将高洁邮去的个人资料放在桌上，他看了看可人的彩照又瞧瞧高洁本身，说：“照片漂亮。高小姐人比照片更漂亮。”虽然女人喜欢别人说她漂亮年轻，但高洁对他这种蹩脚的恭维感到恶心。

“还未拍拖吧？”他的眼直勾勾地望着高洁并不丰满的胸部，好久没转移。

高洁有些恼火，却始终没发作。岂有此理，你有什么资格询问我的隐私？她气愤地想。她本能地拒绝回答贾

经理的问题，她只有转移话题了。

“贾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贵公司经理秘书的主要工作。”高洁企图转入正题，显然异想天开。

“工作嘛，除了处理一些公务，有时嘛，还得陪我……”他忽然拉住高洁的手。

高洁明白他的意思。他不过利用招聘之便找姘头而已。高洁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愤和耻辱。

有人说，深圳是一个充满机遇、诱惑、陷阱的大染缸。高洁相信了。

“你的工作不适合我。拜拜。”高洁傲然地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心里狠狠地骂了句：“色狼”！

谁说“隔锅的饭香？”一点也不！高洁想。

王丽群，深圳市横岗协调电子厂办公室工作的小妹妹这样自我总结道：

其实我一直为自己能闯深圳而自豪，应该说这是历史和时代的赋予（尽管个中充满苦涩和忧虑）。

我的家乡是在湘赣接壤的修水县，一个叫何市嘴的山沟沟里。去年的大年初八，我跟着村里的大哥大姐们搭上开往深圳的“专线客车”时，我看见站在公路边送行的父老乡亲们就象扔了心口上一块肉一样难过，有的“唰唰”流泪，有的为了求个好兆头，忍住哭泣含泪强作微笑，有的千叮万嘱，有的默默祈祷，祝愿他们那初出茅庐的儿女们此行大吉大利，平安返家。

车快要开动了，我那 70 高龄的奶奶拄着拐棍踮着三

寸金莲翻过五里山路，赶到班车招呼站，她用手掌搭在额际朝车上瞄，我从车窗里探出头喊着奶奶，奶奶在母亲的搀扶下，来到我身边，那干枯而温暖的手紧紧地捉住我，“闺女，你不能去，你还没满 17 个年头呀。”我望着奶奶泪如泉涌，喉咙硬得象竹筒。奶奶，我能对你说什么呢？我不可能永远躺在您的怀里撒娇，永远听您唱“小白菜”，讲“田螺姑娘”的故事，我长大了，我有我要走的路。我知道奶奶很难过，她喃喃自语：“小小年纪又是个闺女家就想漂府过省，你娘和我还有我娘我奶活了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别去，听我的话，闺女，外面风大浪大……”奶奶的劝告归劝告，我依然如屠格涅夫笔下那位站在门槛前的执着的俄罗斯少女，毅然决然跨过那道 千百年来一直困围着山里女人的大山的“门槛”。

令我揪心之痛的是，客车徐徐开动的那一刻，奶奶却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跟着车走，不停地喊着：“宝宝，我舍不得你去。宝宝，你别去呀，外面……”泪水从她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里淌下来，豁了门牙的嘴里，露出悲伤拉泣时颤动不已的舌头。我使劲叫着奶奶，要她赶快放开我的手。车速渐渐加快，奶奶跟不上，突然摔在地上，随即车后场起的尘土模糊了奶奶的身影。只隐约可辨妈妈和姐姐上前扶走奶奶，并依稀闻得一个呼喊“宝宝”的声音。这令我心灵永远悸动不安的一幕，时时映现在我的记忆之中，无法淡褪。

来到深圳，一连几天跟着大哥大姐们去找工作，每到一个厂家，门口都挤满了内地来打工的男孩女孩。他们一

个个人高马大，就象一堵墙似地挡在我的面前，往往没等我拿到招工表，就说招满了。等到招工窗口人已散尽，我走过去问还招不招工。招工的负责人打量了我一眼，见我那稚气未尽的模样，只是不吱声地摇了摇头。我走在这繁华而美丽的街头，感慨这偌大一个城市居然没有我这个山里女孩的立足之地。我开始深深地懊悔，当初没有听奶奶的话，果真吃苦在眼前。从小一直在奶奶那无风无雨宁馨无比的港湾里长大，直到在镇上念中学每个星期天回来，都要依偎在奶奶怀里撒娇，把我在学校里受到的什么委屈或不如意统统向奶奶倾诉一番，一直要等奶奶对我说上两句公道或安慰话，我才罢休。面对着那种无休无止地寻找工作的漂泊不定的生活，过去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的我，是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特区确实是个磨难人，锤炼人，造就人的地方。正在我失望、动摇以至准备打道回府之时，柳暗花明忽现一村。我已通过见工考试。进了横岗一家美国相机公司的写字楼工作。由于不懂白话，语言这一大障碍使我无法进行正常的思想交流和心灵沟通。我一边学习传真技术，一边学习英语和白话。因为生活在我身边的人都说白话的，而在传真收发工作中常常接触到英语。也许是近朱者赤，潜移默化的缘由，不到一年的功夫，我就能用还算流利的白话和英语口语进行交流。我的虚心好学、勤奋工作、真诚待人，得到领导和同事的称道，美国老板常常翘起大姆指，用不很地道的中国话说：“OK，小女孩，不雀（错）。”

来深圳的头半年，由于生活习惯、环境、节奏等种种

不适，便常常想家，常常梦见奶奶。加之，奶奶时不时让弟弟执笔写信来叮嘱我，又是“外面风大浪大呀”，又是“好人……”“坏人……”呀，使我更加想念奶奶，有时恨不能插翅飞到奶奶怀里，把在这沸腾的世界里经历的甜苦酸辣都痛痛快快地哭出来，笑出来……

去年年底，我回家过春节，奶奶把我搂在怀里，浑浊的泪眼盯着我看了半晌。我向奶奶扮了个鬼脸，“奶奶，是不是您的宝宝脸上少了点什么，嗯？”奶奶貌似生气地说：“鬼丫头，别打岔，让我好好看看你。”她说完依然目不转睛地用欣赏的眼光凝视着我，尔后嘴角上挂着一丝欣慰的笑意，自言自语地说：“丫头长高了，变得又红又白，好看多了。”

今年正月初八，我来深圳上班时，奶奶和家人依旧把我送到班车招呼站。奶奶没有哭泣，也没有紧紧抓住我的手，她知道这是不可能挽留的，只是有些恋恋不舍。她哽咽地说：“宝宝，你去吧，我昨天替你问了卦，说你吉东南凶西北。你就放心地去吧，宝宝，可别忘了回家看看我们。”

此刻，我的心一阵颤栗，说不清是悲是喜。泪水霎时把眼前的世界搅得浑沌而又模糊。我知道，我已不再是去年那个初到深圳的山里女孩子了，但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长……

3. 千厂百楼走遍

陈杰如是说：

唉！实在记不清换过了多少家工厂，和多少老板打过交道。就让我从两个月前独树村的“沪宝服装厂”的倒闭讲起吧！

凭心而论，“沪宝”对打工仔即便不是天堂，也是乐土。它是上海南江县一家服装厂在深圳办的分厂，各方面都依上海规矩，缺货停工也要给工人发足工资——仅此一点你知有多么难得？可是，“沪宝”倒闭了。

孤单和寂寞令我们恐惧，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十几个打工仔、打工妹准备同进同退。我们先找到了八卦岭 426 栋的一家服装厂，它告诫工人的“注意事项”令人触目惊心：早上 8 点钟上班，夜 11 点结束，中间午、晚餐时间加起来是一个半小时，自己的工作做完了也不能回宿舍（宿舍离厂房一里多，在七层），只能在车间坐着或找点杂活干，偷偷跑回宿舍也没用，管房人把着所有钥匙，没有老板的条子不会给开门。为了生计，我们还是进去了。

老板也是打工出身，他手下的指导工、组长、总管、总查都是他的亲友，这些人都懂服装，但都不懂管理。如果调度得好，产量是能上得去的，用不着一个月至少有 25 天加班到夜 11 点。工资呢？这个月的钱，总要拖到下月

15号才能开始发放……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浙江女孩先走了,不是换一家工厂,而是径直返回钱塘江边的老家。她俩对这个工厂最不能忍受的是:没有食堂,没有吃饭用的桌椅。见她们要走,老板娘叫我去挽留,我不成,她又亲自出马,提出了如下优惠条件:

1. 你俩可以提前下班,只要拿出产品就行;
2. 吃饭没有桌椅,到老板办公室去吃;
3. 叫看宿舍的每天帮你俩打好开水。

老板娘只提得出这么多优惠了,没留住人。

想起来老板、老板娘也够难的,承包这家工厂,一个月要向公司交3万承包费。香港方面的加工费又压得特别低,他们不向工人挤产品,又能怎么样呢?

浙江女孩走了没多久,我们全体为了阿华都走了,20天工资都没要。

阿华是我的四川达县老乡,28岁了,有12年服装业的工龄,技术很好,他本来在家享受惯了,是被老婆逼出来“捞世界”的。那天,他的组长看他很快干完了活,就叫他去修线头,他不去,伏在车位上打盹。老板娘的姐姐上去警告他,他火了,说:“就是不剪!我是车工,不是剪线工,我不和他们争饭吃,再说也没我的辛苦费!”对方说:“到我们这个厂,好多地方都要体谅我们。修吧!给你辛苦费。”阿华就是不干。对方走了,一会儿老板娘来了,轻轻对他说:“你累了,回去休息吧,我写张条子给看宿舍的,让他给你开门。”

话是够暖人的，可远处老板的脸色太难看。阿华悄悄对我说：“我们还是走吧！我吃不消。”

听说我们都要走，老板夫妇一齐来挽留。听说我和阿华在家乡是有工作的，就怪我们为何不早说？他们说可以让阿华当指导工，我当统计，夜班加不加都行。然而，我们还是走了。

辞工后，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们又去了文锦北路的一家服装公司，但阿华一看那生活条件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就连我也不敢恭维。厂长说马上要改善，由于条件差，工资是高的。谁知是不是这样。他说：“安下心来这里干吧，我们大家一起去从香港客户的包里去掏钱。我不会亏待你们的。”我的天，与 426 的老板一模一样。当天我又去联系了一家服装厂。在水贝工业区，名叫“三心”。这个名字怪好听的。讲条件，好得很。上班住宿在同一楼，吃饭在二楼，有食堂，食堂里有饭桌、椅子。机器都是进口的。但进这个厂要考试，除一个湖南妹之外，全都考上了。我对这个老板说湖南妹是因为心情紧张而考不上，要求再考一次。第二次又没考上，老板说：“你给我带这么多人来，我可以录取她。”

本来，我们是该定下来了。然而我们却又离开了——仅仅在几天之后。又是为了阿华。

阿华说他的钱全部寄回去了，近段时间的折腾，他搞得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想找一个不扣押金厂。“三心”的技术要求很高，虽然我们的人技术不成问题，连老板都大加称赞，但一看老职工那惊人的速度，觉得难以跟上。

冲着以上原因，我又联系了现在的厂，在文锦北路，叫“威丝”。这个厂的条件比“三心”差多了，就是比 426 也差。但大家愿意。

今天下午离开的时候，洪老板有些凄然地对我说，经我们一折腾，他的工作计划全打乱了，但既然要走，也是不能勉强的。我们收拾好行李之后，老板娘，车间总管来看了我们 5 次，也带着一丝恳求留了我们 5 次，我们的人还是要走。老板又要我留下，我本不想再走来走去的，看到阿华和同伴们恳切的眼光，我们还是走了。

深圳这地方真是瞬息万变。以前是工人找工作难，现在是老板找工人难；以前大多数企业需要广东户口的女熟练工，现在是不分男女，不分省别；以前工人怕老板炒鱿鱼，现在是老板怕工人炒鱿鱼；以前只是老板选工人，现在是工人选老板；以前工人饥不择食，有厂就进厂，现在却要考虑条件考虑工作，一旦达不到要求，工资不要也要“拜拜”。

做人要有自己的本分。我们毕竟是打工仔，一味地要求老板，一味地追逐自己的愿望……那也是有违常理的。

我想对姐妹兄弟说，做一个真实的人必须面对现实，必须接受很多东西。要收获，就要付出很多代价。

阿萌说生活的感觉是无奈。

昨天发薪，扣这扣那的。拿到手的只有 400 来块，有啥用？喝水！

阿萌拿着这几个钱，叹着气，说很气愤，她想到自身

价值问题。

罗亚莉说你气啥呢?少拿了工资本来就亏,再跟自己生气岂不更吃亏,别人 200 元一月,不也过了吗?

于是,罗亚莉带头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阿萌和侠也跟着她大笑。

其实,心里在流泪……

妈妈来信说:“真叫我们担心害怕呀,你一个女孩子在异乡异地,千万要小心呀,不要一人外出,多与好朋友、好同学在一起,以防坏人暗算你,回九江吃碗平安饭,多个亲人在一起欢欢乐乐该多好呀!”

看看想想,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来深圳干啥呢?有人是为了赚几个钱回家,有人仅仅是想多认识几个朋友,有人是想多点机会,做点事情。

罗亚莉为什么来深圳呢?以前是为了一个很飘逸的梦,现在是为了实实在在地做一个人,把握住自己的青春年华,做一些以前只敢想不敢做的事情,为自己发现机会,寻找机会,在这个世界上留点痕迹!

作为一个女孩,有这种想征服世界的想法,也真的太狂了。不就是一个女孩吗?能干什么事?

深圳这个鬼地方,充满机会,也充满陷阱。

生活很现实。女人嘛,找对象,结婚,生孩子,为男人干事,这就完了。

生命这东西就象流水,8 岁,18 岁,28 岁,就这么过去了,容不得你细想,干嘛要把时间浪费在叹息上呢?

来深圳这段时间,感觉更深的是,女孩子不能有太大

的物质欲望，钱是一切罪恶、堕落的源泉。

真正的财富是什么呢？是知识。这知识来源于书本、别人及自己身上积累的东西。它是抽象财宝，也是具体财富，是财富的源泉。

我们都是打工身份，靠什么生存？靠实力。当然，女孩子又多了一层优势，长相漂亮，气质好又多一个机会。

什么叫活得好？更高的要求是让人认同，倒不一定要做到很高标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知识是什么？无非把本来不是你的东西，弄成你的东西。

其实，我们来深圳，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第一步是生存，第二步是寻求安定，第三是交际，第四要名要利，争取社会地位，第五才是完善自我。

新拍的《编辑部的故事》余德利一句话倒很实在，钱绝对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来深圳的女孩谁没有一个难言的故事？谁身上没有担子？谁又能活得轻松呢？有时候，真觉着心里有口气堵得慌，真想冲着这世界吼他一声：“他妈的！”做人难，做女人也难，做深圳的女人更难！虽然已经远离家乡，可是家乡的人并没有忘记你，总会有那些人意味深长地说：“谁知道她在深圳干什么呀……搞大钱呢！”在这呢，求职的时候毕恭毕敬地对招聘单位说：“我本领不大，但能吃苦耐劳！”发薪的时候，又得划算着这个月怎么活？

侠为人母、为人妻，忍痛将3岁的女儿放在老父老母身边，只身出来，原单位又闹僵，扬言再不回校，便算自动

离职，她几乎没有退路。结了婚的女人想在深圳安定下来，比登天还难，她难道就不烦吗？她的心理负担不重吗？她比我们更有理由叹息，流泪。可是她却将这一切埋在心中，微笑地面对这个可爱又可恶的世界。

阿萌认为，既然我们这些女孩来了深圳，那么就得承受漂泊的凄凉，奋斗的艰辛，要有很强的心理承受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得微笑地面对它，并自信有能力解决它。

“铃……”

“喂，您好！”阿文拿起了电话。

“哪位 Call987？”一个 30 岁左右的男人声音。

“噢，李经理，你好！”阿文的眼睛忽然亮了，好似黑暗中忽然有人划了根火柴。“我接到了您给我的通知，明天我去上班好不好？”

“嗯，是小王……是这样，今日我才知道总公司已不让安排人，不过……”从语调里听，这个工作已没有结果了。

“噢……这样，那么谢谢您了，李经理，我很想去……您能帮我争取一下吗？真的我很想……好，那……我就等您们商量好再去……”

阿文知道，她在安慰自己。

从应聘那天起到现在，已有一个月时间了，说了两次让她去，又两次不让她去。幼稚的她为了大干一场，已向一些有可能今后联系的单位及人作了铺垫，并且还整日

抱着房地产咨询的参考书,为了上班时不让同事向她投来鄙视的目光。

“喂,发什么愣?一棵树上吊死?中国人真不信这个邪!”一旁的好友沉不住气了。“您那点冲动劲哪儿去了?就这么两句话就打发了?憋气!”

“算了,丹,我真不能象你那样潇洒,你有一个一年能给你2、3万块费用的哥,我却连一年让我用汗水换2万元的资格都没有,我们命不同!”

“别来这套,象酸黄瓜,别拿我这么开胃呵。”丹生气了。

丹生气没有,我知道为什么!

阿文怕老板生气,她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真实在,应聘什么就临阵磨枪,到底是你选择工作,还是工作选择你?你要让老板觉得需要你,而不是你需要老板!”

丹讲话有九分小哲理,但这些,她在3年前知道,但3年后,反而不知道了。

当她饥饿时,好象不会舍掉口边的面包而去读书,尽管爱诗胜过爱面包,诗不能让她的胃充实。有这种想法时,很多人夸她从空中的楼阁走下来了,虽然出来时见到世间最强的光,刹那刺痛了她的双眼,后来她变得没有泪腺。但她还是庆幸自己明白了。

是命?她认!

信命,但她绝不信怜悯!

“上帝宠爱你也宠爱我,给你金钱,但给我怎样得到

金钱的种种提问，我至今虽未找到答案，但我们之间，很难说谁会更幸运，更富有？”她偷看丹一眼，托了一下眼镜。

“行，这时候还嘴硬，属鸭子的——肉烂嘴不烂！”丹画着口红，挑衅地扬起眉。

她从床上爬起，照照镜子：“惭愧，丹，我们只相差一岁，说我是你姨都有人信。”丹的双眼怎么会那么亮呢？她说她很爱哭，而且别人说她哭时都不会有一种痛苦的感觉；而她，没有泪腺，从不哭，也没有人说她快乐，眸却如浮满残叶的湖及湖中碎了的星光。

从丹那里出来，一个钟头后，阿文便坐在深圳一家偏僻的小型卡拉OK室里，门票10元。

她有近两年没有进10元一张门票的卡拉OK了，2年中，哪一次娱乐消费都不会低于500元，她习惯了，买单的人说，这不是血汗钱。别紧张，那时她平静的回答是出卖的东西不同。

人，真是一会儿天上，一会儿人间。

她，真乃一年河东，一年河西。

别看这里大多是穿牛仔裙的蓝领阶层，歌还蛮亲切呢！或许我阿文注定要回到这个人群中来。往夕那二小时1500元的消费买到的是我没有泪腺的双眼，换来的是机械的笑容；而这里，却让眼中碎了的星光再次闪烁，让她的微笑蒙上了美丽的伤感。

“姐姐，你是来唱歌的吗？”一个穿运动衣的小妹坐在我旁边。“是啊，”我点头。“那我们一起唱吧，刚才我还以

为你是这里的经理或来体验生活的呢！”这时，阿文才意识到，自己穿了一身在原单位买的标准的职业装，很唬人。

“你自己来玩吗？”

“不，5、6个呢，AA制，大家都是工友。”她真羡慕那脸上流露的一种自豪，“那时我们，可不止5、6个，而是10几个，也是AA制，5元一张门票的歌舞厅，化妆画得象小熊猫一样，嗯，就象你现在这样！”她真想这么说，看看那身衣服没开口。

“真羡慕你们这么开心。”阿文陪笑。

“你不愿同我唱歌吗？看你那样子，象个……象个不会玩的老板娘。”

“不会玩，你这小姑娘，要是给你听我们刚来深圳的录音，给你看我们刚来深圳时的照片，不把你第七颗大牙笑掉才怪呢！我不会玩？有兴趣，一个钟头后我换上了运动衣，球场，旱冰场，周末任你点！”她心里想。

“看你，不给面子，好了，我过去了。”小妹妹起身，并歉意地笑了一下，很虚伪。

一个人听歌或一个人去卡拉OK很有乐趣，更何况，绝不会耽心有男士来询问“高级生意”之事，作为一个女人，这常使她感到安全，同时又倍感缺憾。

那晚回去后很快入睡。她梦到一条很美的鱼被她杀伤了，但仍游在水中。那水，很象工厂里的流水线，而岸上观望的游人，则酷似合资厂里日本人的影子。

她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从一个月100元月薪开始的

·吗？不，她不相信，100元，不够她买两条“三五”给需要“研究”（烟酒）她工作的领导，100元不够她买一双舒适的鞋以应付这整日的奔走。

好在她走出了100元的坐标，走进超过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的空间，尽管她现在又回到了零。

第二天一早，她忽然觉得轻松了好多，翻了“好友录”、“熟人录”、“知心录”，又重新留意招聘。一个招聘保姆的广告让她的眼亮一下，觉得别的什么招聘都有层膜。不，她未修炼到位，无论是实力抑或别的。

当保姆肯定不行，那家的家庭主妇如果聪明话，不会要一个眼眸似落满残叶的湖的女孩。画一个出色的保姆形象，这眼睛一定是“画蛇添足”的一笔！

她拔通了第一个“友人录”中的电话。

“喂，×××，你好！”

“阿文，最近好吗？哪里发达！”

“错不了，怎样，周日出来喝茶，我请客！”

“有请必到！”

痛快，她拍手叫绝！

她打算好了，最后一搏，待她真的—无所有时，她不在乎回到起点上。但坐标一定会提高一公分，这点她深信。

这路才刚刚开始。

连着打了几个电话，同样内容，不同时间。

出电话厅时，以免再受到强光的刺激，她戴上了墨镜。

四周依旧高楼林立，灯火辉煌；身旁的人群依旧熙熙攘攘，作为万物中的一分子，她——又开始赶路了。

她来到这家酒店求工，吃了闭门羹。

“不行，我们的酒店不招人。”年轻的经理头也不抬地告诉她。

“那——打扰了，再见。”她失望地离开了经理。但在她拉开门要出去的一刹那，她忽然想起什么事似的又转过身。她转身的样子很好看，头一歪，黑发一甩，露出一张白净的脸，还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经理，什么时候这缺人，请……”

年轻的经理这才抬起头，望一眼她诚恳的目光，她正迎视他的目光，笑了。无声，却稚气纯洁。

“你是什么学历？”经理问她。

“怎么？做服务员还要学历？”她颇感意外地问，又无声地笑了，甜甜的。

经理也笑了，态度和蔼了许多：“我看你很浪漫、潇洒。是个大学生吧？”

“咯咯！”她终于笑出了声：“哪里，我高中还没读完，我也不浪漫。”

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很柔和。目光在恳求经理：“经理，关照一下，我保证做好。”

“好——吧。”不知是怜惜她的美貌，还是被她的笑容打动，年轻的经理总算破格地点了头：“你就做这里的迎宾小姐吧。”

“谢谢您！”她喜出望外而又感激涕零地望了经理一眼。

“不用谢。只要求你把工作做好……要会笑，要善于笑，象现在笑的一样。你的美丽加上你的微笑，一定会使顾客满意。记住，顾客就是上帝。”

就这样，她成了这家酒店的迎宾小姐。可很快，年轻的经理听到了其他服务员的妒忌和不满：她笑得太“开放”了，直笑得使一些客人围着她转，想方设法和她靠近，套近乎；甚至有的客人离开酒店后，马上又来电话找她……这怎么行！年轻的经理听到这些恼火了。他来到迎宾台前，诱导地告诫她：“你要笑得有‘分寸’呢，笑得太‘开放’会适得其反，甚至还会‘引火烧身’。知道吗？你不仅要笑，还要略带几分忧郁。忧郁是一种情调，也是一种美。同时，也说明你自重、自爱。你也该忧郁点呢。”

“忧郁？”她迷惑地问经理，“为什么要我忧郁？难道我笑得不美？我就是喜欢笑。”

“你笑得很美，但也要忧郁。忧郁和微笑同样要。这些，你应该懂吧。”

她不高兴了，悻悻地说：“痴线（神经病）。”

“你怎么骂人？！”经理生了气。

“你到底让我怎样？”她的声音变得好大：“你是不是让我象死人一样地站在这儿！”

经理无奈地摇着头，不再同她理论——她毕竟还年轻，太单纯，不识世故，还没“经验”呵……

“这样吧，你不要做迎宾了。”经理终于下了最后的结

论。

她一愣，但马上冲着经理高喊：“你把工资给我！我在这里站了 10 天呢！把钱给我，我马上走！”

她的反常言行使经理惊讶。他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她不解而气愤地盯着经理。经理竟被她“‘盯’得心慌意乱了！他这是第一次被一个女性为此这般地死盯着，她一定是个风流小姐，一个荡女！经理心里这样损她，不禁嘲讽地对她说：“你不要这样看我，钱一分也不会少你的——你这个荡女！”

她一听，神经质地跳将起来，扬手打了经理一记响亮的耳光！经理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真的动了气，她却勾着头，双手捂着脸，耸动着肩，嘤嘤的哭了。泪水，从她双手的指缝里串串流出，她哭得是那么伤心，又是那样的沉重。

年轻的经理没有料到她会如此敏感，脆弱。早知这样，何必揭她“老底”？望着哭得悲悲切切的她，经理没了主意。他顾不上摸一下被她打得火辣辣的脸，忙向她赔不是：“对不起，方才我说错了。”

她什么也不说，只是伤心地哭。很多服务员闻声出来劝她，安慰她。她不听，仍是宣泄地哭着。

对她如此伤心伤感的哭泣，年轻的经理感到她一定有什么心事。于是，他又反过来哄她：“别哭了，我不炒你‘鱿鱼’，你还做你的迎宾小姐吧。”

“你这样伤害我，我还怎么做？”

经理只好温和地对待她，象哥哥对妹妹，替她擦泪并

亲切地拍着她的肩，真挚地对她说：“小妹妹，如果你有什么心事，就告诉我，我一定帮助你。”

她终于恢复了平静，扬起泪莹莹的脸，望着远处的国贸大厦和车水马龙的人民立交桥，喃喃地说：“我刚从戒毒所出来……”

是这样！年轻的经理终于明白。但他怎么也无法把美丽的她和一个吸毒者联系在一起！

“你说得对。”她又自语：“我曾是荡女，人们都这样叫过我。可现在我已重新做人，你为什么还这样叫我？”她茫然地望着经理和身旁的服务员们，继续说：“我现在不是，不是荡女！我是一个新的我。虽然我心中凄苦，可我多想笑呵！我是用实实在在的笑、痛痛快快的笑迎接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生。我只要笑，再也不要忧郁，不要！”

她有一颗受过创伤的心，有一颗被忧郁和屈辱折磨过的心！可怜的小姐！年轻的经理感到不安、内疚……

许久，经理对她说：“你就继续做这个酒店的迎宾小姐吧！你笑吧！尽情地笑吧！用你的真诚，用你的青春，对生活微笑吧！你应该笑，你有权利笑！”

于是，她热情地站在迎宾台前，面对络绎不绝的客人，重新绽开她那动人的笑靥……

第二章 烟火人间事

100 年前,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洲发现金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涌向西部,形成“淘金热”,因此出现了文学史上著名的“西部文学”——美国的“打工文学”,诞生了以杰克·伦敦为代表的一代作家。杰克·伦敦揭示了这批移民在遥远北方的迷惘、苦难生活,向天发问:文明有没有改善普通人的命运?

这个疑问在百年后的南中国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得到回应:中国现代文明给普通人带来色彩斑斓的崭新人生——老歌新唱,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

100 百年后,在中国的南部出现了改革开放的“黄金地带”——特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带。于是成千上万的北方人涌向“南中国”,“打工现象”日益引起敏感的广东人民的关注。这些被称做“外来妹”与打工仔的劳动者,组成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这股“打工潮”,既不同于建国初年的那代工人的生活,也与新时期前期所反映的“好人”、“普通人”生活不同。这股“打工潮”方兴未艾。南北文化和海外文化在经济领域发生碰撞和最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由

此产生了这一时期的“文化观念”：社会情绪和审美趋势等诸多层面上的种种嬗变。

1949年百万雄师过长江，曾震撼寰宇。如今这“百万雄师”当然不能与那所向无敌的威武气势同日而语，但它在一个独特的范围里所掀起的狂澜，亦显示出“雷霆万钧”之势。也许，现在还难体会出来。若干年后，当人们再来翻开这一页的时候，便会感到这“百万”临工“移向”是一次伟大的行动了。

一晃，12年过去，这是1993年的夏天。时代的脚步的确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朝前迈进。从80年代下半叶开始的“民工潮”，一直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向“南中国”，拍击珠江三角洲。到了90年代初期，尽管南下打工的民工仍然有增无减，但人们对这股“潮”，已从最初的惊讶与恐惧到慢慢地习以为常，数百万的外来妹、打工仔也从最初的惶惑到慢慢地适应、参与甚至溶合，成为深圳特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到这时，外来妹和打工仔就不再是以代表着落后、蛮荒甚至是社会的负担这样的形象而引人注目了，而是业已形成一个“打工阶层”，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着一种可称之为“打工文化”的东西，因此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甚至是南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并成为最直接、最突出地折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一种经济和人文现象而令全社会瞩目。

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特区，临时工的作用不容低估，他们可以说是深圳经济起飞

的基石。

深圳现有临时工 160 万左右，在特区的产业工人中，临工占了 $3/4$ ，有些“三资”，“三来一补”企业，几乎全部雇佣临时工，临工在深圳已不仅仅是一种普通劳动力，他们已成为深圳社会生产的主力军。

根据从事的行业划分，临工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通常讲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大多来自广东省各地、湖南、广西、四川、贵州等边远贫穷地区。他们文化程度低，调查显示 80% 为初中或小学毕业；年龄小，多在 18 岁至 23 岁，有的甚至只有 15、16 岁；他们一般从事一些手工操作的工作，如电子元件装配、缝纫、制作玩具等；他们的居住条件很差，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加班加点，薪水较低，业余生活贫乏，经济生活困难。但他们却为厂商们创造着亿万元的利润。

另一类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大中城市，有文凭，有社会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高级人才。他们多在一些贸易公司或工厂的写字楼，从事脑力劳动。他们工作环境好，工作时间短，薪水高，生活颇为优越，有“单身贵族”之称。由于他们所受文化教育程度较高，且见多识广，一般能够比较快地适应深圳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模式。表现在：一，参与意识强，强调自我。一旦感到自己不受老板器重或合理建议得不到采纳，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便“炒老板鱿鱼”，跳槽到其他公司；二，思想观念开放，因没有内地永久性、固定的同事关系而碍于人缘，对是非很少含糊，多能开诚布公，敢于直言。并且尽情享受生活，穿名牌，广交

朋友，听歌、跳舞；三，心理调适能力强。这些“白领”阶层，从内地来到深圳，无论服饰衣著，行为观念都很快地溶于当地社会并努力适应之，譬如，热衷于学习广东话，崇尚广东、香港的礼仪习俗。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心理上的“断乳期”和文化的隔阂。

但对于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打工仔”“打工妹”来说，同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却给他们截然不同的感受，从农村发展到城市，按照社会的自然发展，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处于这种巨变之中，人们不仅在衣著服饰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上不同以往，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低的临工，对于周围全新的社会环境，在心理上很难适应，产生严重的不平衡。一、他们认为这里的人都讲“钱”，有钱就有一切，没有人情味，人人自私自利。他们贪求生活享受往往是腐败、堕落的开始；二、本地人欺负外地人。在他们居住、做工的地方常常受到本地人的无故侵扰，一旦发生纠纷，只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深深地感到此地不可久留，只想在深圳干几年，攒点钱回家，休养生息，把自己在心理上与当地人隔离开来。三、老乡观念特别强。由于对于外界的恐惧与抗拒，“打工仔”、“打工妹”的老乡观念特别浓厚。他们一般都很少与外地来的其他同事结为伙伴，尤其是不同省份的人。语言上的障碍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心理作怪。四、固守旧有观念。尽管身处繁华都市，耳濡目染，但他们仍然固守着原来的生活方式，经济是一个问题，但主要是观念。他们认为出来挣钱是为了帮父母养家糊口，同时自己也

挣一份聘礼或嫁妆，以备回家乡娶妻、嫁人、生子、个人发展。留在深圳，这是他们连想也没想过，也不必想的问题。五、逆反心理严重，由于临工生长的社会环境与现时的社会环境差异太大，又没有能力调适或平衡自己，许多临工总是觉得别人跟自己过不去，违犯厂规被罚，工作要求严格，正常的工作调整往往被一些临工认为是受人欺压。而一旦他们没有得到正当的疏导，他们就会以进行偷盗、损坏公物乃至暴力活动以平衡自己。更有些女工因好吃懒做，贪图虚荣，自动委身工头、老板，甚至卖淫。

但这一类临工中不乏有一些佼佼者，他们努力地适应这里的社会环境，读夜校、补习班以提高个人素质，懂得调整与其他地方的人和当地人的关系，与人相处融洽，有礼貌、谦让、自信，能够客观地看待社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这里与自己家乡不同并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有些人经过努力成为企业中的骨干，甚至担任经理、厂长；许多人还通过在深圳“打工”积累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回老家自己开拓新的事业。

人的资源是无穷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历史资源。160万临工带回家乡的不仅仅是他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更带回他们在城市耳闻目睹的“文化”或文明。这种“文化”或文明的传播有两种结局：一种被当地人的文化吞噬。由于人少力薄，临工回到家乡以后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上重新溶于当地社会；另一种是使这种新的文化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左邻右舍，甚至他们的后代。这种影响将是潜移默化而意味深长的。

1. 宝安的天空下

无君是我所认识的最有个性的女孩，她永远用忧郁的眼睛注视你，给你一种美丽的遐思。她告诉了我 7 个打工故事，全是宝安那块热土上的。

一、初到布吉

黄昏的时候，一辆急驰的中巴里坐着刚从 C 省工学院毕业的左迟。他微闭着双眼沉浸在回忆中，脑子里还回荡着毕业典礼上的歌声，回荡着女老师的祝福，这些溶进了他的血液，他不能忘却，不曾想，如今他竟真的别离了他们。

毕业前夕，据内部消息透露，学院准备把这个学生会主席分到特区，分配到赫赫有名的粤宝电子公司。

去特区他是平静的。他不同于那些跑到海南的大学生，他感到自己缺少青年人的那种激情，那种闯劲。特区钱多，有人说。特区观念新，思想开放，有人讲。他听见了，却仍然很平静，清楚自己并不是那种想要成为富商的人。他喜欢宁静，喜欢一种和谐，喜欢那种自然的生存方式。至于观念，他心里更加明白。他是教师的儿子，骨子里刻上了传统的礼教，脑子里是雷锋，张思德，焦裕禄，他不能忘记，更难违背。也没能力把自己变得很新潮，很开化。他喜欢这份传统，他希望自己的婚姻也象父母那样，相亲相

爱的生活一辈子。

毕业分配已经实实在在的摆在面前了。许多同学都已知道自己所属的那片土地了,而他的通知还没有来,他依旧不着急,他等待着顺其自然。他是高材生,他不用耽心会有什么单位拒绝他……他等着,悠悠哉哉地等着……直到他已经有些怀疑了,终于有了一封函件落进了学院。而他万没有想到是一封既不欢迎又不拒绝的信。人家公司名气大,许多人都向往这里。这个公司名字就充满了诱惑,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优秀科技人才。所以人家有权利选择、挑剔、拒绝……没把话说绝了,是公司给他的面子。原来的漠然以至犹豫一下子全没了,竟变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力量。他被这种力量挟持了,立刻决定了动身南下闯进公司报到……

……汽车仍然在公路上飞驰着……还没有等他仔细的看看如林的高楼,它们就在他面前掠过去了。他的思绪重又返回现实中,他盼着快一些到公司,他盼望着自己的能力不被上司怀疑。他心胸广阔,他想这回又会拥有一些新朋友了,他也会真诚的对他们。他盼望这里成为自己的归宿,自己的家。自己已经不小了。他也盼望理想中的姑娘能在这里与他不期而遇……汽车的颠簸使他再次返回到现实中,凭窗临望,他不禁吃了一惊:载着自己的汽车正在一条山路上行驶……他认为自己看错了,问正在打着瞌睡的售票员,那女子用生硬的普通话冷冷的告诉他,前面就是他要去的布吉了。让他先做好下车的准备……他的心顿时凉了……

走在路上，他猜测着来接他的会是一位亲善和蔼的经理先生还是一位漂亮热情的秘书小姐；进了公司人们会如何热情的问候他，问他旅途上的艰难和疲惫。他发现了自己这时脆弱得竟象一个小孩，也许别人的一句安慰就会使他哽咽。一个高个子男人平静得近乎冷漠地接待了他。办完了一切手续，就有人把他送到分配给他的宿舍去。他跟在领他的人的身后，那些正下班的女工们直勾勾的盯着他，用手指着他，然后又聚在一起笑着。他感到她们是在对他评头论足，而他听不懂她们的方言。他住的那个楼道里是一些似曾相识的年轻男人们。他知道这些就是这里的栋梁了。这些也就是粤宝可以夸口的成绩了。他友好的看着他们，而他们回敬给他的目光冷淡，很挑剔，也含着一种嘲讽，一种怜悯。他读懂了他们。一个墙上挂满了女人头像，桌上放满了空酒瓶子的房间正式展现在他面前。有人指指上面的那个空位，告诉他，那就是了。

大概都属于天涯沦落人，这些大学生们还是接受了他。他们履行了一种默契，他们幽默而又带着一种自嘲与他交融了。这是现代大学生们一种新的感情方式。

他发现他们来之前的情况竟然相似得奇特，以至让他不敢相信。他们的憧憬也一样，盼望的也一样……最后他们又一样的走到现实的圈子里了。

他成了他们的人。

他知道了本科生 2 个人，大专生是 4 个人，中专生是 6 个人，工人是 8 个人合住一间的住房条件。

知道了晚饭后，这个井形结构的住宅楼的阳台上，便密密的排满了整整齐齐的头和眼睛。看天，看地，互相看。看那些下雨的天空，看那些被阳光晒裂了的土地，看看彼此不变的神情。他还知道了不管你是皇上老子也要吃食堂里的大锅饭。他知道了1983年进厂的二十几个大学生创业时只有一个临时的锅灶。一条布帘就分成男女里外冲凉。知道了这段历史，他就不再多问多想什么了。能站在公司这个角度看问题，他觉得自己好象和过去有了不同。他们告诉他足球是不能踢了，地方小，一脚怕会踢出这个布吉镇。他们告诉他，如果闷了的时候，可以进深圳、深圳湾看看。深圳很热闹，深圳湾够气派。

他们还让他知道了在这里要娶上一个老婆也是做梦。虽然这里女工多，但她们的流动性太大，文化程度又多半是小学、初中。即使自己不计较这些，不把这些看得太重，而朝朝暮暮的在一起没有交流又怎么能行，即使不去交流，不去浪漫，她们的职业，今后的子女教育怎么办？他想去问问这些老兄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告诉他，要耐心，要沉住气等待缘份机遇。他们神秘地眨着眼睛……

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工作快一年了。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却又常常想起。他们粤宝上过报纸，上过广播，也出了大名，也曾引起我的许多思考。粤宝的魅力是什么？是这里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一流的管理？这里没有让他们失望？我是带着同他们一样的困惑告别他们的。

几个月后，我再去了粤宝，知道了粤宝最终没有让他

们失望。只是加速了他们成熟,适应了现代科学的步伐。

粤宝有发展,有希望,而他和他们也正是为寻求这种发展和希望而来的。所以他们是和谐的,同步的。

二、阿岭的困惑

你是 83 年进厂的。你说你经历了土锅灶,经历了布帘子,经历了创业。你看着这个厂由小变大,人员也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你也已经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变成了厂里的领导,厂里的骨干。

你来的时候也是面临着失望,你那时面对的和现在的毕业生面临的并不一样。你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不禁产生了怜悯。而如今你已经长大了,却无人再能听懂你的喜,你的悲。你感到自己有点象兄长象父亲。这 6 年中所经历的艰难又只有自己心里才明白。从一个工种换到另一个工种,从一个车间走到另一个车间,哪里需要到哪里,你说自己真的做了一颗螺丝钉。而做螺丝钉似乎已经过时。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一个受过新观念冲击影响的人,对做一个螺丝钉是不可能心甘情愿的。而这些谁知道? 谁又能给予理解?

如今专业刚刚稳定下来,你也正想大干一番。领导突然又把你从车间拉来做团支部书记……许多人羡慕你,而真正感到茫然和困惑的是你自己。你明白在经济发达的特区,团组织在年轻人心中的地位,已经不象从前了。关于这点,连你自己都不否认。现在来接这项工作,要巩固、发展它将是多么的不易。

你深深地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回绝，只要态度坚决些，凭自己的资历是可以做到的。是什么使你没能把理由摊出来？想不出头绪。你只是感到责任在压迫着你，你为此忧虑，为此不安。你还记得家乡吗？卖茶叶的阿伯第一次进城里的时候，竟不知人家递来的大票是多少。眼下的打工者，又能比认识 10 元钱聪明多少呢？讲卫生常识，讲社会公德，公民意识，他们能接受，能懂吗？难怪如今的大学生们忧虑、消极。也只有他们才能理解城市人去农村只能做殉葬品，农村的文盲移进城同样无用武之地的理论。

社会上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你没能力去解释和分析，你也无法回避身边的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今后将面临的命运。你真正无力回答别人，回答自己，命运恩赐与人的为什么不平等。

“蛇口风波”令你深感到自己的工作更加艰难，认识到马列主义要有专家学者研究，而自己的工作是用通俗的办法来做，去和他们沟通、联络。

你要去打消他们的自卑，你需要找她们谈心，请她们帮你去布置会场，请她们过来尝尝你的手艺……你从她们眼里看见了自信和感激。你还要和那些喜欢打架，喜欢迟到、旷工的男工们称兄道弟，要得到他们的信任，你还要用心聆听他们讲的过去和童年。而你有时候也发现了自己被别人当成了傻瓜，让人家耻笑不精明。

你努力的贴近他们，你懂得开导的意义。你说，等他们将来回忆起今天一段打工的生活，这将是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你说这段经历对整个社会来说，也许并不重

要,但对小人物来说,很可能会改变他们整个人生。

你每天都被这些事情冲斥着,激动着,苦恼着。夜晚的时候,躲在房里,你才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你才发现自己已被他们占据了……你知道这工作多么不保险不能让人放下心来。看着那些和自己一同来的大学生们已经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贡献,而你却做了这好汉不愿干,懒汉做不了的工作,迟早会把自己所学的专业技术给丢了。你恨自己的这种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性格。工人因人手缺,每个工种你都试过,显然,你看到了自己潜力和适应能力。但你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失去深化自己专业的悲哀……

此刻大概你才真正的领会了女诗人舒婷。“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肩上越是沉重/信念也越是巍峨/也许为一种苦难疾呼/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也许由于不可抗拒的呼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你也很羡慕社会上那些人,他们很现实,多拿钱,吃好,喝好,听劲歌金曲。而你却不能这样,在家中排行第一,你楷模的精神已经不能使自己对得起自己,你没有属于自己的错误,个性癖性,但同时也失去了自由。

三、阿英的迷茫

我采访的第三位是龙岗镇的阿英。

童年的阿英是一个苦命的孩子。母亲婚姻上不幸在她幼小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阿英很小就学会了操持家务,很小就会看大人的脸色,很小就从不与外人谈起

家。

而阿英是有家的。她有个父亲，父亲说时世造英雄，英雄造时世。那是在她没有考上大学，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说的。她出来已经5年了，至今还深深的怀念父亲的话。

父亲是对的。即使考上了大学也是需要工作的。上没上大学同样需要知识。如果努力得正确，说不准还会比考上大学的人活得更好。父亲是没有文化的，却知道好多故事，懂得好多道理。他用这故事来启发阿英。哥哥也说，出去看看吧，即便没做成什么也不后悔。

这些话，这些道理是对的，她懂了，但同时懦弱的小阿英就是一根鞭子，温温柔柔地把她赶出了家门，赶出了系牵着她灵与肉的故乡。

来宝安之前，她只是听别人说这儿好，这里和香港一样的繁华。但从未想过自己要去。直到现在她还怀疑，有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在广东了，就象一梦做到的。

“我谈过恋爱”。这时她的神情象是回到往事之中。“我出来了，刚走出村口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故乡，再没有退路了。一路上是眼泪伴随着我。我先是跟着一同出来的人学做生意，那时我才18岁，也就是我尝到了爱情的年龄……后来，生意失败了，男朋友也离开了。我打算去深圳，去广州看看。没有什么目的，那时只剩下了茫然。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一个人孤零零地缩在中巴里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当时车路过泥岗的街口，看见住家的墙上贴了一份招工广告，我突然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指使，我让汽车停下，

说我要下车，当时是喊出来的，是一种绝望的声音。全车的人都看着我……汽车开走了，我被遗落在了一片灰尘的后面，眼泪模糊了视线，我后悔了……当时我身上只有一个手提袋子，一张边防证，十几块钱。老板见我留着长长的头发，样子很纯情，就说，你不是一个做工的料，你的气质是做小姐的。

我能做工，请给我时间！我说。

第一天，只做了 1 个零件，一个只能赚 8 分钱。第二天就能做 10 个了。一个月的时候就能做 40 个了。这时正碰上过中秋节，老板娘从香港过来，到车间看我们，她一下看中了我，就对老板说，我的身上有一股大姐气。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就开始教别人干活了，直到 1987 年 2 月我才调到办公室工作。“办公室可是白领阶层了，会比过去好了许多吗？”我问。

“当然好！”她说：“但是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必须尽快培养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现在如果再让我重回到车间，我也能做。”

我又问，“难道这里不好？”

她笑了，“如果真的让我回去，我也是不情愿的。我是说，人必须有生存的本领，需要实实在在，也需要八面玲珑，既能吃苦，也会享福。任何人都不能抱怨什么，应该努力，应该改造……我很怀念在车间的那一段时光，那里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透明，不用做两面人，而现在不得不……”

“你现在坐了办公室，也算当了官，思想上有什么变

化?”

“有变化是自然的。人都是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当初老板如果不提拔，我或者已经走了。老板厂的特点是自由流动，东家不到西家，反正一样挣钱，老板一样赚钱。现在被重用了，我当然不想走了。这是我的一根绳子，抓牢了，可以顺着爬上去；放了手，自己就掉下去了。当初和打工的姐妹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恨，又一起感激老板。而现在我发现了我们已经有区别，有隔阂了。我现在再同她们一起，也有同情，但已经很客观了。过去只是向往留在宝安，我希望本地人能看中我，娶了我。而现在早已经不停留在这个想法上了。我现在倒是想嫁一个香港老板，只要他有钱，他不浅薄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找香港老板呢？”

“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跑马，六合彩已经有历史了。有不少东西已经以一种社会娱乐场所而被人们接受了。它们的存在不再新鲜。现在的香港青年主张‘杯水主义’，他们已经过渡到时下一夫一妻制。而我们这里刚刚开放，许多人对开放的理解还停在刺激、诱惑的满足上。这就很难讲有些人不受冲击影响。又很难预料女性们的幸福会不会给错了人。”

“许多人已经说你是一个女强人，你对今后做一个妻子有没有信心？”

“在我们的周围，大多数女人还属于未能摆脱狭隘、自私、嫉妒的时期。我不是说我已经摆脱了，但至少是已经认识了这些。有没有超越这种认识我还很难说。现在

来谈婚姻，谈生育我已经不会害羞，有的只是一种坦然和酸楚。我长大了！也许我会注定做一个后娘。女人应该温柔，美丽，善良，应该帮助丈夫。帮助丈夫实际上也就是为社会做事。我对做妻子很有信心。一是我的天性很适合，另外，我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我想要作为学问知识并且拿来己用。外人看我很强，而我内心很脆弱，没有人理解。”

“你已经 24 岁了，为什么还不打算结婚？”

这时，她的神情变得忧郁。

“我跟其他大龄青年一样的苦恼。人只要有了感情，也许就会有烦恼，并不是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懂得爱情、人生。我们同样也需要幻想，向往美好的生活。但我们的条件并不允许。在一段时间里，我的情绪低落，有一种深深失落感。星期天几个小时坐在房里发呆。作为一个不是靠文凭活在宝安的外地人，在这里要付出双倍的努力，自己要面对双倍的艰难。我没有钱，也没户口，前途未卜。有什么人敢来找我。你说，婚姻是不是门当户对？”

“你现在的机会比别人多，为什么不去深圳市区或蛇口试试？”

“如果我去市区，我会很普通，我比不上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我现在是半瓶子水，没人承认我。”

“那你现在是怎么打算的？”

“现在……”她沉思了一下，“现在我想上去，想搞行政，我不比别人差，我在上面一些人那里找到了我的自

信。我承认我的思想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纯情的少女思想了，我承认我的复杂和世故。现在我只是在使我的步伐和思想保持一致。”

四、新婚蜜月

他们的婚礼是在火车开动的那一时刻举行的。当亲人们的手臂高高扬起的时候，女孩子知道自己已经跟定了眼前这个人。此刻，他变得陌生而又高大，而她自己却被显得更加小，更加柔弱了。

告别的这一片土地是养育他们二十几年的大兴安岭，告别的是养育他们二十几年的父母双亲。在读高中时他们还不讲话，真正的相爱是在不久前。不甘心大兴安岭的宁静是他们相知相爱的媒。

旅途十多天，来到宝安，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了。找工作是在下车的当天开始的。一份地图一份边防证便伴随着他们穿行了宝安内外，看了所有的招工启示，找了所有的熟人，最后都以没户口，不会讲广东话，专业不对口而被拒之门外。

奔波了二十多天，身上带的钱也快花光了，却仍然没有结果。是放弃呢？还是留下来继续再等待机会。他们犹豫、彷徨。新郎说，那时，就只剩下怀旧和后悔的力量了。虽然也互相安慰、鼓励，但实际上各自的内心已经泄了气。

新郎说，他们的新婚蜜月是在希望、失望、挫折、失败中度过的。为结婚买的新鞋已经掉了底，它记载了他们这

一段特殊经历。本应该购置一些高档生活用品的钱也都做了路费。他笑着说，他们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他说，通过找工作他们认识到自己所学知识的单一、空泛，也缺少横向的知识结构。他说，出来的收获就是你有 5 个文凭，有满腔满腑的理论，实际工作承担不起，也是枉然，也照旧被卷了铺盖炒鱿鱼。我笑着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已经接受这里了。他笑了，告诉我，接受还不敢说，倒是能够适应和正视。他看着新娘，然后又转向我说，我们现在刚刚解除“私奔”的怀疑。他说，找的前几个单位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他把结婚证拿给我看。

我问他工资怎样，他告诉我，已经够用了。他没有讲到底是多少，公司将来有发展，当然不会亏待了他。再则，自己又不是仅仅为了钱才来这里的。能被重视，能发挥自己，这才是来宝安的目的。

我再见到他们的时候，新娘已经把留了几年的长辫子剪成了短发，飘飘扬扬的披在肩上。一根粉色的发带是新郎进市区给她选的。

他们穿上了广东的衣服，如果不讲话，真还有点粤味呢。

我问他们想不想家，新娘眼圈有些红了，新郎也低下了头。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家的时候，还是成天无忧无虑的孩子，吃穿用什么都不用操心。他们想念父母和兄弟姐妹，想念那个苍苍茫茫的大森林，想念那一望无际的大雪原……

他们留下来了，或者会永远的留下来。有一间房子，

一张桌子，还有一张床。这便是他们的“家”。一个电炉，一个锅，便支起了一日餐。高兴的时候，还包起北方的饺子。我问新娘，想不想要个孩子。她红了脸告诉我，她喜欢孩子。她说，现在可不敢。自己都还是黑户口“嫌疑户”，有了小家伙，那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情景呢？

五、“阿梦”们

去龙岗镇的那一个晚上，住在工业区里，朦胧之中听见有人私语。听下去，才知道是说制衣厂里打工的阿梦跟一个司机走了两天，现在还未回来，怕是出事了。

等到第二天再也没有听人提起这件事。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就这件事又采访了工业区的一位负责人。

问：请问类似这种现象是属于偶然呢，还是很常见的？

答：很难说这是不是偶然的。从社会这个角度看，她已经逾越了道德这个界限，而走向了一种违背它的道路，从我们传统的生活轨道上偏离了正常的自然发展方向。而在工业区这个特殊的背景下，这又并非一件大不了的事。人们追求不一样，对幸福的理解也就不同。行动上也就不能要求人人是一致的。例如阿梦，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用是和非来做结论，也不能把责任推给哪一方。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大概都离不开社会的、家庭的、自身的以及其他因素。有的人是为钱，有的是为了报恩，有的是寻求刺激。而更多的女工是因为有依赖心理，她们以为这样做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们的内心很空虚，缺少一种寄托。

问：你是不是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对此引以重视？

答：改革开放的确是一件好事，不然这些女孩子是没有机会出来的。出来见世界，丰富自己，掌握一定的技术。但一些更重要的问题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虽然不是很突出，但再过1、2年这些问题将是严重的。70年代台湾，新加坡也出现了“三来一补”的加工业，他们的情况也和我们现在一样。但最后他们是采取了什么措施呢？我们国家近年来派出了不少经济学家出国考察，但最终有没有参考其他国家、地区针对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而拿出一套可行的办法呢？

问：你认为造成阿梦现象的客观原因是什么？

答：特区的男人变了。你不应该奇怪，他们是随着潮流变的。我指的是部分男人。他们受港澳地区的影响较大，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好的，有深度的，他们懂得分析事物。可以说，他们经得起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考验。加工业地区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前几天，我在街上看见了几个女孩子在攀摘树上的花，每人摘下一朵戴在头上……我看了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大概她们还不会有林黛玉的那种借花怜己的修养。但她们的确很让人同情。那些已经做到管理员的女工们就能理解到，理解他们的幼稚、冲动以至做出的错事。因为这些人的身上也有自己当年的影子。

有些男人们有这些特殊的背景条件，而女工又对自身无法回避的复杂身心缺少足够清醒和认识。有小部分女孩子是寻求刺激，而更多的人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们

对幸福的理解还比较传统，他们寻求的是感情依附。不能说这些男人对这些女孩们是强行的，但我认为可以算做趁人之危。这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的事，法律也没办法。

问：女工们目前所忧虑的是什么？

答：大概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清楚的问题，即何去何从。目前来讲，在加工业中有一部分人愿意干下去，但又深知前景并不乐观，她们在思想上是有准备的。有的人从来就没有对宝安能留下他们抱过幻想。真正痛苦的是那些有头脑，有思考，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也就是22、23岁以上的那些人。她们知道自己不能在这里干一辈子，而又已经把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最美好的时刻扔在了这片土地上，扔给了他们的老板。这里有他们的眼泪，也只有这时才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而最终赚得了一个疲惫的身心和已经大龄这个现实。虽说有了思想准备，心理上就能平衡吗？

现代人，知识界的那种“家园感”“孤独感”在他们身上也有了体现，当初她们出来，代价不仅仅是失落了身后的家，同时又是前途中应该有的家的丧失。

最后我们的话题又回到阿梦身上，我问他，老板会不会炒她。其他女工会不会吸取教训。

他说，一般不会炒，因为这并不侵犯老板们的利益。但如果有了后果，却是很可能的。说到吸取教训，四川的阿梦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有自信能赢得男人对她的青睐。至于她现在和那个司机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很难

讲。过去和她要好的小姐妹因为不支持她的“爱情”而决裂了。如果真的她已经失身了，也许她会后悔当初不听忠告。如果那位司机已经有了家室，阿梦也会对自己的这份牺牲感到值得，并且为自己冲破了“牢笼”而感到自豪。你问女工会不会吸取教训，什么教训？大概她们的理解和外面的人不一样。对阿梦这样的事，一是认为不是什么奇迹，二是虽然会对阿梦上当受骗加以嘲讽、讥笑，但不会想得更多。但轮到自己，同样是很难处理好的。

问：你认为主管部门应不应该对这样的事予以考虑。

答：工业区流传着一句话：上班机器人，下班木头人。还有宿舍、工厂、饭堂三点式之说法。1986年团支部进了厂，1987年有了巩固，1988年才真正活跃起来，经常组织一些活动，老板也出钱给工人放放电影，现在筹备录像放映室。做这一切，实际上是说明，工业区已经对工人的业余生活的单调给予了重视。当然，这些还太不够，如果能开个夜校，能开展一些培养工人对企业的感情，工人对社会的义务教育，合适的时候发起一些演讲，办个图书室才好。

特区以及特区附近出现了各种治疗性病的广告。这很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不能不说与女工们对自身的不尊重没有关系。但绝不是几篇文章呼吁就可以起作用的。内地来宝安的女工大都是18—21岁，甚至还有更小的，由于她们文化水平很低，对人生，对社会还缺少了解，世界观、人生观还没有形成。而这个年龄又正是身心成长发育的重要时期，它并不以你是否真正成熟，真正懂得了什么

才到来的。它迅猛的袭击，不容你思考，然后就很快的离你而去。这一事实是每个人的必经之途。许多人过来了，都有一种“后怕”“万幸”的感慨。这些女工缺乏引导、教育，当然就有人过不了这个危险期，成了它的牺牲品。那些心术不正的男人们正是利用了女孩的这种“时期”，及这一时期所具有的虚荣心和无知。

问：你所指的“时期”是不是泛指生理的。

答：生理上是一部分，而关键的还是指这一时期她们的幼稚和对事物的猎奇心理，也就是精神方面。我以为一般插足的第三者或者象阿梦这样的女孩，不可完全理解成生理的。20岁之前思想大都是一种萌动、无意识状态，只有到了23岁以后才可能是生理上的需要。但那时她们已经理智了，冷静了。可以说，她们已经不会为生理上的需要而做错事了。

六、“学佬”阿永

阿永是潮州人，这里人叫他“学佬”。

阿永是我在龙岗工业区采访的唯一男性。他个子不高，却很结实，也很健谈。见他之前，我就知道了他已经在制衣厂做了管理员，并且还是厂里的技术人员。

当我问起他是怎样看待企业管理中的弊病时，他告诉我说，在外来加工的企业中，老板普遍存在着雇佣思想。不好了就骂，再不好就炒。实际上工人是很有良心的，你对他好，他当然不想走了，也会好好的干。一些刚刚出来的青年，他们刚从父母那里走出，他们听惯的是父亲恨

铁不成钢的骂，但它是完全不同于老板的骂。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们当然就不想做了。最终要说的是老板对工人的感情投资太少了。当然老板大部分都很好，在他们身上有我们内地人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的人际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所表现的形式不同，其导致的结果也不同。内地人比较讲究关系，请客、送礼大量存在在企业中。香港老板却是看能力看水平用人的，无论父子、兄弟也都一样，凭本事吃饭。所以前者导致企业无用的人多，白吃饭的多，造成企业人员臃肿，影响了人才的利用率，影响了生产的发展。而后者恰恰能收到一种推进企业进步的效果。

我问到，你感到做管理工作难不难时，他只笑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他说，你付出了汗水把厂管理好了，却没有人领你的情。如果上面来人问到老板，阿永这个人怎么样啊？老板肯定不会说你好。但上面如果要调你走，老板肯定又不会放过你的。

“你在工作中怕什么？”我问。

“怕走私的”，他说。有的老板委托手下的人来暗示你合作，问你想不想多挣点。

我问他有没有这个胆量。

他说，老板是很有心计的人，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弱点。他的暗示带有启发性。内心防线如果不坚定，就很容易做了俘虏。我呢……不够胆……他笑了。

再怕的就是老板和公司有时候关系很紧张。这种外来加工是一个横向的关系，做个管理者你要服从老板，也

要服从公司。当他们双方产生误会，也就把你忘了。

你是怎么做上管理工作的？

当时工业区招一批管理人员，用考试的办法。那时我就背着老板报了名。考试的时候很有信心，因为毕竟工作的时间长，而且是做会计工作，跟厂长天天泡在一起。厂长老了，我就帮他，联系实际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也就有一种优势。

我问他，如果将来这种外来加工业不再继续了，你怎么办？

他说他要请求贷款，租下厂房自己来办。如果这样不行就带着技术回老家或看再到其它地方去做……

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他，听说你要结婚了，有人说有许多女孩子在追你。你真是好运。

他苦笑了一下，严肃的对我说，追求我的确有，但不是我本人有多少魅力，我缺少风度。这里的女工使我很同情，我就象看见了家乡的那些姐妹们。她们在外面缺少依靠，有的缺少把握自己的能力。他们对前途仍然是未卜，而她们又有着强烈的归宿感。他们需要有责任感的男人来保护。至于他们看上我，是我长得老相一些，成熟些，她们自然会有一种安全感……但我还是决定娶一个。他幽默的笑了。

七、家在大鹏湾

华杨是不久前我在宝安认识的一个女孩。她长着一张娃娃脸，一双大眼睛。看到她感到很亲切。

看见她我就问，你是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又在大城市读大学，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她的眼睛变得忧郁起来。她说你不知道我过去是多么胆小和脆弱，闯荡世界也不是我的本性。现在有时还象在幻觉中迷失了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坚硬的外壳还能维持多久。我的性格适合宁静。我做不了女强人，也没有想过要离开家。但毕业前夕的那次家对我的伤害很大。我回去联系工作，就是那些昔日的同学、朋友把我拒之门外。他们不希望我回去抢了他们的饭碗。学校研究分配方案的时候，昔日情同手足的朋友、同学都撕破了面子，有的见了面都不讲话。后来就有几个女生靠姿色，靠关系有了好工作，剩下的也只能无可奈何的被发落。这一切几乎是在同一周内发生的。我还没有来得及细想就接受了这一事实。当然了，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当时还感到迷茫与困惑，而现在想来才知道自己那时太单纯，太天真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下了决心远走，现在想起来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她笑了。

你是学艺术的，到这儿来能适应吗？

既然走了，漂了，自然也要开始有了本性，有了性格，有了坦然和洒脱。刚开始也有人在耽心，我一直是生活在另一个环境里。我自己也耽心能否习惯这里。但习惯了就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个人应该能适应喧闹，同时又能享受宁静。自己是干什么的，适合干什么，心里应该有数。即便眼下条件不成熟，又干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但也不能被潮流吞没。认识自己，把握自己很关键。宝安

还会更开放更有发展，的确充满了诱惑。而艺术使人不能把握自己，做了建设时期的殉葬品也是有可能的。这里毕竟是人才聚集的地方。这里氛围好一些，虽然大家也都是在赚钱，但又区别于纯商人。这里的时间观念、价值观念也区别于内地。虽然不能用好或者不好来做结论，但至少给我的感觉是焕然一新的。它能使人振作，能使人重新估量自己，思考自己。这里的确是一个窗口，在内地你看不到的，在这也许就发生在你的面前；在内地不敢想的，或许现在你已经开始做了。

你认为搞艺术这里有土壤吗？

客家的山歌很美，大鹏湾的潮很迷人，南澳的婚嫁很特别，这里的空气有味道。大自然就是艺术，生活在艺术中不是很好吗？你要承认深圳是个疆场，宝安是个大世界。各种人各种事，大浪淘沙，真金在宝安深藏。进来你当然有机会相识金。理论在学校，修养的完善，实践的检验却在这片土地上能够得到完成。这里不同于家，在家里你如果摔下来，就会有人接着你，而不至彻底的垮了。在这你也可以失败，但也许你是拿老本换来的失败，再爬起来就很难。所以你必须先成熟，先把任何结局都想到。来这儿是读实践的研究生。我觉得读了这里的课程，大概再经历了什么，再到什么地方，自己也都不怕了。

你来这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是别抱着太大的希望来。因为这里并非是净土。宝安是有韵味的，但它并非是你一来就能发现的。它需要你慢慢来，慢慢看。有好多人等不及了，撤了。

当然他看不到后面的好风景。

你后不后悔？

刚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一到下班，一个人往宿舍走的那个时刻，眼泪几乎是情不自禁流下来的。但我现在才知道，人应该有感情有眼泪，但自己最终不能被眼泪吞掉。想干事业就不能把自己沉浸在回忆的伤感之中。现在我不后悔了，走出来也就是对自己能力的一次考核，也应该有点破釜沉舟的精神。有这种机会应该看成是命运的一种恩赐。我是在这里才有了独立意识的。现在我才知道人只活在一个地方，真的是一种遗憾，可惜了他乡的月亮白白的光辉。现在，好景色，坏景色我都想看看，都不想放弃。

你今后是怎样打算的？

从内地来的人，还有较强的虚荣心，总怕被人认为是出风头，总死要面子。所以失去了许多机会，而又有一些人迅速的跟上大潮，把虚荣心变成了一种能力，而不再强迫别人能看得起自己。我过去很爱幻想，现在已经学会了脚踏实地。如果有条件，我可以到歌舞厅去演唱或伴奏，做这个我有自信。有人说我适合做公关小姐，我也相信自己能行。将来怎么办？开商店做生意也是我想过的。

我问她，想不想家，有没有给家里人写信。

她的眼圈有些红了。她说，想家……我第一次出了这么远的门，当然想家，有时刮风下雨就更想。有时别人一句不相干的话，也会无缘无故招来自己的眼泪。给家里的信也写了，告诉父母我很好，虽然不一定真的很好。也没

有什么可以报捷的……其他人，我没写信，收了信也不回信，主要是自己的孩子气，那个劲我还没转过来。虽然也算想通了。不过……我想迟早我会写信。

后来无君对我说：在宝安的天空下，我认识了他们，认识了这些充满痛苦、欢乐的生命。南迁，是心灵的迁徙，南迁，有的难言，有的已经变得无言。

午夜，午时，当这座新的移民城回响起万家的破竹声时，不知有多少个游子在那一刻泪洒衣襟。

而宝安已成了他们的海和岸，缔结着他们的灵性和血肉。

宝安是他们的歌，他们的梦！

2. 水一样的蛇口女孩

夕阳染红了蛇口的半个天空。

许许多多匆匆朝同一个方向出发，又匆匆朝同一个方向归来的身影，从一条条单车道上掠过。

她们——蛇口的打工妹在街道上，在海边的沙滩上，在焦急的单车铃声中留下了孤独者，探索者，寻金者的叹息声，欢笑声……

蛇口不相信眼泪

按着电话簿打了十几个电话，终于有一家公司说有康刘虹娜这个人。

“康刘虹娜吗？”一个客家妹的声音，很甜很脆：“她今天不舒服，请假在家。”

她把地址告诉了我。

那天是细雨霏霏的下午，我骑单车去找她。见到她是在四海一个单人房间里，她坐在铺着蓝天鹅绒的弹簧床上，玻璃窗边一张木炭临摹的“蒙娜丽莎”似乎在对她微笑。

她熟练地抽出一支香烟点上，3个烟圈从她的口中吐出来。慢慢扩大，袅袅上升……

康刘虹娜来蛇口纯粹是为了爱。男友B仔从故乡被招聘来当业务经理，一去3年，竟与老宝安渔民的女儿成了夫妻，她竟毫不知情。

结果，在情感完全绝望，经历了严酷的精神煎熬后，她接受了无可改变的现实。经过一位忘记了姓名的女同学介绍，她进了一家电子厂，见工时，瘦猴似的老板皱着眉头把她从上打量到下：

“日班不缺人，你只能来上夜班。”

她被安排做一道最简单的工序，工友们象观赏怪物似的，审视她土气的衣装。康刘虹娜埋头不语，默默不声，任凭四周射来的乱箭刺痛她的心。

当年在家时，她大学考了3届，3年都以几分之差落选。妈妈拿着她的高考成绩单，指着在病床上的父亲对她说：“何必去考啥子大学呢？趁早出去打工，最好到深圳投靠B仔，也好帮补一点家用。”康刘虹娜默默地收拾好简单的行囊，挥手告别了故乡的山和水，没想到B仔竟

.....

一次偶然机会,改变了康刘虹娜的命运。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天气特别的寒冷。她因没有带伞,宿舍又远,不敢硬冲回去。雨停了,天也黑了,厂里有一批货急待发出。人都走光了,瘦猴老板急得团团转。当她低着头走过老板面前时,瘦猴老板叫住她。问她懂不懂英文验货,于是,她留了下来,两个多小时便把货全部发出。

“嘿,你倒挺不错的嘛。”瘦猴老板又一次把她从上打量到下。不久她被调去搞 QC 工作,不再上夜班,后来又调到写字楼负责一些流水线的管理工作。她认为蛇口不相信眼泪,第二年便通过成人高考考到深圳大学管理系读大专班,并抽空学会报关、财会等知识,偶尔还写写诗,当然从来是锁在抽屉里自我欣赏。

康刘虹娜终于炒了老板的鱿鱼,她连续“跳槽”,已转了 7 家公司。现在是第 7 家公司的经理助理。

她边说着自己的简历,边拿指甲油把 10 只指甲都染上了不同的色彩。

她说现在时兴单身贵族。前些日子她炒股票大大赚了一笔,于是,又想有个家。

临送我出门时,她挽着我的手说:“安子,一见钟情的男孩子一定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坚信这一点,你认为呢?”

最后这句问话,又使 I 不能不怀疑她的“坚信”。

似水流年

叶茜合上眼睛，不知过了多久，她神思模糊，忽然发觉自己的眼睛已经睁开，她似乎睡了很久，但又仿佛根本没有睡过。在她身边的“雨”则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今夜，叶茜觉得那滴滴嗒嗒的钟声象一种透明的液体，时时刻刻在漂白她的青春。5年了，从18岁到23岁，她来蛇口整整5年了，一分一秒，全是青春的液体……。

叶茜刚来蛇口的那阵子，整天想家，想在家里度过的美好时光。她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茫然跑到海滨公园去看对岸香港那一溜子珍珠似的灯光。她记得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她一个人坐在海滨公园的水泥栏杆上看海，感受那一股股浓浓的鱼腥味——那是海的气息。这熟悉的感觉可以宽慰她思乡的情怀。“雨”就在那一刻无声地来到她的身后，站了一会，说：“快回去吧，夜已经凉了。”然后他不再说什么，默默地把一件褛衣披在她瘦削的肩上，直到“雨”消失在灯火阑珊的码头上，叶茜才伏在栏杆上大哭起来。

那时，“雨”是某公司流水线线长，有工业区户口，喜欢游泳，打球。他第一次见到叶茜就被她清纯的气质吸引住了。18岁的叶茜带着天使般的微笑令许多男孩子心醉。尽管这儿男少女多，追求她的人仍不少。“雨”便是其中的一个。

当初，叶茜心里只有远在澳洲的立强一个人，她来深圳其实是为了逃避那一段离情别绪。在一阵“洋插队”的

旋风后，立强“插”到澳洲去了。他有一个很有钱的舅舅，叶茜没有。立强走的那一刹那，叶茜便觉得自己会永远失去他。

果然，一年后叶茜便接到立强和她分手的信。她早就听说他舅舅为了使他达到移民的目的，给他找了一个洋姐。不知为什么，她并没有多大悲哀，反而觉得得到了某种解脱。

“雨”时常悄悄来到她身边，叶茜有什么伤心事，委屈事也喜欢跟他诉说。当“雨”向她表达爱慕之情时，她平静了的心又开始骚动了。实际上她很喜欢他，但又不敢接受他的爱，每当他谈到这个问题时，她总是顾左右而言它。她目睹了公司的一个同事因男友怕她户口迁不来，最终将她抛弃的事，那女子痛不欲生，曾想一死了之。

“雨”极有耐心，以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她的爱是不掺任何杂质的，足足让叶茜考虑了3年多。

谁知，在一次工伤后，“雨”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说有可能毁容。“雨”觉得自己一切都完了，足足等待了3多年的叶茜会怎样呢？他告诉人们不要让叶茜知道他的情况。

第二天，她却全知道了。叶茜请了一个星期假来到医院陪他。手术顺利进行，出奇的成功，“雨”的脸上留下一个伤疤，但叶茜则说：“笑起来象一只迷人酒涡！”

“雨”在叶茜面前流下了感激的热泪，两颗心从此连在一起。

叶茜是大连人，户口很难调入蛇口。自从有了“雨”这个安全的港湾，她似乎不再想户口的事。为什么要为自己

办不到的事忧伤呢？“我生活得很幸福——”叶茜对我说：“我就准备这样生活下去——20岁的女孩子，不应该老想着明天会怎么样。”

浙江妹子

不管怎么说，徐娟有了自己的房子。

她安置房间的狂热简直令人吃惊。从长满凤凰树的故乡回到蛇口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有停过。旋风般地，一会儿新房，一会儿商店，锅碗瓢盆，杂七杂八的，见什么就买什么，因为过日子缺什么也不行，而她又什么也没有。

来蛇口这么多年，徐娟最大的收获是自己拥有了一个小房子。再也不用回到那几十人一个大房的铺位。再也不用回到令人头昏脑胀的流水线。再也不用上下班等在打卡钟旁听那单调沉闷的嗒嗒声。嗨，从蓝领阶层提升到白领阶层，徐娟觉得日子该过得有滋有味才行。

4年前，她从浙江招工来蛇口某服装厂时高中都未毕业。全家7口人就数她最小最娇。家乡只有唯一的一条小路，常年累月，都可以看到一个小伙子匆匆行走的身影。父亲是生意人，不久便和小伙子搭上关系；以后他便来她家坐，穿得斯斯文文，坐得端端正正，问话答话极有礼貌。家里人对他甚感满意，后来徐娟才弄明白那小伙子是冲她而来的，青春萌动的心多少有点骚动。再后来她发现小伙子是帮人杀猪的，因她自小就怕见血，真的嫁给他，以后天天穿一身血衣回来，不把她吓个半死才怪哩。为这事她偷偷跑到树林里大哭一场。

刚好那时县里与祖籍在家乡的香港人合资在蛇口办了一家服装厂。“那人没出现前，我从未想过要离开家乡；他出现后，我离开家乡的念头愈来愈强烈。有这样的机会，我便带上简单的行囊，带上对‘香港合资厂’这个诱人字眼的无限想象，带上写满老师，同学临别赠言的笔记本，便来了。”

“你家人知道你离去的原因吗？”

“不知道，我只是告诉父母，很想到蛇口去闯一闯。或许一两年就回来了。现在已过去4年，我又签了两年合同，厂里给我分了一间小房子哩。一起来的兄弟姐妹们大部分都回去了。父母也三番四次地来信来电催我回去。”

“那小伙子知道你在回避他吗？”

“知道是后来的事。他也是明事理的人，婚姻大事岂能强求？现在他和我父亲依然是很好的朋友。”

徐娟凭着农村姑娘特有的聪慧与灵巧，虚心向香港师傅学习时装设计，整日整夜在几百台电缝纫机间出没，从最简单的工序学起。记忆中，车缝工场里，永远弥漫着女性的体味和丝绸味，这种混合物的味道深入她的肌肤，使那些穿着工装上下班的其他打工仔、打工妹一下子就闻得出来。“现在总算好了！跟香港服装设计师搞设计。我设计的秋装款式被一个日本人看中。一预定就打了几万套，为厂里立了大功。”

现在，徐娟一切都“准备就绪”，她托着腮，躺在床上听楼梯口的声音，等待心中的白马王子来敲门。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天，又一天。

徐娟最大的愿望是挣够钱自己开一家时装店，里面全摆满自己设计的新潮时装。她要让女儿国的姐妹个个打扮得美丽可人。

蛇口这个家

阿新从不相信自己真的会扎根蛇口，她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被人称之为“试管婴儿”的地方。那是别人的城市，自己只是偶然在这里作客而已。每逢礼拜天来临，不是自己跑到深圳去看哥哥，就是哥哥跑到蛇口来看她，那种来回奔波的感觉，委实使阿新觉得自己纯粹是客家人——自己的祖辈南迁广东已上千年了，依然被这里的土著称之为“客家人”。

一次偶然的“巴士奇缘”，改写了她一生的命运。那天，在由深圳开往蛇口的中巴上她遇见了钱生……

“哦，你叫阿新，挺象香港电视卖二合一洗发水广告的女孩，既清纯又温柔……”钱生几乎是用了一箩筐的漂亮形容词来“轰炸”阿新的芳心。

谁也无法拒绝钱生这种男孩眼睛里的殷殷情意。阿新毫无顾忌地把水湾头的地址告诉了他。并且对他说，那是10个人一间的大宿舍，连一张坐的板凳也没有。家信都是坐在地上，靠在床板上写的。

一直到分手，阿新都不知道钱生是干什么的。直到第二天晚上，有一个穿海关制服的人站在阿新的门前，迎接着20只温柔眼睛的美丽注视。

拍拖不到一年，阿新便做了新嫁娘。

“我是绝对相信缘分的。与钱生有缘相识，他又不计较我是打工妹，我还忧虑什么呢？”阿新后来告诉我，她的先生一边在蛇口海关工作，一边在培训中心读深圳大学金融贸易专业的夜大。在他的督促下，自己也夫唱妇随，啃起书本来。

多一点书卷之气，或许可以使婚后的生括更加美满。阿新有时环视海关宿舍里淡蓝色的窗幔，觉得蛇口真的是属于自己的了。如一首歌里所唱的：“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好倚靠它……”

是啊，来蛇口将近6年，要不是遇见钱生，要是那个钱生是个孬种……她悠然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谈起她的过去。哦，在蛇口作者的一篇小说里，就有自己的影子：“在迪斯科和香港电视之间，在人头马和可口可乐之间，在牛仔裤和唇膏耳环之间，在港币外汇券和人民币之间，在炒鱿鱼和招聘之间……我昏头转向，天旋地转，不知我是谁。”

如今阿新觉得非常充实，再也不用惧怕从蛇口的人流中消失，如同伶仃洋大潮淘去的一颗沙粒……尤其是她与钱生并肩走进培训中心大楼的时候，那有家的幸福感紧紧地攫住了一个普通打工妹的心。

甜咖啡，苦咖啡

在中学的一个派对上，节目主持人桑桑问大家：春日的鲜花、夏日的小溪、秋天的月亮，冬天的太阳，你喜欢哪一种？据说，这是一个测定人格品性颇为准确的考题。汪

浩回答说喜欢秋天的月亮，结果被定性为“多愁善感”型。

也许真的是这种类型的性格，要不汪浩在大学时读的虽是精密机械系，但却在校刊上发表了许多让女孩掉眼泪的情诗。其实那些诗都是写给桑桑的。

来蛇口后，汪浩整日价走马灯似地跑业务、签合同，与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一天下班后，当他要绕过红白相间的栏栅进入菜市场的时候，猛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他。他一抬头，怔住了。

哦！桑桑！是我昔日的桑桑吗？高中3年，他们彼此爱慕着对方，并相约要报考深圳大学。

后来他如愿进入那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而她则在嘉应师专读中文系。第三年，她毕业后给他留下话：过几年我们俩再相见。自此杳如黄鹤，不知芳踪何处。出国了？移情别恋？大学最后一年汪浩也面临找工作的困扰，给她去的信函被退了回来，汪浩对此唯有苦笑不语。

现在他们终于见面了。走进附近的一家咖啡屋，他俩在一个临窗的角落坐下。桑桑给他加糖，他不要，呷了一口，故作轻松地对她说：“不加糖，这味道很舒服……”

“你知道吗？我们家在这买了一套房，三室一厅，爸妈说找到你便接你来住。”桑桑说3年来最大的收获是举家迁入蛇口，成为蛇口人。但一直在找他，“我不是相约几年后再见吗？多好，浩子，我们终于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桑桑，我——”汪浩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一会是小芹的影子，一会是桑桑的笑靥。唉，他顺手叼起一根红健，

喷出一口浓烟。

“蛇口是改变人的地方。3年，你音信全无，我很苦很累，左腾右跳，好象失去了自我。有一次我喝醉了酒，被老经理扶回了他的家。那次之后自己麻木的生命好象再一次得到重生。”

只有爱情才能使人的心变得年轻。桑桑听出了一点眉目。

“我认识了老经理的女儿小芹，是个挺文静善良的女孩。第二年老经理因车祸过世了，临走时留下遗嘱：希望我照顾好他唯一的爱女……”

“不要再说下去了！”桑桑叫侍应生来一杯浓浓的苦咖啡，调着，调着，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我原想……等你3年，让我也成为真正的深圳人以后再与你平等地相爱，我总想不通过你自寻一条出路，现在全家人都来了，你却——”

“桑桑，请原谅我！”

“原谅？一句‘原谅’要用多大的代价来替换。”桑桑信口说出来的话，心里又不是这样设想的。“就当是一场梦吧。哦，不要让我遇见你，不要让我听到你的任何情况，你走得愈远愈好……”

.....

在蛇口半岛诗会的一次诗朗诵会上，汪浩给大家朗诵他的诗《甜咖啡，苦咖啡》。会后他告诉我这个故事。当时小芹也在场，她说桑桑后来出国去了，通过信件交往，她们倒成了一对铁姐们。

魔方世界

“当初是我主动提出与他离婚的。也许真的是爱得深恨得也切！我承认自己是误解他了，但当时我怎么能接受他和那个叫雨婷的女人拥抱在一起的事实呢？我不让他有解释的机会。”

刘梅终于意识到离婚对自己而言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了。

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梦想，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深渊。婚姻尤其这样。刘梅与丈夫一同奔赴蛇口的时候，那里几乎还是一片荒滩野岭。能彼此相爱并有了一个孩子，风雨兼程，这个家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但是，那天她因事提早下班，拧开门锁的那一刻发现世界倾斜了。那个被自己称之为丈夫的男人竟然与一个叫雨婷的女人拥抱在一起！

“离婚！我要和你离婚！”刘梅几乎是失去了理智吼叫着，哭泣着。

“梅，你听我说好不好。雨婷那天是在跟丈夫闹离婚，我们碰巧在街上相遇，我看她伤心过度，可怜兮兮的样子，是想安慰她……”丈夫几天来都这样温言软语地向她解释。

“为什么偏偏是雨婷？为什么偏偏是你经常在我面前挂念着的旧恋人？她不是在跟她丈夫闹离婚吗？你跟她去结婚好了！”刘梅因爱而恨，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绝境，丈夫怎样解释也没用！

想不到丈夫也真的跟自己离婚了！其实刘梅是不想这样的。但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再也难以收回。

人都很难靠回忆过日子，尤其是在蛇口这种环境日渐物化的地方。离婚后，9岁半的孩子从天真活泼变得沉默寡言。老师说，这孩子一向品学兼优，好学上进，这些日子却啥活动也不愿参加，经常一个人郁郁寡欢，有时候无端端的泪眼汨汨。

刘梅在一家公司的电话总机做接线员，每隔一星期上一次中班，午夜才能回家。孩子没人照顾。常常是她上班前弄好晚餐放在锅里，第二天没等她醒来孩子已跑去上学了。母子间越来越变得形如陌路。她对孩子怀有深深的内疚之情。本来孩子是无辜的，他应该在温馨幸福的环境中快乐成长。现在却因为自己与丈夫的婚变，使他幼小的心灵承受了如此之不幸的负荷。

有好几次，她渴望与儿子沟通一下，但他总是回避她，使她更加体会到这个家的破碎感。当初要是不那么冲动，伤丈夫的自尊，把他逼到绝境，也许就不合有这种局面了！

面对儿子投过来日益陌生的目光，她觉得自己实在很想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孩子！你受委屈了！”哦，真不知如果他永久没有父亲，以后的人生会是怎样一种情景。想想当初从法院出来时竟可以潇洒地对丈夫说一声“再见。”这一声“再见”下面是一颗弱女子受伤的心呵！往后的日子，这诉不完的幽怨，讲不尽的委曲，又该向谁倾诉？

据说后来是孩子小学的政教处主任从孩子那里了解

内情以后,从中调解,使刘梅和丈夫和好如初。

见到刘梅是在“海之夜”歌舞厅。那天正好是她小孩10岁生日,看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唱起“HAPPY BIRTHDAY……”,有谁会想到他们曾经历这样一次惨痛的婚变呢?

大千世界仿如一个魔方。有人玩得潇洒自如,有人弄得焦头烂额,不知你是怎样的?

爱你没商量

秦燕不是普通的打工女孩,因为她喜欢写些诗歌。但深圳长年的气候没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没有四季的情愫可吟诵,诗歌于深圳简直是生活的奢侈品。

就是这样一位多愁善感的女孩,对婚恋的看法却多少令人惊讶。秦燕关于蛇口青年婚恋自由——先试婚再结婚的言论被某大报记者整理成文字发表后,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秦燕说那是工业区的事实。不久,也成了她的事实。

1987年她考入深圳大学中文系大专班,认识了叶伦刚。叶伦刚是本科生,管理系的学生会负责人。那年暑假叶伦刚到秦燕的公司实习。“嘿,堂堂一个学生会主席也来车间搞手工包书。”很多打工妹感到新鲜和好奇。秦燕觉得很正常:“哼,大学生一出校门就是社会的小学生哩。”

叶伦刚饱尝了作为一个打工仔在生活底层里奔波的艰辛,他与普通打工仔一样上下班都打卡。公司里关于秦

燕的一些传说使他觉得饶有趣味：秦燕刚到公司时纯粹是一个土老帽，大红大绿的衣着，颇不合时尚。更有甚者是人家闲暇时聊天，谈布什，她竟正儿八经地追问：“布什是干什么的？哪里人？”到现在公司还传着这个笑话。

叶伦刚觉得有必要认识秦燕，想不到认识她以后居然会把她当作至爱的女友，一年后结婚。两个人由相识到相恋可谓深圳速度：一个礼拜。而由相恋到结婚则马拉松般持续了一年。

叶伦刚毕业后很想在社会大展拳脚，他选择了打老板工，当 QC 仔，珠海与蛇口来回跑。而秦燕读的是星期天大专班，两人见面的机会只在晚上。两人工作都挺忙，爱情也忙。叶伦刚在秦燕公司附近租了个当地渔民的房子，两人筑起了爱的小巢。

杨春是一位善良的女孩，她一直敬慕着叶伦刚，叶伦刚却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妹妹。杨春的父母虽不赞成女儿在大学就拍拖，对叶伦刚则赞赏有加。认为能找到叶伦刚这样有学识的女婿，也是他们独生宝贝女的福份。

而叶伦刚却迷上了秦燕。当秦燕与叶伦刚同居的消息传到杨春耳中时，她抱着一线希望，想去说服叶伦刚。

“我可以帮你游说人事局，补办一个干部指标。”杨春说得很诚恳。由于叶伦刚没有及时把关系从大学转到人才交流中心，把干部指标弄丢了。因为市府有文件规定：深圳大学毕业的学生可当工人，也可当干部使用。当干部的半年转正。叶伦刚由于工作忙，耽误了此事。杨春便决定以此为突破口。

叶伦刚听出了杨春的弦外之音，叹了口气：“小杨，我现在已别无选择，我不可能再去办一张结婚证。”

“你结婚了？！”杨春愕然。

“差不多要领结婚证。”叶伦刚说：“一个人在爱得明明白白时可以不结婚，但爱到不知怎么办的时候，就意味着该领结婚证了。”

杨春觉得好伤心，她突然拿出一本签好的出国护照，用几乎是哀求的口气说：“刚，只要你让我留下来，我便不走了。”

叶伦刚双手一摊，耸耸肩。杨春哭着跑了。

晚上，叶伦刚把杨春的事告诉了秦燕。在杨春走的那一天，秦燕将闹钟调到 6 点钟，叫醒叶伦刚一起到罗湖桥去送她。叶伦刚半信半疑地看着妻子。

“尽管我是你的妻子，但杨春仍然是你的女友啊。”秦燕很善解人意。

洒满离人泪的罗湖桥头，杨春看见前来送行的叶伦刚与秦燕，眼泪忍不住扑簌簌地往下掉。

她一手拉着叶伦刚，一手拉着秦燕，道了声祝福后便泣不成声：现在，她理解了秦燕这个打工妹为什么会拴住叶伦刚的心了。

通过书信来往，杨春与秦燕倒成了好朋友，俨然是一对亲姐妹。叶伦刚与秦燕还时常到杨春蛇口的家去拜望她的父母。

花前月下的温柔梦在婚后的现实面前一件件物化了。要开煤气，要柴米油盐酱醋，要应付邻里，同事间的礼

尚往来。叶伦刚整日价在外面跑，挣回来的钱除了付高价房租外，所剩也无多了。秦燕又要到夜大去读书，花销也不少。此时，秦燕显现了农家姑娘持家的本色，变戏法似的把一切安排得妥当贴切，使叶伦刚一回到家便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我们并不穷，只不过没有钱。”笔者最近一次见到秦燕时，她对如今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由于有了秦燕这个贤内助，加上叶伦刚头脑灵活，在老板厂由一个普通的QC仔，升为高级QC仔，只不过用了半年时间。

现在叶伦刚已转到深圳一家国营企业搞业务。这家企业给他分了一套单身公寓，住在四楼。象新婚时一样，小两口早上吻别，晚上回来则先拥抱一番。邻居们好羡慕这一对很有生活情趣的小夫妻。

3. 深圳打工族咏叹调

车轮撞击着铁轨，发出单调而永不停息的声音，列车风驰电掣般南下，再南下……

云在天上飘浮，人在地下漂流。

一代青年人，来深圳打工，到都市寻梦。100多万人，100多万棵无人知道的小草，铺展在这工业文明的原野上。随着时光的流逝，茁壮成长着！

生活在调整着每一个人。

他们是被改革开放的大潮裹挟而来，他们的汇入又

加速了大潮的汹涌。他们来自相对落后的地区和乡下,曾被冠以“百万雄师下珠江”。他们是最普通的一群,也是于平淡中最有故事的一群。他们多不惹人注目,漫天遍野犹如这片新土地上生命力旺盛的小草。工薪属低等,深圳的许多财富却直接出于他们的双手。他们如一群含辛茹苦的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长得淳朴健康的他们,被三资企业、内联企业或是私营企业的制衣厂、电子厂、制药厂、玩具厂、机械厂、印刷厂、手袋厂招为一线工人,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注释者。他们一天至少在流水线上泡 10 小时,吃着相对便宜但油水也不多的食堂伙食,并不过多地去羡慕身旁摩肩接踵的酒楼里的丰盛。他们 5、6 个人一间小房,或是 30、40 人一间大房,上下铺象蒸笼一样挤着住。每天都在他们栖身的屋檐下搭满了那些打工妹们永远也洗不完的衣服。他们也许永难解决显示着身份、福利和前途的永久户口,但他们依然攥着青春的快乐。那些打工妹们一俟休息便小鸟伊人般说笑打闹,去排遣稍不留神也会溢出的想爹娘、虑前程的愁烦。他们上班下班后爱坐在厂子附近马路畔的草坪上,坐进淡淡的黄昏里,感觉上舒卷成白云的模样,去摸摸牌,嚼嚼小食品,哼哼流行歌曲,有时大胆调皮的目光会把某一个过路的青年由近送远,打打浑地为谁派上对,从而爆发出一阵脆脆的笑声。他们偶尔也看看电影,但深圳的影票 3—5 元一张,也不能多看。要是单位未配置电视,也无处去看看连续剧。书又不大能读得进。所以劳累一天下来只是约伴漫步街边走走,或去只收少许门票的“大家乐舞

台”听听随便什么人的歌。若胆大的话,也可以跨上台去卡拉OK一回。

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打工青年,在这场浪淘沙的商品大潮中筛选,有的入户深圳成为社会脊梁,有的默默工作成为企业的支柱,有的泪洒特区黯然回乡,有的沦落风尘强颜欢笑……

这是一代青年人跋涉的路,甜酸苦辣,谁解个中味
.....

一、夹缝里的呻吟

贺贞娥,女,23岁,湖南人,某电子厂文员。

问:都市寻梦,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愁交集的故事,而你是怎样理解你目前的境况的?

答:确切地说,对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我是喜忧参半。特区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也使我尝尽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在乡下时,老是听人说特区如何如何好,遍地黄金、到处机会,心里总无法平衡。来到深圳后,才发现这种传说与现实大相径庭,尤其是此地的打工一族,当他们将心血与汗水滴进川流不息的流水线时,他们的辛酸、挣扎,是难与人言的。而他们只有省吃俭用,将含辛茹苦挣来的血汗钱寄回乡下,以博取亲友的欢心。只身在外,总不能让家人为自己操太多的心,总要让家人感觉自己在深圳混得很“生”。

问:其实,真正能够衣锦还乡的并没有多少,大多打工者都如你所说的将辛酸和泪水咽进肚里,却强装笑脸

去迎合家人。那么，在闯深圳这诸多的辛酸中，你最有感触的是哪一点呢？

答：是对自我位置的一种忧虑和彻悟。来深多年，总希望能在这繁华的大都市里找到自己的轨迹和星座，但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想回家吧，又发现自己与家人有了一条代沟，在思想上无法交流，在生活习惯上难于融洽。甚至家乡的男人讨老婆也不喜欢找一个外出打过工的，他们认为外出打过工的女孩十有八九不纯洁。我现在很徬徨，就象汪洋中的一叶孤舟，找不到停泊的港湾，为两地所不容，成了地地道道的夹缝人。

问：那么，对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答：见机行事，正如崔健歌中的投机分子。不过我知道，深圳不相信眼泪。

罗文光，男，25岁，某酒店员工。

问：看过你的歌集后，对其中一首《半个家》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很想听听此曲的创作意识和背景。

答：《半个家》中潜意识的东西并不显著，我不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深圳打工者的具体情况。通过自己多年来的观察和结合自己的实际，我发现在深圳，从人性到思想都已一分为二。深圳没有给我们打工者一种完整的感觉，我们的栖身之所只是那半寸方圆的卧榻；我们撷取的只是半粒收获半句梦话。反过来，我们对这城市的态度也只能是半点投入半点假，半份希望半份挣扎。歌词中用了一连串的“半个”，其实是我们打工者对“整个”的一种迫切

愿望。不过到今天为止，我似乎连歌声与呻吟都剩下半句了。

问：在你的歌中，总渗入了一种落拓的感觉，仿佛使人看到挣扎在流水线上的纤纤身影。请问，你是刻意这样写的吗？

答：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不是，就因为我也是一名打工仔，我本身生活的历程就是一部挣扎史，我没有必要去粉饰什么。别人将我们掂在掌心权衡着我们的去留，这给了我一种危机感。我惮悟到在这诚惶诚恐的日子里，委屈求全是生命的真谛，我感到悲哀却又无从选择。每写出一首歌来，周围的工友是我的第一听众，能引起他们的共鸣，我认为此曲便成功了一半。我无意去迎合某些方面的人，我只不过将自己作为打工者的喜怒哀乐写出来。说我写得刻意，是因为我想将打工者的心态如实表露，将打工者的境况真实反映，以求得全社会对打工者的关注和理解，希望这劳工制度能够走上健全的轨道。当然，我们不需要怜悯！

问：曾经有人问过你最喜欢深圳的什么东西时，你回答说打工妹床头的布娃娃，究竟为什么呢？

答：打工妹床头的布娃娃让人想到打工妹并非一种会说话的机器，她们也有童真，也有少女绮丽的幻梦。同时也让人感觉出打工妹流水线挣扎后的极度空虚。许多工厂没有供职工消遣的娱乐设施，工作之余，她们只能抱着一只没有灵魂的布娃娃独诉心声。再说，布娃娃确实招人喜爱，它是人类最忠实的听众，任你打骂，任你发泄都

表现得无怨无悔,在这人情渐冷的喧哗闹市,能有这样一位忠实伙伴,确实不错。

问:你是一位业余的词曲作者,有没打算在这方面发展呢?

答:有,只是希望以后的打工生涯不要再令我偏激。

二、房子比丈夫更可靠

王慧,女,24岁,武汉人,青年诗人。

问:《王慧的世界》这本书中有句非常新潮的话:“房子比丈夫更可靠”,很有意思。能谈一谈你自己的感受吗?

答:这可能与我的生活态度、经历有关。我对爱情、婚姻的理解比一般未婚的同龄人较为深刻一些。婚姻是一种形式,婚姻到底是什么呢?我也不明白。另一方面,我相信缘分、命运。至今我没有遇到一个让我心甘情愿、死心踏地把自己完全交给他的一个男孩。尤其在深圳这个地方,我不可能随便抓一个男人作丈夫。房子给我一个独立环境、基地,一种家的感觉,有一个落脚处,它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忠实地等待,安静接我归来。多年来,我一直过着流浪式的生活,没有家园,没有基地。我有很多书、磁带、字画、漂亮的衣服、照片……很多很多,都在朋友、父母家里,我很想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把它们展现出来,任我随意欣赏、享受。

问:什么样的男人才是你追踪的感觉呢?

答:在生活中,我邂逅了两个优秀的男人,他们给了我坚实的天空和大地,让我成了自由人。他们一个是学

者，一个是商人。人品、素质、修养相当优秀。我曾爱他们，但不能嫁给他们，如果两者合二为一，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可这是不可能的，这困惑一直缠绕着我，这是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烦恼的一部分。

问：那么你最烦恼的是婚姻问题。前两者不能合二为一，你似乎在找一种偶像。

答：婚姻是为了有一个终身的朋友，错误型的婚姻太多了，尤其在深圳这种特定的氛围中，彼此都是匆匆过客。所以我对婚姻很慎重，心理上害怕。我无法把握自己。

问：你无法把握自己，那么，你认为深圳户口是否能给你一丝归宿感呢？

答：在我的生命当中，深圳是我生活中流动的城市之一，我希望深圳以后把更多高智慧能力强的人吸收过来，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城市。那样，我也许会为深圳户口去竞争。如果仅仅是为了人际关系、商品交换，为了一个户口，我觉得那是浪费生命。我的生命历程是一种驿动的历程，来深圳只是为了寻找心中的橄榄树，如果生存的意义竟是为了一个户口，我觉得可悲。

问：希望王慧小姐你能找到自己的基地。

答：同时也是战场，我准备同自己决一胜负！

丘莲芬，女，23岁，广西人，某服装厂车工。

问：在家乡已有朋友了吧？

答：没有。此地管理区有一青年司机，人家说他很能赚钱，心眼儿也好。经人介绍我们相识了。我深深感到他对我爱的份量。我感到幸福，还以为是做梦，怎么这么容

易就获得一个好男人的爱呢?

问:那你们现在怎么样了?

答:后来,他那寡居多年的老母亲不愿儿子讨外地媳妇,嘴上说是日后好走亲戚,实际嫌外地女家里穷。我那位他不理老母这一套,他有他的价值标准,照样与我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看电影、逛夜市。我不怪这位老母亲,我理解她是过怕了穷日子,刚刚富裕,深怕结个穷亲家,日后被大包小包、干的湿的掏个空。真那样,不正像老人说的“我的仔不是给她家打工了”?那可怎么好?!我想,其实也用不着跟老人多解释,说千道万不如行动,将来老人看到我是个什么样的媳妇就知道顾虑是多余的了。

问:结果呢?

答:无结果!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令我们震惊。同村另一位老母亲不同意儿子所找的外地姑娘,儿子偏要,她说:“你要讨她我就死!”这个儿子以为一旦生米煮成熟饭,她就认可了,于是背着老母亲领了结婚证,与爱人到广州、桂林旅游去了。他们走后第三天,老人的小儿子回来,发现母亲早已冰凉僵硬了,她的床头,有个装“乐果”的空瓶子。她果真死了!于是,我男友的老母便借逝去的姐妹的下场威慑儿子,“你讨吧,你讨吧,你讨她吧……”咽下去的那半句话就不用明说了。

问:想不到在这商品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两代人的隔阂还是这么深刻!

答:这一切都是命。我心疼他的母亲,也不愿担恶名,便主动远离了他。可我心里一点也不情愿,却又无可奈

何。

问：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答：我希望找一个本地的男人，最好没有老人的，但要有房子。如果不能，我也希望在特区站稳脚，赚点钱，买间房子，独身算了。

问：没有其它途径了？

答：如果有适合的香港人，老一点没问题，他能在此买一套房子给我，我独守“望夫楼”都行。

三、打工，实在潇洒不起

何春环，女，21岁，甘肃人，某公司报关员。

问：表面上看起来，你是一位很倔强的女孩，事实上是这样的吗？

答：在初闯深圳的一年中，我确实装得很潇洒，尽管晚上我还时常捂着被角偷偷流泪，尽管有时我也表现出心灰意冷，可在打工妹的眼里，我还有个坚强的外壳。

问：坚强的外壳里面，是一颗柔弱的芳心，是否有点自欺欺人？

答：其实在深圳，许多人都戴着面具做人。“游击战”似地走厂流浪，我已象一只飞累了的小鸟，好想找个歇息的地方。从此，潇洒渐渐没有了，我决心做一个循规蹈矩的打工妹，把还没全塑好的“我”捏个粉碎，去习惯蒙着眼睛围着磨子转的驴子式的工作，去对上级毕恭毕敬，唯命是从，不再有理不让人，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工资，为了那一个褪了色的梦想，忍着吧！

问：可是你血脉里流的是躁动的血液，它使得你的潇洒难以禁锢，对吗？

答：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昨天我又差点犯起老毛病来。几天的辛酸劳苦，无事挨批，机器人似地上班就差点没昏倒在地上，可是我还是硬撑着爬上了五楼。仅仅迟到了5分钟，今早一上班，又是一顿批评、警告，不容辩说，便让写检讨，好好反省一下。可我们的自尊，我们的人格何在呢？打工妹还是不是人呢？何况你这芝麻绿豆小官也还不是替资本家打工！真想火山爆发。我还没有祥林嫂般的诉说解释，她那排山倒海似的训话便又雷霆万钧地来了。真有点象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的味道。

问：管工刻薄对待打工者的现象普遍存在着，这说明我们的一些管理人员业务水准还没提高到一定的程度。

答：根本就没水平！我当时真想潇洒痛快地跟他们吵一顿，大不了被炒鱿鱼，可是同事们都善意地劝说，打工哪个厂不受气，何况试用期刚过，你一走，也太便宜他们了。我一想也是。就这样，我一忍再忍。

问：检讨写了吗？

答：怎么不写！可让我气得咬牙切齿的管理员却还要我在写检讨时开头要称呼“敬爱的厂领导”，这种公式化的检讨实在太滑稽了。我只有硬着头皮写。终于，“领导”说话了，说我检讨得够深刻，深刻表明了我的认识程度。可悲的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反省出自己的错误，反而觉得自己实在不够潇洒，怎么不学学祥子呢？我们是一批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机器，机器还要专门保养呢。我们

呢？连自己都没能力来保护自己。奇怪！我为什么不潇洒一点呢？

问：你以后会潇洒起来吗？

答：可能，先当当阿Q！退一步，海阔天空。等我有一天活得比他们有能耐的时候再说吧！

罗红秀，女，22岁，湖北人，中专毕业，深圳某服装公司职工。

问：在深圳，你最感到自豪的是什么？

答：学会了自立。初来深圳时，觉得自己懵懂无知，象在校园一样喜欢幻想，不会给自己设防，完全是一个没有一点城府的无瑕少女形象，也上过一些小人的当。

问：你觉得你现在的成熟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答：成熟没有一个笼统的定义。打工是一种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寻找过程，至少现在我不会将自己的愤懑和不平言溢于表，也不会轻而易举地相信某一个人。我认识到深圳是一个由不得你据理力争的城市，这最显著地表现在劳资关系上。象××公司的一位女孩前几天因为重感冒无法上班，老板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扣了她一个月的工资。这女孩不服，找老板理论，老板便以无理取闹为由叫保安员将她打了一顿。这女孩我认识，要是刚来深圳时，我肯定会去她们公司据理力争，但听过或自己经历过这么多事后，也学乖巧了。这也算是自己成熟的一个侧面吧。

问：面对这种心理的不平衡，有没有为自己准备一付

心灵调节剂？

答：灵丹妙药倒没有，只是想如何改变自己来迎合这纷争的世态。虽然说自己也算是一位中专生，可是深圳大学生就不计其数。所以，只能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才不致于被这时代的急流淘汰，不致于被“炒鱿鱼”。

四、啤酒泡沫尽头的微笑

Dauy，女，25岁，江西人，某珠宝公司业务员。

问：作为一个珠宝商人，少说也算一位女强人了，在俗人的心目中，女强人都是一些铁石心肠的冷血动物，你的感觉呢？

答：这纯粹是俗人的无知和偏见。女强人怎么样？还不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她们的成功，往往要付出比常人多承几倍的代价，而她们面对的压力和心理负担，却不是一些人可承受的。她们在刚强的意志背后，往往藏着人们看不见的泪水和听不到的呜咽。象我，其实是一位家庭观念甚重的弱女，卡拉OK里“我想有个家”的歌声经常会令我热泪盈眶。

问：你孤独时用什么方式解脱呢？

答：画一只猫四处寻找着老鼠，或倒一杯啤酒，看着泡沫静静平息。

问：很有意思。刚才你说了你是位家庭观念甚重的人，那么，你的爱情观是怎么样的呢？

答：我对爱情的理解是，你可以没有钱，但应该是两

个天涯海角的人以同样的心情骑一匹盲骆驼在沙漠里狂奔。

问：人生的意义在你心中是怎样一种解释？

答：有一种鸟终生都不停飞翔，临死的时候它会找一棵荆棘停下来，把自己钉在最长的那根刺上，留下千古绝唱……我想，也许我便是那样一只荆棘鸟。

陈晓青，男，25岁，湖南人，深圳某实业公司职工。

问：作为一个大学生，打工生涯中失落感是否特别重？

答：可以这么说。初出校门时，幻想着自己在大学时所学的东西能够在社会上大放异彩，踌躇满志地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来到深圳后，却不是那么回事。

问：能具体谈谈吗？

答：虽然许多公司招工时都打着“广纳贤才”的招牌，但全国四面八方的人才荟萃深圳，却也是“僧多粥少”。即使幸运进去了，人家也不会因你是什么大学生而另眼相看。有的甚至认为你是大学生便要做出更多的成绩来，如果做不出，那你便连普通工人也不如。我是碰了一番头焦额烂后进了现在这家电源厂的。由于自己在大学时念的是化工，专业不对口，初进厂时，确实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感。

问：那你现在是如何看待这种失落感的？

答：有得必有失。深圳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城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深圳，除了“淘金”外，更是对自我价

值以及能力的一种实践和挑战。我是来深圳寻找做“太阳”的机会的，总不能守着一纸文凭自艾自怨。

问：在深圳，你确实也曾迷惑彷徨过，那么，有哪一件事是你最感开心的呢？

答：前几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一位“洋打工”女同胞的信，她是在《深圳青年》杂志上看到我的自白后给我来信的。她在信中和我探讨了许多人生问题，使我有一种“海内存知己”的感触。再说，这位女孩能够只身远洋，本身就是在挑战自我极限，这精神令我钦佩。能认识她，是我最感开心的一件事。

五、马路天使的音符

金凤，女，24岁，修鞋姑娘。

问：你是什么地方来的？

答：俺家在陕西凤翔。

问：现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较前已好过多了，相信你们老家那儿也不例外吧，那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只身到陌生地来修鞋呢？

答：没错哩，俺家乡一带比从前有不少进步，但比起深圳特区还差了一大截哩。况且我家人口多，除父母外，还有4个弟妹，我是老大。母亲又长年有病在床。在家时就听人说，深圳这儿人们很阔气，钱易赚得很。于是，去年我便来了。我要多赚点钱寄回去，帮爸爸养活这个家。

问：那你来了一年多，对深圳感觉怎么样？

答：特区这儿的生活，的确比内地好些，人们给钱较

随便,因此,钱也易赚一些。最讨厌的是有时一个人特别是晚上出入不安全。一次我去荔枝公园玩,有两个神色谲秘的男人走过来调戏我,吓得我撒腿就跑。我还被人勒索过两次,抢去 500 多元。

问:我刚才看见“华东水灾赈灾组”的工作人员来这里募捐,你捐款了吗?

答:捐了,他们没来之前我已捐过一次了。总共捐了 50 元。

问:你们这些修鞋工,长年累月在街边日晒雨淋的已够辛苦的,你还有这个心捐款助人,真难得。

答:这有什么。人活在世上是最需要互相帮助扶持的。虽说 I 赚钱不多,但现时生活境况总比华东的灾民好多啦。

红梅,女,22 岁,湖南浏阳人,修鞋姑娘。

问:没想到你在街边摆摊,身上还抹香水呀?

答:你觉得香气不好吗?你讨厌香的东西吗?其实香气不是我身上的,是箱子里边的十几朵新鲜的白玉兰花。我喜欢花。

问:看得出你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热忱的姑娘。工余时间干些什么呢?

答:看书,尤其喜欢诗歌。

问:印度泰戈尔的诗读过吗?

答:读过,他是印度一位大诗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30 年代还来过咱们中国呢。他的诗写得可好了,我背一段给你听听:“夜深了/在我静静的心中,你酣睡正浓/

醒来吧,啊!爱情的痛苦,我站在门外,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打开大门。”我很喜欢文学,平时自己还写呢。

问:来特区后,白天要在街边摆摊,什么时间读书呢?

答:晚上读啰。读书能使人变得聪明并洁净心境。

六、甘洒热血写春秋

邓秋明,女,24岁,上海人,大专毕业生,某合资厂中方主管,团支部书记。

问:觉得在老板厂搞团的工作困难吗?团支部进厂是否可行?

答:开始比较困难,因为香港老板不理解、不支持,认为共青团、工会等组织是跟厂方对着干的,后来慢慢也接受了,并且努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鼓励众兄弟姊妹岗位成才,发挥团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团支部进厂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我们在几个生产班组设立共青团岗位,起到积极作用,工人干得起劲。

问:外出打工的青年,都注重自己是共青团员吗?

答:大家在学校时比较注重自己是团员,出来工作后便觉得无所谓了,有的提都不提自己是团员。我们觉得一个组织要吸引人,一定要有朝气有活力。于是便组织团员骨干搞活动。如给同周生日的团员过生日,周六开联欢会等,唤起了大家许多温馨的美好回忆。陆陆续续,那些团员都把关系从家乡转来了,也有不少人主动要求入团。

问:兼职搞团的工作,累不累?

答:有时觉得累,但看见大家每次都有说有笑聚在一

块时,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感。

李玲玲,女,19岁,湖北人,高中毕业,某公司文员。

问:你何时来深圳?

答:将近一年了,高中毕业后过来的。

问:看你聪明伶俐,又善言辞,一定深得上司赏识,是这样吗?

答:哪里的话,我的工作无非是发发每个月的职工劳保,抄抄加班通知,传传电话而已。

问:你觉得你对公司最满意的是什么?

答:我认为,最满意的是,香港老板能尊重大陆员工。我们公司生产线有几位女工去读夜校,老板非但不阻拦,遇到赶货时加班能请假都让她们请假去上课。另外,有位女工是生产线上的骨干。一天,她气冲冲地向老板提出辞职,辞职的原因是因为香港师傅误解她,把退回来的不是她做的产品,硬说是她做的,要她返工重做。老板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叫来香港师傅,当面向她道歉,才使她收回辞职书。

问:你出来一年了,还想不想家?

答:怎么不想,因为自己是外省人,到深圳打工,若没有什么特殊的际遇,以后还是要回去。所以,我珍惜这些日子,希望多学点知识和技术,将来带回家去。我想肯定能派上用场的。

陈红娟,女,22岁,广东人,初中毕业,某工厂工人。

问:你来深圳的目的是什么?

答：怎么说呢？我是个很安份守己的人，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导致的，我只求一份舒服和比较稳定的，同时可以学到技术的工作。

问：那么你对深圳有不满意的地方吗？比如业余娱乐和学习方面？

答：有，我时常感到文化生活贫乏，想学点什么，又缺乏耐心，失落感常常笼罩着我。另外，厂里没有任何娱乐设施，附近又没有适合打工者消费的娱乐场所。我虽是个爱静的女孩，但又希望通过参加各种活动来认识一些可以交谈的朋友。

问：你说你很安份，但你的潜意识是“不安份”的，是否想通过某种途径来充实自己？

答：是的，我是制衣厂的车工，近些日子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裁缝学习班。每天一有时间就想，就琢磨服装设计的书。以此来充实自己。

王辉，男，26岁，北京人，某公司业务员。

问：你每天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答：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如何结交一些在我失意时可以安慰我的朋友，心里考虑如何保护好现在这个“泥饭碗”。

问：在学校时，你是团委书记，在北京的某家国营单位，你又是团委书记，有一定的组织和主持能力。来深圳后，不知你组织或主持过哪些团的活动？

答：刚来时，在深圳一家有1000多人的工厂打工，枯

燥的打工生活,使我很想在业余时间里发挥自己的专长,并呈上关于自己一些想法的可行性报告,老板看了把它撕成碎片:“如果你还想在这间工厂干下去的话,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听了老板的话,我的心凉了半截。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区别所在。外资老板大部分只注重效益,缺少一份温情,而中方领导大部分很有人情味,管理的企业效益却上不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老板,我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种现象。

问:来深6年,是否改变了你原来的许多想法?

答:当初出来闯,是为了生活中的自我实现,也为了体验一种异乡人的拼搏,在一片没有水的沙漠中,找自己的绿洲。来之前,没抱着立足深圳的想法,现在依然想回去,但如果能找到一个广东的“老婆”,也许会留下来。

问:那你希望找个什么样的女子为妻?

答:首先我得理解她,然后她理解我,我希望她是贤妻良母型的人,又希望她是有理想有上进心的人。

问:另外,你说你在深圳有种“漂泊”感能否具体谈谈。

答:所谓“漂泊”,无非担心老板有一天会无缘无故将我炒掉。有时一个人坐在宿舍,既感到困惑迷茫,同时也感到某种程度的孤独。虽然说自己是“皇城根儿”,有朝一日可能会打道回府。但我希望能是衣锦还乡,并非落荒而逃。就象深圳河的浪花,虽说是一闪而逝,也一路唱着自己的歌。

问：有没有想过“跳槽”？

答：我已经“跳”了4个公司了。老“跳”也不是办法。俗话说：“打生不如打熟”。当然，如果真的有“龙门”好“跳”，我会考虑。人往高处走嘛。

第三章 在靠近太阳的地方

有一位搞建筑的打工诗人，闯荡特区多年演绎了不少动人的诗篇。在组诗《芬芳的水泥与钢筋》中，他抒写道：

“我们站在城市的最高点，
也就是最靠近太阳的地方。
使用来来去去的阳光，
使用往往返返的风雨。
把手中的瓦刀和机器，
锻炼得如同太阳的光泽一样，
美丽耀眼。

我们的心愿，
在于大厦的健康站立。
一如每个黎明，
在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用我们的青春之肩，
托起城市的光亮。

我们只是建筑部落，
却在这靠近太阳的地方。
思考历史，
思考长城，
在不断的太阳洞穿中，
启悟古今的建筑意义，
高举不息的建筑精神。”

是的，建筑就是攀登，选择了建筑，就是选择了奋发向上！在灯光与灯光的闪烁之间，在大楼与大楼的屹立之间，在人群与人群的交汇之间，一代打工青年站在城市的深处，站在靠近太阳的地方，朗读自己的劳动，成长起来了！

他们为什么能够成长起来？

一份权威性的报告指出：80年代深圳的改革走在全国前面，其主要特征表现在，深圳比别的地方更多地利用了市场机制，发挥了市场的威力。深圳的速度，深圳的成就，皆由此而来。显然，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对深圳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意义，特区的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实行以市场为取向的变革。当人们潮水一样涌入深圳时，看到的是一只无形的手——市场在起着巨大的作用：企业生产资源、产品的销售以及劳动力的需求都从市场获得；股票作为有价证券经过市场来增值和落价；人才步入特区建设者大军之中，以其市场的需要为选择职业和才干的标准；打工仔、打工妹更以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是否能够在特区生存……市场机制已成为特区经济的新特点。

当人们漫步在深圳街头，会感到一种新气息。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已成为人们对深圳的初步判定；勇于竞争、乐于拼搏已成为深圳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掌握知识、追求卓越已成为特区打工仔、打工妹的目标。是什么魔力使得这一切在深圳得以实现？答案是简单的：市场机制的功能不但改变了经济的运行，而且改变了人的行为。答案又是复杂的：当我们由旧的体制向新的体制转换的时候，必须付出无数的探索和创造，才能够在这种历史的转变之中，获得契机，而这种探索是胆略、技能、效率的直接结果。特区的建设者们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机制，接受了市场机制带来的成果，并力求克服市场机制的负面影响，这无疑是明智、成熟的举措。一位经济学家指出，当改革大潮再次涌起的时候，人们都发现深圳崛起的秘密不是中央所给予的资金，而是深圳创造性地运用了市场机制。然而，深圳又走在了前面：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一代打工青年，正是在这崭新的市场机制中走向自强自立的。

在这里，风每天都是热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在这一炙热的阳光下，在那一幢幢旋转着无限风光的高楼大厦的夹缝中，生活劳作着 100 多万操着南腔北调的外来打工者。他们几乎无一不是为寻找心中那个彩色的梦而来。然而深圳这片土地，在为他们创造种种机遇，在为他们提供物质上某种程度的富裕和精神上某些方面的满足的同时，也让他们倍尝离乡背井的酸甜苦辣，倍尝成功与失败的喜怒哀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注定只能成为深

圳这块充满诱惑的土地的匆匆过客，在洒下他们青春的热血和汗水，在留下一段既美丽又悒郁的回忆之后，悄然回到祖祖辈辈耕作的土地，或许从此不再走出家门。他们既是深圳上空一抹灿烂的朝霞，又是梧桐山下一首凄美的诗！

也有一批成功者，如安子、赵露珍、张天颖、张慧文、尹雄鹰、廖兴富、黄燕波、曾利清、孙达成……这些人的名字使打工一族的青春部落添上了绚丽的光彩。深圳市文明市民、深圳青年十杰、十佳、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全国学雷锋标兵……这些花环与荣誉戴在了百万临工的头上！

青春的手臂，扬起来就是一片迷人的风景。

1. 一个传奇或一个梦

我——安子——9年前一个从粤北山区走出来的客家妹子，无疑是那百万打工族中的佼佼者与幸运者。翻开报刊，有为安妹专门开辟的“安子专栏”、“安子信箱”；扭开电视机，有电视台为安妹录制的专题片——《明天会更好》！成千上万个打工仔、打工妹，把雪片般的信转到她手上，传递着一个共同的声音：安子，你是我们打工族的骄傲！你是我们青春的偶像……

从蛇口半岛，到深南大道，安妹的脚步走成一条河；从故土的泥香，到都市的迷离，安妹的琴响遍深圳的每一

角落。

深圳不相信眼泪

我现住在通心岭一幢普通的宿舍里。家里很简洁，也很朴素，一如其人。是的，在美女如云的深圳，长着一张典型客家妹子脸蛋的安妹，实在是太普通了。但透过那文文静静的举止，透过那温婉而又明亮的眼光，还有那头潇潇洒洒的短发，那象小山羊一样认真聆听人家言笑的神态却又流露出另一番娇娇女儿态，也不失为一种清纯之美。在一家杂志“假如让生活重新开始”的提问栏里，安妹如是说：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从表到里。但我认为，不管是丑女还是美女，关键在于她个人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假如我原先长得很美，也许我就可以凭借美貌，去谋取一份好的职业，如去当公关小姐、文员或去当模特儿，而不用每天站在流水线旁一站就是 16 个小时。不过，我又想，美首先还应是气质上，其次才是仪容身段。一个女子，只要她充满自信，就会有魅力……”淡淡的话语，实则揉进安子深深的生活体会。是的，安子全部的魅力，都来源于她的自信。

而自信并非与生俱有。当 84 年那个炎热的夏天，17 岁的我乘一辆长途汽车抵达深圳时，因找不到来接我的表姐，当时的我只有急得直想哭的份，然后当我羞羞怯怯向街边一位与我一样年龄光景的女孩问路时，得到的是一声恶狠狠的“老土”！因为我按照乡下的规矩，尊称那位

女孩为“阿姨”，也就难怪那位小姐要生气了。

这便是深圳给我的一份别开生面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对于当年身体单单薄薄的我，未免有些沉甸甸的。但更沉甸甸的东西，还在后头呢！

到深圳第一夜，我就跟表姐住在一家电子厂的铁皮宿舍里。那是一间 $12m^2$ 的房子，搭了两溜12张上下铁床，上面全是塞得满满的被子、小圆镜、相册等杂物。天气燥热，还有人在房子里用电饭煲煮饭，弄得房子里啥味道都有。在靠窗子的那只窄小的单人床上，我跟表姐挤成一堆睡下，翻身时得两人一起翻，真是难受极了。那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透过街口，我看街头的楼群，在霓虹灯的闪烁中，不断变幻着颜色，这使我感到既新奇，又茫然。我忽然好想家乡，虽然才离开一天，但我却象度过了漫长的一年。真的好想那炊烟袅袅的村庄，好想那飘着谷香的田野，更想那条静静流淌的梅江！是啊，我的家就在这梅江边，是梅江水哺育我长大，是家乡的大山给了我灵气。

但那时的我叫安丽娇。

安丽娇是个十足的乡村女孩，初中没上完就跑回家帮助父亲开一间小餐馆，整天埋头在油盐酱醋之中。那时的安丽娇根本就不知梅县以外还有个深圳，更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那个现代都市的名人，她的户口问题会承蒙市长亲自关照……

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深圳打工的表姐回来探亲，只见她穿得鲜鲜艳艳，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真是风光八面。庄户人家爱凑热闹，大家一边品尝着表姐带来的糖果、饼

干，一边围着她听深圳见闻。那时的表姐，实际上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被她所描绘的深圳深深地吸引住了。表姐临走时，我便迫不及待地托她在深圳找一份工……

我迷迷糊糊想到这里时，心里满盈着惆怅。当初巴不得来深圳，可深圳并非象我想象中那般亲切可爱。

翌早，表姐带着我去见工。

满脸傲慢的香港女老板喊来一串流水线线长，指着我吆喝：

“你们哪条线缺人，要了她去！”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好象一件商品，在任人取舍，一种屈辱感情悄悄爬上我的心。幸亏插件组流水线要了我去，具体活儿，是把不同型号的电子零件往线路板上插。那真是一条永远也流不完的流水线呀，每天工作 8 小时属于不正常，而 10 小时、12 小时，甚至 16 小时反倒是正常的。这样没过几天，我的手指便淤满了黑黑的血。可女老板到车间巡视，发觉我对着刺痛的手指发呆，就对我呵斥：“傻妹！你自己弄伤了手指头，还傻愣在那干什么！舒服得很是吗……”

要是在家乡，有谁这样尖酸刻薄地骂我，我准会回嘴。但人家是老板，你是来打工的，一切只能忍气吞声。我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可从车间到工棚，乱吵吵的满是与我一样的打工妹，她们有的来这里已经几年了，不也捱过来了。这似乎给了我某些启发，我想，我只有熬下去，熬过这第一课，往后也许会好些。

果然，4 个月过去了，我已经能象表姐一样，手脚熟

练地坐在流水线旁，机器人似的插件，已经能在汗臭味与热烘烘的感觉中与表姐挤成一堆酣然睡去。而当我每一次领到那一叠用汗水换来的钞票时，我的心里也已经有了种滋味感。我开始给家里汇去 30 元、40 元，钱虽然不多，但那是我自己挣来的。我想象着小妹怎样拿着我汇的钱去报名读书，想像着父亲怎样在邻居羡慕的眼光中宣读我的家信。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充实过、美丽过。

不久在一位亲戚的介绍下，我跳槽到一家宾馆当迎宾员。第一次穿上红裙子，白上衣，打着黑色领带，那一刻的我真有点顾盼生辉。可上班没多久，就碰上几位北方顾客当众调戏她，还无理取闹找来经理，硬要我给她陪礼道歉。我一扭身跑进厨房，委屈的泪水撒满一脸。可楼面部长也跟进来，只丢给我一句话：“顾客是上帝，他永远没错！”

透过泪光，我又一次领略到打工生活的辛酸。但比之在流水线作业，宾馆迎宾员还是轻松了许多，待遇也好些。从那时起，我便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一种敬业意识，一度“024 号（我的工作牌号码）微笑”甚至传为那家宾馆的佳话，经理室还收到顾客给我写来的表扬信，再不久我便被提为领班。

但我还是跳槽了，到蛇口一家筹建中的制版公司当制版工。干一段时间后，又转到另一家装饰公司搞广告设计。这时候的我，已再不是刚到深圳时那个懵懵懂懂的小妞子了！通过跳槽，我不断发现自身的价值，不断培养一种挑战与竞争的意识。再面对现实的困境时，我已有了相

当的承受力,这不能不说深圳赋予我的一次飞跃!

在装饰公司工作,是我到深圳后的第四份工作,无疑也是最好的一份工作,因为我的设计常有新意,很得总经理赏识,不久便被封为“总经理助理”。那段日子真是风光,我几乎跑遍全深圳的茶楼酒肆,跟着总经理与客商谈判、签约。但是当有一天,与我同住在一起的好友阿虹哭着告诉我,她怀上了总经理的孩子,而总经理塞给她1000元港币就想打发她走时,柔弱善良的我愤怒了,我想不到平时道貌岸然的总经理竟会是这么人面兽心。我留下一份辞职书后,毅然带着阿虹离开那家原本很有前途的装饰公司。

一无所有的我领着悲痛欲绝的阿虹,浪迹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找新职业的漫长旅途。每天买报、读报、浏览墙上的招工广告,打电话寻问,奔来跑去面试,常常从天不亮起床折腾到夜晚,换来的却是一无所获。我一度甚至后悔离开那家公司,为此,不愿连累我的阿虹不辞而别,回乡下去了。这使我孤独无依的心又多了一份凄冷。每每看着街上那一幢幢富丽堂皇的大厦,看着大厦上面那蓝蓝的天,我就本能地想哭。因为这座都市再美,这片天空再蓝,也是别人的城市,别人的天空。

我真的哭了。可深圳不相信眼泪,深圳只相信自强不息,深圳只把机会留给那些善于抓住它的人。

那么,我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每个人都能做太阳

尝够了失业的悲伤与流浪的滋味后，我拖着疲累的身体回了一趟家乡。梅江水依旧静静地流，炊烟依旧袅袅的飘在村庄的上空。可站在门口迎接我的双亲，却分明显老了，憔悴了许多。作为长女的我，忽然鼻子有些酸酸的，我真想扑进双亲怀里，痛痛快快大哭一场。但我还得强打精神，把微笑甜甜地挂在脸上，夜里围坐在一盏昏黄的电灯下，给弟妹讲述深圳旖旎的风光，讲我在这座城市生活得如何潇洒美丽……

次日，已经回乡的表姐抱着2岁的女儿到我家，阿虹这时也来了一封信，说她已经嫁给当地一位老实巴脚的农民，也许这辈子就厮守在那一方土地再不出家门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猛烈叩击着我的心。我再没心思跟表姐聊天，一个人跑到田野，让熟悉而温柔的山风轻轻抚着。是呀，扎根深圳，对于没有文凭和特别专长的打工妹来说，简直如天方夜谭。成千上万的女工，随着青春的流逝，在特区干上3、5年后，几乎都得走表姐和阿虹的路，黯然回到家乡嫁人、生儿育女。但是我，已经深爱上那块土地，虽然那上面留给我的不尽是亲切和欢快，但我仍受不了它强大的诱惑。深圳呀，你真是一江美丽的湍流，跳入和远离你都需要勇气。在家乡的山水中盘桓了几天之后的我，最终还是回到了深圳，回到那一方有过我憧憬也有过哀愁的土地！

幸运的是，在一位旧日工友的介绍下，我又进了蛇口

一家印刷公司做拼版工。当我每天对着那深浅不一的流行色时,我曾不止一次问自己:人生不也如这版图吗?

经历了那么些磨难之后,20岁的我,远比实际年龄成熟了许多。我不再去幻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从周围的环境,从周围的人,我看到了,在深圳,你不趁早学点东西,迟早会被淘汰。于是我开始补习初中课程,之后又补习高中课程,并于1988年那个艳红的9月,考入深圳大学星期天中文大专班,那是专为打工仔办的。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一直泅渡在打工的大海里,那么此刻的我总算发现了岸,并一步一步向它靠近。

坐落于深圳湾的深圳大学是庄严又美丽的,当我第一次走向它时,心里甚至有种幻梦的感觉。而后当我每每拖着因加班而略显疲惫的身躯步进校园,沐浴在那海风海涛、白云红荔、鸽鸣蕉香中的时候,当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偏着头静静聆听老师的每一句讲解的时候,我的心就会被过滤得澄澄清清,然后升华为一种崇高的精神。我深知,我不能跟那些正牌的大学生比,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徜徉于校园,而我,下课后还得奔回车间。待到夜晚,就在姐妹们侃大山的吵嚷声中,躲在一旁,弄一块木板横搭于窗口与床架之间,权当书桌做功课。晚上蚊子多,我常被咬得一疤一疤的。做完了功课,琼瑶、亦舒、三毛、岑凯伦、席慕蓉的书,又常伴我度过那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异乡之夜。这些畅销作家在赚取我不少泪水的同时,也回报给我一种启悟,这启悟不仅是生命的,也是文学的。

21岁的我,在那灯红酒绿的城市,开始把我心中郁积的感情,悄悄写进笔记本,然后又偷偷把其中的一些抄寄给远方的《女子文学》,并且在那上面签上一个有灵气又有诗意的名字:安子。稿件寄出了,我的一颗少女的心亦悬上了。我期望那些文字能成为铅字,但我又明白那些文字的幼稚。稿件最终没有发表,却让我结识了一位好心的编辑。后来在这位编辑的帮助指导下,我的第一首诗发表了。诗的下面写有我的通讯地址,一时竟引来许多读者的来信,这倒是我想不到的。捧读着那些热情洋溢的信件,我与文学的缘份又多了一层。而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新疆有个叫晓路的女孩,高中毕业后,不知能否考上大学,来信让我马上接她来深圳,否则,她只有自杀。我的心颤抖了,我连夜给那位女孩写了十几页的长信,劝她振作精神,不管能否考上大学,都不要向命运低头……

有了这“打响”的处女作,我更加勤奋了。白天,穿梭于车间,校园;夜里,架起那块粗糙的木板写作。伴随着那优美而又略带苦涩的情感流泻于笔端,安子的名字,一天天走向报刊,一天天让许多人熟记。刚开始是在《蛇口工人报》,继而在《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法制报》,凡深圳办的报刊,几乎渐渐都有我的名字。我为此结识了一帮打工仔文学发烧友,不久当蛇口成立“半岛诗社”时,我已经被推举为常务理事了。而安子的名字,也越来越为打工妹打工仔津津乐道……

然而,真正把我导进文学港湾的,真正使我年轻的生命开出灿烂花朵的,除了深圳这块神奇的土地,就当首推

客人了！客人的到来，注定是我这只在大海漂泊了多年的帆，找到它的依傍，找到它的岸的时候。

那是一个春雨潇潇的夜晚，在深圳大学的一间宿舍里，我第一次见到客人，客人这时是深大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名噪一时的校园诗社社长。但他的居室却是弄得邋遢遢遢，蚊帐和被子揉在一块，象团滑稽的咸菜干，满地是鞋，满桌是书。我不由皱了皱眉，但也在这时，我忽然发现床头贴着一副有趣的漫画，那是客人竞选学校学生会主席时的自画像，旁边还写着一行字：“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我禁不住怦然心动，象是被什么东西洞穿过胸际。而当客人以一副不修边幅的模样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少女的心已是一片泥泞般的烂漫，说不清是惊喜，还是忧伤……

爱情是天赋的权利

难忘的一个夜晚，那晚天正下着霏霏细雨，怯怯弱弱仿如一头小山羊的我，如约撑一把伞站在客人门口，客人从窗口望出去，我站立的姿式极象他在心里构思了许久的一幅画。他忽然感觉有种心痛，忙走出去，把我叫进屋里，然后就象碰见久别重逢的故人，絮絮叨叨地向我诉说，诉说大西北的漠风，诉说高原上的帐篷，并拿出一张他整个人趴在沙漠上、背面写着“诗人之死”的照片让我欣赏。

那一刻的我只静静地坐在一旁，泪水悄悄挂在我修长的眉睫。我能理解，面前这个男孩因失去爱的伤痛，因

这份痛而变得更加傲岸不羁的那颗心！我就如同不知如何开口的小妹妹，那晚一句话都没说，只用那满盈着温柔的眼光，悄悄传递给他一种蕴藉，一种抚慰。而当夜深了，客人送我走出校园时，我那单薄的身影，突然喊醒了潜藏于这个男儿身上的血性。终于在那即将道别的一刻，我们的青年诗人客人，勇敢地把一只手搂住了安子那单薄冰凉的肩头。一切都来得这么自然，仿佛两人早就相恋了多年。而当月光下客人把他的唇那样温柔地覆盖下来时，我那颗彷徨无依的心忽然如同水仙花苞般灿然开放了

.....

月光流照的校园，两颗年轻的心泛起爱情洪流，与茫茫月光，与时断时续的霏霏细雨，浑然一体，仿如一首美丽的朦胧诗。

当我回到打工的宿舍时，怎么也难以入睡。于是悄悄爬起来，在那块孕育过我的诗歌孕育过我的散文的粗糙木板上，笔走龙蛇地写下了我给客人的第一首诗——《就在昨夜》：

就在昨夜就在昨夜的某一时刻
篱杜鹃染红了我的梦境
朦胧的往事又穿过旷野而来
日子温柔得仿佛缺点什么
未能挽留住你
因你的漂泊而引渡我的漂泊
临行的一瞥
因你的伤痛而留下一份深沉

写完这首小诗，我的心又一次被那个突如其来的男孩掏空了！透过那淡淡的星光，我仿佛看到了，22岁的客人正拖着沉重的步履，跨过西北风任由思绪拍打着异乡的小草，用嘶哑的声音向远方作一种呼喊，仿佛呼喊的就是我！可那当儿的男孩不属于我，即使如今用全部的柔情也擦不干我相思的泪。从此我的生命便注定有一份摆不脱的缠绵，从西北到东南，从春到秋，我不知道哪一天会是我的归期。想到这些，我忍不住泪珠涟涟，难道冥冥中早已这样安排：安子注定收留客人？

而客人，在那个有月光的雨夜，一样的睡不着。隔着月光，他能感觉到安子的心跳，感觉到安子在心里不停地呼喊着他。所以当几天后他陪我去某校听一节文学课时，坐在我背后的他一挥而就写下一篇让我至今仍视为至爱的短信：

“……你的絮絮之语，可是我每日沐着、爱着的祝词？有一天，我在大沙漠中流浪、跋涉，困了，累了，是你吗？在路的尽头为我行着生命的注目礼，使我继续前行。我不知道，我终生找寻的只不过在一瞬间。这个人世间匆匆的孤客，是你收留了他，款待了他……有一杯水，抑或一个眼神，就足以令我感动一生。就在那细雨霏霏的一天，我从远方归来，不再是过客，而是你的家人。你早就认识了我，我是你那段故事中的男主角，而你的嫣然一笑，你的忧郁与沉静，都是为他的吗？在初夏，一个多梦的时节，我在一座开满了蒲公英的山坡上打坐，岁月如流，缓缓流过我的十指，对你，我能说出十种感觉，只有你……”

该来的，该发生的，全在这如诗般的岁月中发生，到来。但是，我的打工姐妹们却有些沉不住气了，一个即将毕业分配到深圳市委工作的大学本科生，会真心与一个没有深圳户口的打工妹“拍拖”吗？她们善意地劝我别付出太多，别自作多情。但我只是回报她们一个淡淡的微笑：“爱情是天赋的权利，但它要靠自我的造就才能获得。”是的，正是这“自我造就历程”帮助我艰难却又成功地摘取了这颗令多少打工妹惊羡的爱果！

当然了，站在这爱河另一边的客人，则无疑拥有一颗慷慨丰富的心。他深深懂得一个平凡而普通的打工妹的追求，同时他更欣赏安子身上潜藏的文学素质。有一次在一家咖啡厅，客人温柔地望着我说：“经历是一种文化。你这青春岁月的打工经历，求学路程，其实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

“一笔财富？”我起先是惊愕，而后眼里闪过一道明亮的光。顿时，多年打工生涯的酸甜苦辣，周围那些打工姐妹们的喜怒哀乐，如一道溪流从我心头缓缓流过，浸润得我忽儿想哭，忽儿想歌。在客人的点拨下，我首先写出《蛇口打工一族》，在《蛇口工人报》连载后马上引起关注；接着，我的以打工者生活为题材的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相继在深圳的报刊发表，并受到普遍的欢迎。而当 1990 年圣诞节的钟声敲响时，我与客人的爱情故事，也翻开了更美丽的一页。虽然没有鲜花，没有丰盛的酒宴，但两颗心真诚的结合，比什么都珍贵！终于，在接受无数打工妹衷心的祝福，在接受圣诞老人及 7 个小矮人真诚的献词之

后,这对同样勇于直面人生的年轻人,携手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的婚礼,从此一同酿造满怀激情的生命与爱,一同步向风雨人生……

青春没有驿站

流水一样刚刚流过 1992 年。对于深圳市民来说,也许安子是最具知名度的。在这一年,我的长篇纪实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深圳特区报》连载后由海天出版社结集出版发行,初版的 75000 册顷刻销售一空,新华社记者潘家珉拍摄的那张“安子”伏案写作的照片,被连续刊登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乃至香港《大公报》等十几家报刊的显著位置。《文汇报》、《文艺报》、《文学报》等等国内报刊,也相继撰文介绍安子。“安子现象”从深圳湾畔,迅速地向祖国大江南北辐射、延伸。“寻找安子”的信件象雪片一样飞转到安子的床头。一时间,“明星级”打工妹“安子”在深圳几乎无人不晓。而我,这个曾炒过老板“鱿鱼”也被老板炒过并变换过无数职业的客家妹子,也终于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位置。继被评为“深圳青年十杰”之后,又荣登“深圳市文明市民”榜首,而后又与客人双双获当年度“广东省作协新人新作奖”。一朵朵鲜花向我飞来,一声声祝福向我传来。我呢,依然是那甜甜的笑脸,依然是那头短短的头发,那身朴朴素素的衣着。在一次临工集会上,我只含泪说了一句:“感谢深圳塑造了我,感谢客人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是的，我实在无暇沉浸在那成功的喜悦中！因为在我身后——生活在深圳的130多万打工仔、打工妹，如今已把我当成知心人。他们有了烦恼，会写信给我；碰上难题，会写信给我；走投无路时，甚至会找到我的家。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深圳特区，迄今还没有谁能替代安子在打工一族中的独特地位。原因在于，我也羡慕街上流行的服装，也向往歌舞厅浪漫的情韵，但我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一条又苦又累的路，选择一支笔，为奔波劳碌在都市底层的打工兄弟姐妹们说话。正如我在一首诗中写道：

向十岁的深圳少年讲述：

我的姐妹们——

在一个“？”还没形成七夕星的时候，

在一个“。”还没形成红太阳的时候，

走进流水线的灿烂朝霞中，

像自语又象发誓，

是我们

为中国举托起一个深圳……

读着这些诗行，我对打工姐妹的炽热感情，对认识自身价值的自豪与自尊，难道不深深打动着你？

是呀，深圳的天空永远是蔚蓝的，但并不是一切都那般美好！百万打工者涌入深圳，实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写满离乡背井之苦和步入人生新旅程的悲壮。从农业文明到都市文明，必将伴随着一番痛苦的洗礼。告别祖祖辈辈厮守的一方乡土，突然走进繁闹喧哗的现代都市，寻梦者的心灵也将蒙受历史风尘

的侵蚀。于是,困惑和不安始终是他们的天敌;于是渴望有人理解,渴望有人为他们的青春之旅作证,便显得尤为重要了!这种背景下的“安子”应运而生成为他们的偶像乃至宣泄情感的代言人,也便是情理中的事了。

为打工者这一“都市边缘人”树碑立传,为唤起更多打工妹、打工仔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意识,或许将是我此生最美丽的愿望。

当一个被不公正“炒鱿鱼”的打工仔,用长达 5 页的篇幅向我叙述他的不幸遭遇,并在结尾留下这样一句话:今天的我,将去何处自我推销时……

当一个落款为“恳请呼救失落少女”的打工妹,在信中叙说生活的不平、爱情的多艰、人生的坎坷,并等待安子姐去为她寻找一条出路时……

我的心被深深刺痛了,那是她的兄弟姐妹呵!于是,我在灯下给他们一一回信,或是约他们面谈,用自己切身的感受,诉说“深圳不相信眼泪”,并指明既然来到这块土地,就必须尽量掌握两件东西:一是技能,二是知识。只有拥有知识和技能,即使他日回到家乡,也将是终生受益的。只要自尊、自强、自爱,何愁天涯无芳草,何愁美梦不成真!深圳,仅是他们漫长生命旅途中的一个小站,而青春是没有驿站的,只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冲动与追求。那一封封充满哲理的信,那一声声温柔的话语,集聚成另外两本书信体散文集《安子的天空》(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与《青春絮语》(海天出版社出版),仿如一道道清澈的山泉,滋润着多少打工者干枯悲凉的心。正是因为有“安子”这

朵蓝色的报春花，多少曾一度失去心理平衡的打工者，又调整好心态，鼓起生活的风帆，航行在深圳这片蓝天下。听，深圳电台专门为“安子”设的专题节目——《安子的天空》，又透过无线电波，把安子的爱撒向这块土地：

“我是安子，我们都来特区寻梦，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所有热爱生活渴望生活的打工兄弟姐妹们，透过电波，我愿与你们共同编织这青春的天空……”

2.“我愿是一株木棉”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有人说男人是树，伟岸、挺拔，是力量的象征；女人是藤，纤弱无骨，只能依附大树的躯干攀沿上升……可青年女诗人舒婷却在她的名诗《致橡树》中对男人说：

“我如果爱你，
绝不象攀援的凌霄花，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张天颖，锦绣中华的第一代导游小姐，在1991年全市“做特区主人，创深圳效益”的特区女性演讲比赛中以《我愿是一株木棉》为题，大声宣告：“木棉，她有橡树般的伟岸，长青藤的妩媚。我热爱木棉那女人般动人的柔情和

她那坚韧不屈的品格，更向往木棉的故乡。”

1989年4月，21岁的张天颖从南昌旅游学校跑出来独闯深圳。天颖天资聪颖，毕业成绩优秀。当她看到成绩差的同学分配工作居然都分得比她理想时，她意识到“好成绩不如有个好父亲”。于是，张天颖一气之下决定离开南昌，到深圳去，其气魄不亚于当年的热血青年，振臂高呼到“解放区去”。她先在西丽湖度假村实习，两个月后到锦绣中华，开始写人生的第一份答卷。在一张精心拍摄的木棉树相片背面，张天颖写道：愿你成为一株与橡树般伟岸妩媚的深圳木棉。

“锦绣中华”的构思是由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志民先生于1985年底提出来的。他根据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幅员辽阔旅游资源丰富的特点，利用深圳毗邻香港的有利条件，提出建造一个微缩景区，把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风景名胜集中加以表现，以此为“窗口”弘扬祖国的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旨在让世界人民更多了解中国，从而促进各国人民同中国的交往，推动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建设中的锦绣中华满眼苍凉、荒野、凹凸不平，一片沼泽之地。没有想象中的茵茵绿草，更没有象样的办公室，周围没有一棵树，太阳晒得简直没处躲。

老师和同学都来信劝她：

“那样的微缩景区，会有前途吗？”

张天颖自己也不知道，既然来了，多呆几天再说吧。

一天，总经理带张天颖下景区熟悉工作环境，告诉她

当今中国一流的古建筑学专家、雕塑艺术家、园林工艺专家等上百人在这里当技术顾问或亲临投入创作,天颖看到的却是烈日下忙碌的人群和那一张张黝黑的面孔。他们从全国 20 多个省、市千里迢迢赶来深圳,餐风露宿,精雕细琢,伴着机器的轰鸣声,一座座景点渐渐落成。这些建设者们远离故乡,用希望和汗水创造着未来,而他们自己却栖身在几十人一间的工棚里。张天颖被深深地感动了,在日记中,她写道:“……面对这些建设者,一种从未有过的献身冲动在心田激荡。我愿将自己的热血汇入锦绣中华开拓者的洪流中,用一个女性纤弱的步伐走出坚定的人生之路。我将不再孤独,不再幻想,我有信心用成功和汗水证明自己,证明女性的伟大。”

张天颖住进了一间破旧的幼儿园教室里,成为锦绣中华的第一个导游。但她工作的第一天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因为她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山头那座孤零零的茅屋竟是锦绣中华员工的食堂。她不敢出声,不敢有怨言,尽管有许多不习惯,但她相信环境会改变人,她相信自己会迅速适应的。

白天,她头顶烈日来往于黄土飞场的景点之间,了解每一个景点的故事、买书、做手记、收集有关资料;入夜,等别人不用办公台时,她立刻伏案整理景点资料。生活可算是够清苦的,可她却慷慨地接受了阳光赐予的礼物,昔日白皙的皮肤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健康色”。有时,她觉得真的好累,恨不能好好的睡一觉,哪怕有一天,不,就一会儿也好啊!就在汗水与泪水的交替中,她和她的姐妹们成功

了！

1989年6月10日，她们向公司全体领导展示风采的时刻到了，张天颖第一个出场示范讲解。紧张的情绪在身心投入的讲解中消失，自信在掌声中升华，他们成功了。从那一天起，她们正式开始迎接世界各国的来宾，伴着游人“一步迈进历史，一天畅游中国”。张天颖背着扩音器，把音容笑貌带给海内外的朋友，向人们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

“锦绣中华”小人国无论从艺术构思、建筑、还是景点数量，再现景物方面，均有其独到的艺术特色，而每一个景点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张天颖称自己的工作是“笑中含泪”，是“头顶蓝天，脚踩大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时常她顾不上吃饭，渴望有一杯水，每天行走在太阳下，大热天，说有多难受就有多难受。

天颖说：“我们的导游工作大多时候是苦多于甜，这里有句话叫：‘人家坐着你站着，人家吃着你看着。’这且不说，深圳夏天的太阳晒得人没处躲，我们有时一天8小时都在景区里泡着，不许戴墨镜，不许打伞……”

也许生活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有时它给人带来成功的喜悦，有时却也带给人失败的痛苦。艰苦的生活，使天颖心力交瘁。一天，在景区，她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住！”并试图用工作来忘掉一切烦恼，几经努力挣扎，终因劳累过度倒在烈日炎炎的景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终于哭了。那天刚好是端午节，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刻啊！所有

激励她奋进的精神支柱都随哭声消失了，她产生了一个念头——回家。于是，她偷偷跑回宿舍收拾行囊，那张木棉树的照片也无力地塞进了旅行袋的角落。毕竟是第一次独立行走，脚步是那样的蹒跚，毕竟锦绣中华是她人生的第一个驿站，毕竟那里曾有过她的奋斗，她的追求，她的决心，她的汗水。她又一次来到工地，她留恋这里的日日夜夜，深圳湾深邃的海水，唤起了她难忘的回忆，就在初具规模的“长城”脚下，总经理曾意味深长地告诉她：“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你一定要讲出我们民族的精华。”

由此，她又想起了木棉，想起了老师和同学的赠言：“生活是没有一帆风顺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拼搏”，“走向生活也就走向风雨。”难道我能向生活低头吗？天颖想，不！我不能当一个逃兵，我要坚持下去，用微笑迎接生活的挑战。张天颖最终战胜了自己的软弱，留了下来。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成了她前进的动力。

内地许多旅游专业不教粤语，而张天颖的老师却说：“对立志当导游的人来说，多说一种语言是你们的一笔财富，也有可能多一次机会。”天颖深深记住了老师的话，当老师教她们学粤语时，她学得比谁都认真，现在，她已能用粤语、英语、普通话3种语言解说。

在带队的过程中，人的素质不同，教养不同，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人傲慢无理，有的人百般刁难，有的人举止轻浮，动手动脚。有的团说好来，她们苦等半天都不来；有的团到点不走，她们误了开饭时间。

等送走客人，又要去带另一个团，只好空着肚子上阵。有时遇到刁蛮的游客，还要有好脾气。一次，天颖遇到一位游客，一进景点他就开始考她，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一会对景点的建筑百般挑剔，一会说：“大雁塔马付颜色不对。”当她向游客讲解西安埋了多少帝王时，这位游客又尖刻地说：“小姐，你好象多说了一个。”据资料记载，天颖觉得自己没有说错，气得顶了一句：“请相信我年轻的记忆，如果我记错了，请允许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这位游客看了天颖一眼，不再说什么。

在锦绣中华当导游很累，也很孤独，几乎没有节假日。天颖与朋友们联系都是用电话，她在这里几年来扳起指头算没休过几个星期天。

工作再苦再累，天颖都能承受，但不能承受别人盛气凌人的目光和语气。天颖说：“有位年轻、气傲、自称云南问题的专家，在游览中，对导游小姐不屑一顾，认为导游的素质低，抢过话筒自己来解说。导游组的人知道了，个个不服气，但光不服气不好，得让他清楚我们这当导游的小姐可不是来混饭吃的。于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查历史，找资料充实自己，后来，他几次要求给我们讲课，公司同意了。在讲课过程中，我们向他提了一些问题，如白族民居的结构为何是‘文房一照壁’，照壁中的‘照’怎么解释？‘三房一照壁’与地理的关系怎样？结果，他不是答错就是答不上来，我们给他当堂解说，他终于服了。看上去是有些赌气，但我们就是要争这口气，不能让人随便瞧不起我们。”

一个人的导游知识再丰富，也有死角，何况面对的有可能是多个方面的专家。

在游客面前，天颖必须做到胸有成竹，好象所有的地方自己都亲自去过。有些游客故意刁难导游，遇到这种情况，天颖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巧妙解脱，既顾全游客面子，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有位内地来的游客说她很真诚，问的一些问题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回去以后，他把她不知道的问题，查出有关资料寄给天颖参考。

因工作出色，她被提升为接待组的主任，也是唯一从导游中提拔上来的。公司现在对她和其他几个老导游实行保护措施，平常的接待任务不安排她们，她们要负责搞培训工作并负责重要的接待任务。

1990年6月，她被指定陪同江泽民书记。游览中，总书记问会不会英语，天颖说会，总书记便用熟练的英语和她对话。在天山下，江总书记主动邀请天颖对诵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总书记的亲切随和，使她一点也没有拘束感，发挥自如。

临别时，人们簇拥着总书记上车，她静静地站在一旁。忽然，总书记离开很多围拥他的人，笑着大踏步向她走来，紧握着她的手用英语对她说：“You explain very well, Thank you!”（你讲得很好，谢谢你！）总书记离开深圳时，不忘她这个导游，又叫人带话给她，谢谢她。天颖很感动，接待过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是她接待的领导人中印象最深刻的。

1990年3月8日,张天颖受遣去新加坡参加中国旅游节。短短的6天时间,锦绣中华展台吸引了无数的海外同胞。有一位70岁的老华侨,每天都来和她交谈,他告诉天颖:“我10多岁就离开家,在国外漂零了半个世纪,今天看到祖国的亲人,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加思念祖国,渴望叶落归根啦!”那一刻,张天颖,一个普通的中国姑娘,在异国他乡是祖国的代表,锦绣中华是祖国繁荣富强的标志,海外游子那积压数十年的爱国之情深深地激荡着天颖的心,她终于找到了自己为社会奉献的位置,那时,她真想对深圳、对锦绣中华鞠一躬。

张天颖,锦绣中华的第一代导游,在短短的几天的异国他乡,听到的看到的使她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留恋木棉的故乡。她在演讲中深情地讲:“愿化做一株伟岸、挺拔的木棉,在南国的沃土上开出鲜艳的花朵。”

3. 白衣使者传福音

生活赋予每个人一份阳光,一份田野,一隅丰富多彩的生存空间。生活同时赋予张慧文这位罗湖区罗湖村企业公司医疗室的医务员,一个24岁的白衣使者一份充实,一份自信,一份苦苦追寻后获得的成熟。

1992年“五四”青年节,对张慧文来说是一个值得永生纪念的日子。那天早上9点钟,公司领导找到她,神秘地给她一张电影票:“小张,你一定去呀,不去可要后悔的

哟！”

张慧文随手接过票，以为是团支部组织团员去看《淮海战役》，一到凤凰戏院，一位迎宾男士看见她，便冲她说：“请坐到第一排去，这回你要请客了！”她有点稀里糊涂，坐定后看见戏院横幅上写着“罗湖区十大优秀青年临工颁奖大会”。当主持人念到她的名字，当她知道自己获此殊荣时，脑海里顿时出现一阵空白，过后的心情便是无比激动。

“4年多，我在特区苦苦跋涉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存在的价值能得到大家的承认，我很激动……”事后张慧文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1988年10月，也是这个张慧文，穿一件的确良碎花衬衣，黑色长裤，黑色皮鞋，齐耳“运动”短发，操一口地道的江西老俵话，随两个韶关女孩一同闯深圳。

曾在江西省赣州市生活了20年的她，看到了在栉比林立的酒楼、大厦、公司商场中间和边缘，一座又一座新型建筑比赛似的竞试高矮，脚手架上哨音声声、钢梁四周弧光飞溅。的士、巴士一辆接一辆拼命地沿街穿梭飞驰，连路人也都是步履匆匆……

张慧文觉得自己一下子要融入这种节奏感中。第二天，早上9点多钟，父亲的朋友把她带到一个地方——罗湖村企业公司，村委书记接待了他们。书记跟父亲的朋友谈话时，是用广东话说的，她一个字听不懂，后经对方介绍她才知道，原来这家公司是村办的集体合资单位，属于三来一补的来料加工类型。当时，这些新名词对于张慧文

来说是陌生的，她只知道，新厂香港老板还没有来投资，旧厂人员已满，所以只好暂时安排到公司的饭堂做杂工。

第三天，她在有关人员的带领下到公司的饭堂报到。公司饭堂与外面的世界形成极大的反差，一间大铁皮屋，加上又烧煤，风一吹煤灰满天飞，特别是这10月燥热天，里面就象一个大蒸笼似的，有时都要被烤焦的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下，饭堂工作人员要做出几百工人的饭菜来，谈何容易？！为了生存和发展，20岁正值妙龄的张慧文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洗菜、淘米、拖地、抹桌、洗碗，一干就干了半年多。

终于有一天，有一位港商来公司办了一家电子厂，张慧文被转到这家电子厂去打工。在那里，她几乎什么都干过，流水线插线员、QA、QC、包装等工，只要能干的，主管都会叫她干。也许是管理不善，这家电子厂开张不久，就不景气，老板要求工人每天上班12小时以上，工人每月工资却从不按时发放，往往发下来的工资左扣右扣也没剩下多少，整个厂就象一盘散沙。老板脾气不好，三天两天，动不动就炒工人“鱿鱼”，使工人没有一点归宿感和安全感。

因张慧文是内地来的，在内地国营单位也呆过，象这种类型的厂，她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次吧。

看看外面灿烂的夜空，看看高楼大厦，回到厂里却是租的农民破旧昏暗的“出租屋”，简直就象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外面繁华的一切都不属于她。这使她的情绪一落千丈，当初来深圳时的梦幻、理想，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她

开始明白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单调重复的工作，破旧的宿舍，不同口音的方言，不可口的饭菜，每天都很麻木地打发日子。但她又不服气，难道就这样溜回去吗？难道就此向“自立”两字低头吗？难道特区没有一条适合自己走的人生之路吗？想起来深圳时，家乡人羡慕的眼光和嘱托，张慧文只觉得一股豪气直冲脑门，她很清楚，自己不能回去，既然出来了，便没有回头之路！

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她便去学电脑，那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将来要做些什么，学电脑，只是想使空虚的日子过得更充实一点。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张慧文鼓足勇气找公司领导谈话。“你是外省人，一般公司要人首先是考虑本省人。”公司领导和蔼地说。

“请相信我，别人能干好的话，我会干得更好，况且，我还是高中毕业生。”张慧文初生牛犊不怕虎，尽量说服领导。

1989年5月，张慧文走出流水线，开始从事一些后勤管理工作。

1989年11月份，公司为了方便工人，使工人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决定办医务室，并聘用了广州某医院的一个退休女医生。因为一个人打理医务室是不可能的，领导便把张慧文调来和女医生一起负责医务室。张慧文高兴了几天，以为机会来了，可以大干一场了。两人计划筹备医务室所需要的东西，上医药店购买医用器材，又从广州医药公司把药拉回来。经过两个星期紧张辛苦的工作，医

务室终于开张了。

然而生活并不是处处尽如人意的，张慧文除了每天算一下药价，便没事可干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使她既感到无聊，又感到无奈。因为她从没学过医也没进修过卫校，女医生怕她出事，凡事都亲力亲为，从不让她插手帮忙。有病人来也不让她处理，有时女医生休假回广州，临走时，还要交待她，不能随便拿药给别人吃，如果有病人等她回来再说等等。张慧文表面听她的话，心里却不服气。心想：领导派我来协助你，没想到，你不但不教我还把我当外人，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碰，干起活来心里很被动，心中懊恼得很。

好在不久，这位女医生因年纪大了，提出辞职不干了。公司又聘来了一位也是退了休的女医生，姓唐，初次见面，张慧文就觉得她好面善，感觉也很好，暗暗高兴，好学之心使她重新燃起一股希望。

当唐医生从她的谈话中得知前面的医生并没有教她什么时，就对张慧文说：“小张，首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想不想学？”她当时不加思索地说：“当然想学，只要你肯教我。”唐医生答得也很爽快：“好！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你。”

于是，她就在这位唐医生的指导下，买了有关医药方面的书，如《医用药物手册》、《医院配药手册》、《临床常见病例》，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从学习到实践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首先，她要了解医务室一共有多少种药，然后要熟记每一

种药的用途、用量、所产生的副作用等。熟悉了每一种药的作用之后，就要实践了，什么样的病用什么样的药好，什么样的外伤该怎样处理，内服药和外用药如何分清等。

做一个医务人员和做一个工人不同，这是一份技术性工作，要具有一定的责任感。为了使自己尽快适应这个工作，她开始刻苦磨炼自己，在唐医生的指导下，首先她做了一个米袋，用一支针在米袋上面练，练了一个多月，经过唐医生的考核合格后，才开始上岗位。逐渐掌握了医务的基本知识和经验，她才感到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位置，每一天上班都以最佳状态出现，并且还有一种从没有过的自豪感。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她可以慢慢地单独处理病人，处理完之后，她就向唐医生汇报处理结果，唐医生有时还夸她呢！就在这位老医生的帮助和教导下，张慧文渐渐热爱上了这项工作。

1990年9月的一天中午，吃过午饭后，她和唐医生躺下午休了。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她同唐医生惊醒，起身开门正准备问怎么回事，门口的工人开口就说：“医生，我们厂有几个工人肚子不舒服，想吐，请你们帮看一看。”她回答说：“请你们到医疗室门口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到。”说后，她和唐医生立即换衣赶到医疗室。一看那几个工人个个面色潮红，眼睛充血。经唐医生检查及工人们自诉，初步确诊为食物中毒。她和医生立即采取措施，帮他们作临时处理。此时，另外一家厂的几个工人也同前面几个工人的症状一样来了医疗室，接着第三家、第四家

厂的工人也来了,类似这种病情。而且有的症状越来越厉害,一共 40 多位。因医疗室太小,不可能全部接纳检查用药,加上又是午休时间,为了抢时间,她同医生商量后即刻打电话通知公司的司机,要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公司送工人上医院。顺便她也通知了书记和经理,当他们得知后,很快赶到公司,连书记的专车也用上了。一共 3 辆车把严重者送到医院,并又告之饭堂把中午的饭菜拿到医院化验,又要求饭堂煮绿豆汤给工人吃起解毒作用。经医院化验,原来是一种池鱼有毒,导致了一些工人中毒。数小时的紧张处理以及公司领导同她们的密切配合,40 多位工人全部脱险,她同唐医生才松了一口气。

为了配合防疫站做好工人的防疫工作,张慧文主动协助医生为 800 多名工人注射了预防流脑及乙肝疫苗针,为公司节省了一笔开支。

几年来,张慧文经常加班,为发生工伤事故及患病的工人取药,包扎,打针,从不计较。她每天晚上自愿留下来值班 1—2 小时,风雨不改,不计报酬。别看只有两个工作人员的医务室,月看病平均 1200 多人次,日平均看病 40 人次,有时高达 70 人次。几年来从没发生医疗事故。

医务室没有成立时,工人到医院看病要排队挂号,排队等医生,排队取药,去一次医院往往要花大半天时间,自从公司有了医务室,工人看病花几分钟就可以了,大大缩短了工人看病时间,给工人提供了许多方便。

但也有些病人不跟医生合作,如有的工人看病后,给药时,药袋上明明写清楚了该怎样服用,但是他不听医生

的，两天的药一天吃完，然后又来要药。问他为什么不按医生交待的服用，他说吃多一点好得快，弄得张慧文和医生哭笑不得。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有些药是不能超量吃的，吃多了会有一些不良症状出现。这无疑给医务人员增加了麻烦。

同是远离家门出外打工，张慧文对打工的兄弟姐妹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她总是以一种热情诚恳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前来看病的人，并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

有一天，一位打工妹一脸灰白，浑身出虚汗，摇摇晃晃跑来医务室求医生开病假条，张慧文和医生看见她难受的样子，很想帮她，反复问她一些情况，最后这位打工妹才吞吞吐吐讲了实话：

“昨天星期天，我和他去蛇口一家私人诊所作了流产手术。”

“为什么跑这么远去，深圳不能做吗？”医生问。

“深圳做要花好多钱，我付不起。”

“你男朋友不帮你吗？”

“他也是一个打工的，月工资只有3、4百元。”

“他和我一样，请假一天要扣掉一个月的全勤奖，他请假不合算。”

打工妹的喜与忧、哀与乐，真是一言难尽。大凡做医生的都有一份医德，遇到这种情况，张慧文和医生所能做到的只能给她开几天病假，并暗示她以后要自爱，不要因“疯狂”的恋爱而损伤了自己的身体。张慧文的经历并不象有些打工妹那么富有故事情节，但她毕竟也有过一段

艰苦的经历,也尝到过人生的坎坷,也是在深圳打工一族的队伍中成长和锻炼出来的。

现在每天晚上张慧文都跑到夜校去上课,参加成人高考时由于没有医学这个专业,她报了财会专业,现在正在读。也许毕业之后,她会改行,也许不会,主要是看工作的需要,因为深圳这个地方是需要复合型人材的,不管将来做什么都好。她说她的准则是:“不失去自我,从一件普通的小事做起,寻找自身的价值。”

从一个白衣临工变成护理技术全面,深受工人欢迎的医务人员,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到罗湖区十大优秀青年,这里面蕴含了她多少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奉献。一个人的改变也许不在于它的时间长短,而是她周围的环境及本人的志向所确定的。1992年,罗湖区召开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她作为一名临工光荣的当选为大会的正式代表。

打工4年来,公司领导给了她一次次机会才使她有了今天的成绩。因为她不是专职学医的,是半路出家,公司领导那么信任她,把医务室给她和一个医生打理。还有那么多工人也这么信任和尊重她,这使她很感动。

怀着报答生活馈赠的愿望,张慧文把自己心中的爱送给她的病人分享。她除了热衷于自己本职工作外,她还拥有一份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积极参于深圳市图书馆“读者联谊会”的各种活动。无论是演讲比赛,还是诗歌朗诵都有其独特的风采。她喜欢的一首诗是:

“生命是一次远航,

不要因为拒绝终点，
就中途抛锚；
既然目标是前方，
何惧惊涛骇浪。
只要生命的帆不落，
就注定要去乘风破浪。”

4. 敢问路在何方

5年前,当年仅18岁的孙达成告别了学生时代怯生生地踏上南下的列车来闯深圳时,他无法想象前方那个陌生的世界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5年后,当他从一名在基层站岗巡逻的普通“保安仔”一步一步地调到深圳市保安服务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成为一位保安“秀才”,并被评为“首届深圳市十位最佳外来青工”时,他的心情又会是怎样的呢?且让我们一起翻开孙达成记忆的匣子……

校园“作家”

学生时代固然值得留念,中学时代更令人难忘。

步入初中,孙达成不知不觉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四川攀枝花市矿务局第十中学上初中时,每每看到别人的文章写得很精彩,不甘落后的他便悄悄地模仿着别人的例文也动起笔来。由于写作知识浅薄,又无人指

点,偶尔写些日记、诗歌、散文诸如此类的东西,只得统统在抽屉里“发表”。

教他语文的班主任肖青老师给了他不少指点。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肖老师找到他问:“小孙,你知道要想成为一位作家要具备什么条件吗?”天真活泼的他脱口而出:“能写出很多受人喜欢的文章。”“这只是一个方面,当作家不但要勤学、勤写、勤动脑子,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学知识和文学修养。”老师认真地对他悄然指点道:“你想当作家,首先要在作文这方面下功夫。”肖老师在学校是位优秀语文教师,很多文章被报刊采用过。老师的这番话打动了他那颗不成熟的心。当晚,他躺在床上把老师的话想了很久,很久……

打那以后,他跑遍了市内仅有的几家大型书店,买回来了不少如何写好作文之类的书。在同学那里又借了一些写作方面的书,一边学习功课,一边阅读这些书。

在学校,孙达成是个蓝球迷,尽管身体较差,但他很活跃,头脑又灵活,打蓝球的水平在十中也排到一二名。学校每次举行球赛,作为主力队员的他都冲锋陷阵,总会拿到第一。为了不辜负老师的希望,为了能早日当上作家,经过苦苦哀求,征得体育老师的同意,他毅然辞去了学校蓝球队长的职务而潜心去提高他的写作水平和技巧。

经过一段时间的埋头苦干和老师的帮助指点,他的写作水平和写作技巧有所提高,在期末考试中,他的一篇作文《难忘的往事》在全校获得了最高分。老师为他感到

高兴，同学们为他感到自豪和骄傲。

第二学期开始，他写的《难忘的往事》一文第一次被张贴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又被学校广播站采用，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好评。

从这以后，他写作文的干劲越来越大，写出的文章越来越精彩。在他的带领下，学校的不少中学生把他当作“老师”请教，要他谈写作文的经验。不久，校领导和同学们推荐他负责每周一期的黑板报采编工作。

为办好黑板报，他广泛征求师生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全校十几个熟悉黑板报知识的骨干成员献计献策。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黑板报终于以崭新的姿态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赞扬。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初一直到高中，他的作文多次在市级、区级学校获了奖，也成了十中大名鼎鼎的“校园作家”。

苦涩记忆

每个人的一生几乎都有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孙达成的那段最苦涩的经历是在高中毕业后待业在家的日子。

上高中时，尽管他还象在初中那样仍做着“作家梦”，多半时间精力用在写作文中，但他的其它几门功课在全校还是名列前茅的。老师、同学、父母都为他感到高兴。临近升学考试的那段紧张的时间，他更有一股搏劲，每晚温习功课都坚持到深夜二三点；每顿饭菜都是爸妈送到书桌上。有时爸妈吃完饭上夜班后，放在书桌上的饭就凉了

几个小时。为填饱肚子，便把冷冰冰的饭菜也狼吞虎咽吃了下去。就这样一直苦干到升学考试的那天。

在考场上，他沉着应战，每门学科，几乎每道题都被他征服了。

考试结束后，肖老师和他爸妈立即上前询问他考得怎样，他满意地对大家说：“这次的题还不难，升学应该没什么问题。”大家听他这样一说，心里也踏实多了。

接下来便是带着一颗喜悦之心等待录取通知。

转眼又过了一个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那晚，矿上放电影，坐在他爸身边的肖老师很不是滋味地把下来的考试分数单交给他爸说：“老孙，你看看，真没想到达成这同学这么没运气，他报考西南政法学院仅仅差了 5 分。”肖老师叹息着，“唉，平时他的成绩还不错的，怎么在这关键时候就差了这几分。”

平时少言寡语的爸爸也不敢相信肖老师讲的是真实的。他借着朦胧的放映灯光看了考试成绩单一遍又一遍，尔后大骂起来：“臭小子，怎么这样没用，上学 10 年来，我们希望他能成才，能考上学校。花费了那么多心血，就希望他这次能考出好的成绩，有一个好的工作，可他……”

那晚的电影很精彩，妈妈没时间去看，电影散场已是 12 点了。回到家里，他高兴地对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不去看电影呢，今晚的电影太棒了。”正当他给妈妈讲电影的情节，讲得津津有味时，屋外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他知道是爸回来了，一边走去开门一边在想：“怎么爸今天使这么大劲敲门。”门开了，爸爸怒气冲天，朝他脸上

就是一把掌，痛得他大叫了一声。还没等他明白过来，爸爸一下拉着他的手来到妈妈身边，把那张通知书扔在地上，冲着妈妈说：“你看，你的好儿子，他妈的怎么考的，就差这 5 分没考上大学。”妈妈听这么一说，急冲冲地从地上捡起那张通知书，问爸爸：“老头子，是真的吗？”这时，他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脑子里顿时“轰”的一声爆炸开了。妈妈边问边看，看完后，她抱着他大哭起来，“儿啊，你怎么搞的，难道你这么没出息……”爸爸越听越生气，抓住达成的手襟朝他脸上又是两个巴掌。这还不说，他还顺手操起一根皮带打了过来，边打边怒吼着：“你给老子滚出去，我没你这个儿子，滚！快滚！”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使达成一气之下伤心地打开了大门，跑了出去，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命运啊，命运，你为何对我这样不公平？本来成绩还不赖的我为何会落榜？”望着满天的星空，孙达成泪流如注。一个人孤零零地跑到了杂草丛生没有人家的山坡上。望着那条哗哗流水的金沙江，真想跳下去洗尽那不平静的一切，结束在人世间的种种烦恼，但又想到了这样去死却毫无意义，他没敢这样做。山坡上风很大很大，沉静得可怕，想回家又怕父母打骂，去同学家过夜更没脸面。看看爸爸为自己考上高中时买的一块手表，已是凌晨 4 点多了，疲惫痛苦不堪的他找来了一些干枯的野草放在一个小小的山沟里，就这样躺了下来。蚊虫、苍蝇这时也与他为敌，不时向他发起进攻，不知过了多久，他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等到醒来时，火辣辣的太阳正从头顶上直

射下来，他揉了揉朦胧的双眼，有气无力地坐了起来，觉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被爸打过的脸仍象火烤一样痛得厉害。

走过这座小山坡，远处他家的那栋楼房依稀可见，再仔细一看，妈妈正在寻找自己。

那焦急的身影使他又一次落下了伤心的泪水，他不忍看到那场面，一扭头又回到原来的山沟里躺了下来。

夕阳已经西下，黑夜悄悄地来到了。不知什么时候，一双有力的手把他抱起来，还哭泣着：“儿啦，你为啥这么傻呀，有家为啥不回来，要受这样的罪。”他慢慢地睁开双眼，看见妈妈痛苦的样子，周围站着 10 多个同学邻居，他再一次把泪水吞进了肚里。他们这才把奄奄一息的孙达成扶回了家。

升学落榜，在家待业的滋味也难受。全矿仍有 1200 多待业青年要父母养着，有的竟干起偷盗、抢劫、耍流氓等危害社会治安的事情来。那时，妈妈又无工作，爸爸是位下井的煤矿工人，弟妹又上学，每月只有 150 多元钱工资的爸爸供养他们，生活十分困难。每天吃饭时，爸爸都会板着脸对孙达成说：“要人还要吃饭。”尽管他爸爸这样埋怨他，但他却不敢吭一声，总有一天自己能有一份工作，好早日摆脱这种待业的生活，孙达成在想。

一天，与他同样在家待业的一位同学对孙达成说：“达成，你不是有个姑父在深圳吗？那地方是个特区，高楼矗立，人流如潮，是个小香港，你成天呆在家，何不找你姑父去找一份职业？”同学的这一番话一下子提醒了他，当

天,他写了封长达 2000 多字的信,诉说了自己因没考上大学在家待业的苦涩滋味,寄给了远方的姑父。没几天,多年没有通过信的姑父爽快地同意了他的要求。收到回信后,第二天他便办好了前往深圳的手续,穿了一件只值 6 元钱的衬衣,一条 8 块多钱的裤子,一双 3 元钱的解放鞋,带一个只能装二三件衣服的挎包,单身一人赶上了南下的列车。临走那天,妈妈把他送上了公共汽车,仍在生气的爸爸看都不看他一眼,便去邻居家聊天去了。

独闯深圳

从四川的攀枝花到广东的深圳市有两千多公里。坐汽车,搭火车,其中的辛酸难以言喻。临走时,妈妈从邻居家借了 300 多元钱路费给他。第一次出远门,又是初到深圳,胆小怕事,不知道火车的路线又不敢问人,生怕别人骗去自己仅有的 300 元路费钱。好在他自己的脑袋灵活,在火车站买了张全国交通旅游图,仔细看后,找到了最快捷的路线后才买了张从昆明到广州的火车票。在火车上,看着那些阔佬们买一罐 4 元钱的可口可乐,一掏腰包就是一张 100 元的票子,自己心里羡慕极了。真想自己以后也有这样多的钱,免得爸爸再说自己是个吃闲饭的人。一路上,目睹祖国大地,美丽如画的山川、平原,连觉都顾不上睡。晚上,“哐、哐”的列车在不停地奔驰,窗外一片漆黑,疲倦的他真想靠在座位上睡会儿,一想到妈妈出门时说的话:“路上小心点,扒手多”,胆小如鼠的他又不敢闭上将要打架的双眼。

一站又一站，一天又一天。3天3夜的车程终于载着疲惫不堪的孙达成来到深圳。

“哗”，正如同学所讲的那样，深圳是个“小香港”，高楼林立，人流如潮，车辆川流不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出现在他眼前。他把头靠贴在窗前，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这座美丽的城市，觉得一切都那么新鲜，那样气派。

走到姑父家门口，只见铺着地毯的地板，比自己穿的衣服还要干净，他愣了半天不敢走进去，怕踏脏了地毯。在姑父的指点下，他才脱了那双又臭又脏的解放鞋走了进去。看见装修得如同宫殿的客厅，一台28寸的大彩电，高贵的家私和姑姑、表弟热情迎接的笑脸，仿佛走进了人间天堂，一切都那样美好。

晚饭后，姑父与他拉着家常的同时，问他喜爱什么，孙达成脱口而出，“爱好写作，当个作家什么的，想在这方面干点成绩来。”“我回老家时，听我爸和妈写信回来说你写的作文还不错，但这不是写文学作品，就你现在这点水平还差得远喽。”姑父和蔼可亲地又说：“不过，路是人走出来的，就看你怎样去走这条路。但现在你自己得找一个职业才行。”他知道，这是姑父对自己的鼓励与鞭策，同时也给自己的思想增强了压力感和紧迫感。他原来满以为姑父会给自己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而现实的情况是“自谋出路”。

来深圳已一个星期了，表弟忙于做暑假作业，没时间带他去找活干。他便独自一人几乎跑遍了深圳的大街小巷，看了不少的招工广告，亲自上门应聘都未能如愿以

偿。回到姑父家里又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由于自己刚从学校步入社会,书本知识也欠缺,加上没有任何技术特长,又无广东省户口,结果苦苦寻找了一个星期竟一无所获。姑父,姑姑也为他担心,他因找不到工作比他们更着急。一天,为了在报纸上寻找工作,他连早餐都没吃,一口气跑到《深圳特区报》社门前买了张当天的报纸,仔细地看了起来,从报纸左下角的一则广告中,看到深圳市保安服务公司招收保安员的广告。刚来深圳人地生疏,乘车不便,拿着报纸问了十多个人才找到深南中路华南电力大厦的深圳市保安服务公司,走进了该公司护卫部的办公室。这间不到 20 平方米的办公室挤满了身强力壮的应聘者,几位身着保安制服的管理人员正在为应聘者忙碌着。他们的制服笔挺威严,头上红盾金鹏的帽徽在日光灯的照耀下断断熠熠生辉,在家时他在电影里看过公安干警的制服,却是第一次看见比公安制服更威武的保安制服,不禁油然对他们产生了一种羡慕之情,一种深深的敬意。孙达成心里想,要是自己也成为一名特区的保安员,那该多荣誉啊! 想着想着,一位管理人员叫了他一声:“先生,下一个该你了,到王经理那里面试。”这下,他回过神来,大大方方走到那个 25、6 岁身着公安制服的王经理面前说了声“您好,经理。”王经理看着他说:“人倒不错,就看你行不行。”接着他又问:“你为什么要当保安员?”孙达成胸有成竹地回答:“当保安员是维护社会治安,既神圣又光荣。”他点了点头,“嗯,小伙子,回答得挺不错嘛,刚才有几个来应聘的竟然说当保安员是为了生活,为了挣钱,

你与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明天就收拾行李来上班。”他真不敢想象这位经理这样快人快语，而且这样相信自己。走出办公室，他高兴得差点儿跳了起来，一路上边走边唱歌。姑父、姑姑他们也为他感到高兴，那天晚上。姑姑特地做了一大桌香馨的饭菜，姑父拿出了往日舍不得喝的“五粮液”，还有来姑父家的老乡也为他举杯庆贺，祝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干出成绩。

站第一岗

为了特区的安宁，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安”这是个既神圣而又崇高的职业。

那天，孙达成很早就起了床，吃饱了姑姑给他做的早餐，独自提前步行来到了保安公司，离上班时间足有一个小时，护卫部的门还没开。他站在门口等了约半个小时，这时，远处走廊传来了脚步声，定睛看去，王经理正迈着军人般的步伐向自己这边走来。孙达成振作起精神，朝他说：“早上好，经理！”“早上好！”王经理边回答边问：“几点钟到的？”“7点。”他边开门边点了点头：“嘿，还蛮积极嘛。”

上班的管理人员陆续走进了办公室。王经理吩咐一名管理人员为他办好了一切上岗手续，还发了一套保安服让他穿上。

在去上班的路上，王经理边开车边教育他说：“小伙子，你既然穿上了这身制服，就不要对不起这身制服，一定要好好地干。”王经理还说，做保安工作是一件很不容

易的事。一路上孙达成耐心地听着，汽车驶出了市区，来到了一栋很陈旧的平房门前停了下来。十多个身着制服的保安员站得很整齐，见王经理走下车，他们行了个军礼，齐声说：“首长好！”这场面他只是在电影电视里看过，比部队检阅的那个场面还逼真。一位与经理年龄相似的保安员从队列中走了出来，向王经理也行了个军礼：“首长好！东湖宾馆保安部长樊建忠，请首长作指示。”王经理也向大家行了个军礼：“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今天我们队伍中又来了一位新同志，他叫孙达成，希望大家要关心和帮助他做好工作。”说完登上汽车远去了。

中午的太阳晒得人两眼直冒金花，跟着樊部长熟悉了这座富丽堂皇、造型别致、环境优雅的宾馆的每一个部位后，他们又来到了大门口。门前有一个环岛式的停车场，环岛中间是一个喷泉式的小池，环岛的四周有烂漫的樱花，金黄的菊花，还有月季等，停车场里停着几辆豪华型的丰田、奔驰车。来这里旅游、观光的中外客商出入大门络绎不绝。樊部长一再交待他要做好这里的防火、防盗、防破坏的安全保卫工作，力争做到万无一失。说着，他指着一辆不按规定乱停乱放的中巴对孙达成说：“你看，我们保安员这种执勤态度多不负责任，象这样不管事的保安员能行吗？”说完，他带着孙达成在放着冷气的大厅找到了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执勤保安员，指责说：“客户是花钱买平安，请我们来是干活的，而不是请你来这里享受的，还不快去疏通车辆。”

交接班时间到了，他与刚才被部长批评的保安员办

理好了交接手续，便很自豪地执起勤来。这时，一辆丰田车“嘎”然停在门边。孙达成指着门前一个标有“门前禁止停放一切车辆”小告示牌，给司机行了个军礼说：“对不起，这里不能停车，请停在规定位置上。”司机装着没听见似的，关掉了发动机，他又走上前去彬彬有礼道：“司机同志，请把车停在划线的位置上。”那位身材高大的司机打开车门走下来，神气十足地冲着他：“臭保安，你管得着吗？少管闲事，不然，老子就不客气了。”说完关上车门直往大厅走去。真没想到刚执勤还不到 10 分钟竟遇到这种事情还遭受辱骂，满肚子的气顿时想发泄出来，但又想到自己是位保安员，便强忍着仍和气地拦住司机：“司机同志，请理解我的工作，这是宾馆的规定，我有职责这样做。”常言道，“三句好话软人心，”经他耐心地劝说，那位刚才还蛮不讲理的司机仿佛变了另外一个人。一声不吭地走回去把车停在了指定的停放位置。

停车场外，烈日烘烤着混凝土的地板，气温高达 40℃，孙达成站在烈日下指挥过往车辆，汗水早已湿透了衣服，脸被烈日晒得火辣辣的。看着门前阴凉处的迎宾小姐津津有味地饮着一罐百事可乐，他干枯的咽喉痒痒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那迎宾小姐实在是过意不去，推开门拿着一罐饮料热情地说：“保安，你喝一罐吧。”孙达成笑着说：“上班时间不能吃东西。”她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这么认真，看你晒成这个样子，还是到客厅去休息一下吧，那里的空调凉凉的。”尽管她劝了他一遍又一遍，但他仍然坚守在岗位上。

站着执勤 8 个小时，终于熬过去了。下班后，孙达成全身象散了架似的，回到宿舍帽子往桌上一扔，便躺在床上。

樊部长和几个保安员推门进来了，关切地问道：“小孙，今天执勤有何感受，很累吧！”他一骨碌忙从床上坐起来：“累倒没关系，只是有人不理解干我们这一行的。”樊部长追问道：“是不是发生不愉快的事了。”他详细地把司机不按规定停车而发生的事情向他作了汇报。在场的一位保安员也似有同样的感受，气乎乎地说：“干我们这行真是下流，人家就是看不起。”樊部长很有信心地对大家说：“目前，社会上的一些人对我们是有一些看法，无论人家怎么看，我们只有干好工作才能得到别人理解与尊重！”

拔笔相助

面对着红色的金鹏帽徽的光耀和一身制服的庄严，有人羡慕保安员这职业的特殊、神圣。那潇洒、那威风、那风流……

可是，当自己生活在这个队伍中，领略了这些用火红的青春、满腔的热血为特区社会治安谱写一曲曲动人的歌的风采之后，才渐渐懂得，他们还忍受着种种挑战。

在深圳，一些人常把这些年轻的保安员称作“看门狗、臭保安”等等，诸如此类的称呼，无疑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贬低了他们的形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保安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了让社会重视保安工作，理解、支持

这项工作，孙达成认为只有通过各种媒介宣传向社会呼吁，让人们对保安工作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才有助于树立保安员在群众中的高大形象，有助于社会开展保安业务。

那时，他被调到了白沙岭的一家银行负责保卫工作，在业余时间，他一边攻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文秘专业的大专课程，一边积极写稿。由于缺乏写作经验，先后半年时间，一连向报社、电台投了 30 多篇稿都石沉大海。不知是什么风这件事竟吹到了护卫部王经理的耳朵里。一次，他到护卫部开保安班部长会议结束后，王经理找到他当着不少保安员的面既开玩笑又挖苦着说：“孙达成，你这个孙行者到底是不是那块写作的料子，自学了半年，写了 30 多篇稿都不中，我看你这个记者也是个废物，还是安心干好本职吧！”在场的保安员不时看着他，都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的脸顿时红了，心里暗暗埋怨道：“经理呀，经理，你训人也应该有个场地嘛，况且我又不是本职工作干得不好……”

那天晚上是他姑父 45 岁的生日，孙达成特地到蛋糕店订做了个生日蛋糕给姑父。席间，姑父问他近来的工作情况如何，他都一一作了回答。“写的稿子发表了吗？”姑父严肃地问道。他说：“写了几十篇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登出来，想必是写得不好。”姑父认真地说：“做任何事都要持之以恒。”

经理的“激将法”，姑父的关切，旁人在背后的冷嘲热讽，使他无言以对，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沉思。虽然他的思

想一度消沉过,但在沉思的背后,他又鼓足了勇气。

一天,他骑着自行车路过红荔路青少年活动中心门前时,见一大群人站在那里看《车轮下的悲剧》的橱窗,他推着单车,挤进人群,看着那一幕幕血的教训的交通事故案图片。他的心几乎在流血,他认为能使每个市民目睹到这样的图片起到一个教育作用,那该多好。于是,他急冲冲地回到宿舍,当晚就写了一篇《“车轮下的悲剧”办得好》一文送到了《深圳特区报》。没过几天,这篇处女作见报了。那天,他正休假,邮递员把一份银行订的《深圳特区报》送到银行,他拿起报纸翻了翻,“社会服务”版在醒目位置登了《“车轮下的悲剧”办得好》这篇文章。孙达成先是吃了一惊,以为是哪位记者写的,再仔细看看作者的名字是“孙达成”时,他高兴得在营业厅里又叫又跳,银行的4个职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责备他说:“你在干什么,大惊小怪的,是不是疯了。”他情不自禁地把报纸给他们看,说自己的文章发表了。这时,他们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解释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们以为出了什么事。”

那一夜,他高兴得没睡好觉,脑子里总想着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在报纸上出现了。

第二天,他的一位老乡给他提供了一个消息,说是保安公司护卫部的一个保安员抓了个抢劫犯,为失主挽回了5万多元的经济损失。为及时把这一重大的题材挖掘出来,当晚他下班后在老乡的陪同下采访了那位擒凶追徒的保安员。回到宿舍后,一篇《保安员擒贼追款令人赞》洋洋千字的通讯写了出来并送到报社,还不到二天又

被采用了。还没等他拿着报纸把这一消息告诉经理，而王经理却从公司打电话到银行找到他说：“小孙啦，你写保安员抓抢劫犯的事报纸登出来了，看见了吗？”他激动地回答：“王经理，我看见了。谢谢你的关心……”没等他讲完，王经理大声说：“喂，你听着，以后要继续努力，要大力宣传保安公司的好人好事，每登出一篇，我以单位名义奖励你 10 元钱，听见了吗？”

“经理，我听到了！”他回答道。

说完，王经理挂断了电话。

此后的日子，他写保安公司和保安员们的文章屡见报端和电台。或许有人会这样说：“写稿的稿费和奖金足比他工资多。”其实，谁知他爬格子的艰辛。一篇稿就那么几块钱，领导虽说过奖励，但哪里去实现呢？有人不服气地说他，成天不务正业专写稿子拿稿费，拿奖金。还有人背后说他写稿子拍经理的马屁，赢得领导的信赖……。没听见还好，一听到这些讽刺、挖苦的话就够他受的了。对此，孙达成是冷眼相对，工作好坏自有公论，不给发奖金，让给别人又何妨。只要正大光明，何惧“暗箭伤人”！

不知什么时候，王经理得知有的保安在孙达成背后说长道短的情况后，经过深入调查核实，不但严厉批评了那些打击别人积极性的人，而且还召开了保安大会，表扬了他大力宣传保安工作的做法。在会上王经理向大家说：“孙达成同志是个好青年，他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写稿，宣传保安，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应该大力支持他，使他为保安工作做出更大的

成绩。”顿时会场上掌声四起。孙达成深深地知道,这既是鼓励,也是鞭策。会场上那鼓舞人心的场面至今他还清楚的记得。之后,他写的稿件更多地出现在报纸上、电台中,当年被评为《深圳特区报》的“优秀通讯员”。

“无情无义”

人都是一种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高级动物,可有人说孙达成“只是有血有肉没有感情的东西”。

那是 1989 年 10 月,护卫部王经理把他从基层的保安员执勤点调到护卫部办公室负责基层保安点的执勤检查、落实、巡逻情况收集、汇报及部里的保安合同的落实等工作。

基层保安员的执勤检查落实,这是一个苦差使。严寒的冬天,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每天晚上 10 点钟起,从市区北面的红岗西村的集体宿舍出发,骑着单车要检查市区内 40 多个执勤岗位,往往要到天亮时才能检查完,回到部里又要向经理汇报后才回去休息。那时,宿舍附近又没饭堂,每天的两餐饭都要到老街的一个保安员饭堂去吃,一个来回就需要 1 个小时,往往睡不到一个好觉,星期天也要正常上班。经过一个多月的检查,发现有的保安员晚上执勤有离岗等现象,为了及时纠正这种极不负责的工作做法,孙达成便向王经理建议加强夜间对执勤点的巡逻检查制度,得到了王经理的采纳,并专门给他配了照相机,抓拍保安员值班睡觉的镜头。

在工作上,他从不马虎,每晚都要检查完 40 多个执

勤点，并作好登记。

一天晚上 4 点多钟，他检查到罗湖区一个银行的保安员执勤点时，发现值班台上只放着一顶保安员的帽子，而保安员不知去向，他还以为保安员上厕所了，便在岗位上一边顶替值班，一边检查值班巡逻登记本的记录情况。半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值班保安员回来，于是他到保安宿舍查看，掀开蚊帐一看，这名保安员穿着制服半躺在床上睡觉。这名保安员是保安公司某部一名领导的亲弟弟，可他还是打开照相机，拍下了这个镜头，并把他叫醒后进行了严肃批评，指出离岗的危害性。那位保安员心悦诚服地主动承认错误说：“孙队长，很对不起，我下不为例了。”经耐心询问，原来，这名保安员当天陪女朋友去东莞办事耽误了休息时间。他认为这不是理由，第二天，他把此事向护卫部经理作了汇报，部领导经研究决定给这名保安员警告一次，从每月只有 135 元的工资中扣了 100 元。事后，孙达成有点过意不去，没想到领导竟作出这样的决定，于是他自己从工资中拿出了 100 元给那位保安员作生活费。以后，那位保安员的工作格外认真负责。

一个刮风下雨的晚上，孙达成穿着雨衣，蹬着自行车去检查执勤点。因为天黑路滑，途经笋岗路的一个下坡路段时不慎摔倒，车坏人伤，手脚被摔破，疼痛不止，他只好扛着自行车来到附近的医院包扎好伤口之后，又到东门中行保安员执勤点那里借了一辆单车继续检查执勤点的情况。一些保安员见他包扎着手脚时，不忍地劝他道：“孙队长，你这是何苦啊，这样的黑天，又摔成这个样子，你到

底是图个啥。”他笑着回答：“唉，谁叫我吃了这碗饭？”

冒着绵绵细雨，忍受着袭人的寒气和伤口的剧烈疼痛，他穿越了条条大街小巷，检查了一个又一个保安执勤点。

在福田区振华路一个工厂的执勤点检查时，一个保安员也离开了岗位，他正要乘电梯去寻找时，看见这名保安员正半躺在电梯里用帽子盖着脸在睡觉。于是他又拍下了这个睡觉的镜头。第二天，他把情况向经理作了汇报，王经理把这位保安员通知到了办公室，这位保安员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责骂孙达成无中生有。1个小时后，照片洗出来放在那位保安员面前时，他哑口无言了。

事隔不久，那名受处分的保安员仍不服气地找到孙达成说：“你小子做事不要太绝情了，否则，别怪我不留情。”尽管，小孙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但他还是对小孙恨之入骨。暗地里，他还几次纠集了社会上的一些“烂仔”威胁小孙，警告小孙，小孙都忍受了过去。后来，护卫部对这名屡教不改的保安员作了开除的处理。

孙达成的这个苦差使不知得罪了多少保安员。一些同事、朋友曾劝他辞掉这份工作。更有人说他是无情无义的人。可他对大家说：“干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要干就得干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这样做是否是无情无义，他想，只有不理解这项工作的人才会这样认为。

在护卫部1年多的工作中他干得有声有色，当年被评为“先进个人”。

上调之后

“孙达成调到总经理办公室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迅速在整个保安公司爆炸开来。这一消息传开后，周围的人既有羡慕的，也有嫉妒的。羡慕他的人说：“孙达成真有本事，从一个保安员一步一步地爬到了总经理办公室。”嫉妒的人在背后却说：“那小子真让人不敢相信，他会调到总经理办公室，肯定有关系，要不然怎么会爬得那样快，我们来保安公司比他干的时间长，资格老，看他有多大本事……”

1990年5月的一天，孙达成检查完执勤点的保安工作下班后正在宿舍睡觉，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了。

门开了，走进来的一位护卫部管理人员，急促地对他 说：“快走，总经理有令，要你马上赶到总经理办公室。”说完，他一转身就“咚、咚、咚”地下楼了。

“总经理有令，要我去总公司……”孙达成反复思虑着，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军令如山倒”，不到20分钟功夫，他便赶到了总公司。

总经理古武，这位有40多年公安工作经验的古总经理正在和属下忙碌着，他见小孙站在门边迟迟不敢进来的样子，和蔼地把他叫了进去。

望着这位年过花甲的总经理，孙达成不知说什么才好。还是总经理笑着开了口：“小孙呀，来这个公司干了几

年啦？”小孙说：“快到 3 年了。”“嗯，干得还不错嘛，”古总经理点了点头，“我们准备把你调到办公室来工作，你愿意吗？”原来总经理叫自己来是为了这件事。小孙笑逐颜开回答说：“古总，你过奖啦，一切服从领导的安排。”古总交待他办好一切交接手续后就到公司报到。

原来，3 天前，古总经理召集各部门经理和公司主要骨干开了总结会议。他对大家说，目前，我们保安公司现有保安工程技术人员 2300 多人，年营业额已超过 5 千万元，由初期的几个人几张桌子赤膊上阵，发展成了一个集人防保安、技防保安、警用器材的经销，爆炸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运输以及深港武装押运等多功能的综合性、全方位的保安服务体系。几年来，据不完全统计，保安员在执勤岗位上抓获不法分子 2357 人，缴获赃物价值人民币 60 多万元，处理打架斗殴事情 1297 宗 308 人次，排除重大火患 1331 处，扑灭火灾 322 起，为客户挽回 400 万元的经济损失。此外，还先后配合有关单位护卫包括新加坡总理、南斯拉夫总理、斯里兰卡总理等国内外 360 多批 400 多人次出境和参观，承担了 440 多人次大型的展览、展销活动的保卫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从未发生因保安员失职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作完总结后，古总经理提议说：“目前，我们的工作做得很成功，但保安公司在社会上的形象还没树立起来，况且，办公室人手有限，急需要增加一名从事文秘工作的同志。”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在社会上招聘，有的说在本公司物色一个人……

古总又说：“我建议把护卫部的孙达成同志调上来。”

大家又议论起来，有人说：“我们公司 1800 多人的保安队伍出了这样一个人才，应该好好培养，要多给青年人一点机会。”

20 分钟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孙达成被安排到总经理办公室从事保安公司的文秘工作，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团组织工作以及基层保安执勤点的情况收集汇报等工作。

为了尽职尽责做好工作，他常常是早上班晚下班，节假日和晚上他都加班加点，从未要求公司给加班费。

到办公室后，公司没宿舍，领导便把他安排到在办公室旁边的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值班室里与另一个值班员住在一起。没有饭堂，到别的单位饭堂吃饭还要交 40% 的管理费，每月 390 元钱的工资，除了生活费所剩无几。洗衣、冲凉更困难，下班后经常停水。他没有向领导提出任何条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除做好本职工作之外，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全市 360 多个基层保安执勤点，掌握情况，收集材料。

1991 年，《深圳特区报》举办了“富华杯”现场短新闻大奖赛，为了把保安员怎样在夜间执勤巡逻的现场赶写出来，那天下午下班后，孙达成在办公室做了一些采访的准备工作。晚上 11 时开始，他便骑着自行车冒着朦朦胧细雨深入基层采访，至凌晨 5 点半钟共采访了 22 个执勤点，精疲力尽的他回到办公室后，拿出了纸和笔写了一篇“夜访保安岗”的现场短新闻，上班时把稿给领导审阅了

后立即送到了报社，又连续作战上起班来。领导劝他休息一天，他毅然坚持到了与大家一起下班的时候。那篇稿件因报社的原因没采用，后来他又送到了《深圳法制报》，没过几天便登了出来，深得报社编辑和记者们的赞扬。

两年多来，他先后写了各类体裁的文章 2500 多篇，达 30 多万字，发表在《中国保安》、《深圳特区报》和香港《文汇报》等几十种国内外报刊及市政府的《每日快报》上，为市有关领导部门及时提供信息，反映和讴歌战斗在保安战线上的好人好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先后被评为保安战线先进工作者、优秀保安员、十佳保安员、优秀团员和深圳市群众治安先进个人，1991 年荣立了个人三等功，并连续 5 年被《中国保安》、《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广播电台等多家新闻单位评为“优秀通讯员”，1992 年底被共青团深圳市委、市青年联合会、市劳动局、市人事局评为“首届深圳市十佳外来青工”。

在众多的打工兄弟姐妹眼里，他是个幸运儿，是个佼佼者。然而，他知道，这绝不是自己打工几年来全部的内涵和外延，这只是在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成功。他坚信：

“漫漫人生路，成功还有时。”

第四章 百万临工忧思录

当许多都市寻梦的年轻人，在四处碰壁之后，不得不提起行李，带着破碎了的梦怅然登上北去的列车时，心里是多么羡慕那些有幸捷足先登的同乡啊——他们可以在深圳的三资企业里打工挣钱。

多数人只盯着老乡们寄回家的钱，又有谁知道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们心中的苦恼呢？

据报载，某厂发生厂房倒塌事故，3名打工仔被压死；又据报载，公明镇一场火灾烧死打工仔16人。

更多的打工仔工资被克扣和拖欠，加班无休无止且无加班工资，生病时受歧视甚至被扫地出门，宿舍如同煮饭锅、冲凉成为奢侈品……在特区，这些打工仔在苦咽外面世界的无奈。

深圳某工业区一家电子厂，1991年6月5日工人集体向有关部门投诉：该厂有临时工近1000人，每日工作时间达15小时，迟到几分钟或打瞌睡，就不准进厂或被赶出厂。宿舍周围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饮用水远远不够，生活用水更少得可怜。厂方并没有象其他厂一样打井取水，临时工大多数往往饮用的是不足70℃的

水,甚至因喝生水闹腹泻无法上岗而被老板克扣工资的事也屡见不鲜,冲凉成了罕有的享乐(热水是绝对没有供应的)。中晚餐时间只有半小时,打饭排队的场面却比买股票还壮观,等饭打到了,开工的铃声便又声嘶力竭地吼起来了。许多工人叹息道:“我们过着比上甘岭还艰苦的生活!”

他们要求权益保护部门出面和厂方交涉,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 1、供应开水及生活用水;
- 2、每周保证休息 1 天;
- 3、每日工作不超过 12 小时;
- 4、中晚餐时间改为 1 小时。

“唉!我们的打工同胞为了生存劳苦奔波,要求竟如此低微!”事情解决后,市总工会权益保护部的一位负责同志很有感触地说。

太阳里面有黑洞。在中国这片离太阳最近的土地上,我们所指出的这些“黑洞”尽管无损于深圳特区的光辉,但我们希望在《深圳经济特区外来劳工条例》(草案)施行的今天,打工仔打工妹的呼声能够真正得到法律的回应。

1. 炒鱿鱼这道菜难吃

与临时工谈“炒鱿鱼”,他们往往有“谈虎色变”般的反应。临时工之所以是临时工而不是别的人,“炒鱿鱼”是个极大的特征。可以说,没有“炒鱿鱼”,就没有临时工。

细论起来,“炒鱿鱼”是双向的:厂方可以炒临时工的

“鱿鱼”——不让他再干下去；临时工也可以炒厂方的“鱿鱼”——“东家不打，打西家”，一走了之。这里可以看到，“炒鱿鱼”还是临时工管理中的一项重要手段呢。

可是，在现实中，是前一种情况多见，后一种情况少闻。这原因很简单，厂方要找临时工不是件难事；而临时工绝大多数是远离家门的农家子弟，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因》（1871年）中指出的那样：“劳动以稀为贵，以多为贱。”在众多对手激烈竞争之下，要找一份工做并不容易。

在宝安县西乡某五金厂的打工妹杨均红，1992年9月4日进厂，12月30日忽然收到家里的电报叫她“接电后速回”。外出谋生，最怕的就是家里有意外，这电报能不让人心焦吗？杨均红拿着电报去请假，万般哀求，厂里就是不批，哭也没用。只好提出辞工，老板把她的辞工书及厂证撕碎，将扣压的身份证扔到她脚下，狠狠地对她说：“你要滚就滚，反正一分钱工资你也别作梦想要，从今天起，不准你踏入厂门半步。”

打工妹到特区寻得的梦是如此的苦涩！

有文件规定，辞工要提前一个月呈报，否则要倒扣一个月工资，这点，老板懂，打工仔打工妹却不懂。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吃不好睡不香那滋味好受吗？不好受也得受！老板屋檐下难道会有温情流淌吗？

崔松终于决定辞工了。

她疲惫的双眼怎么也控制不了那委屈的泪水，硬是忍着不哭出声来。她在这家玩具厂干了一年半，每天工作

14 小时以上,老是觉得不够睡。以前只在书本上看过,听人家说过,当工人连上厕所也得算时间,现在总算亲身体验到了。厂里规定,工人上班时上厕所不能超过 10 分钟,超了就扣掉 30 元全勤奖,超过 15 分钟还要另扣 2 元。可是厕所又不在车间里,要走 2、3 分钟的路。此外,甚至打开水上厕所都要领有“离位证”,证少人多,上厕所也得发证!怪事。最怕的是来“例假”的日子,上班憋着不敢上厕所,晚上睡觉也不敢去那离宿舍很远的厕所,只好把那红红的纸巾趁没人留意时象小偷一样扔到墙角——连自己看着都脸红。有什么办法,想多睡一会儿呀!别的姐妹能忍,可她觉得受不了,于是正式通知厂里“我不干了”。

厂方扣下她一个月的工资——260 元,对她说:“你可以走了。”

“凭什么?”她想不通,和厂长也讲不通,只好去找工厂的主管部门投诉。结果,各打五十大板,她只拿到半个月的工钱:130 元。姐妹们说:是这样的啰,谁叫你炒老板的鱿鱼?

跟莲塘工业区某塑胶厂打工的刘永梦比起来,崔松竟还算幸运!刘永梦被厂方开除了,并扣掉她在该厂的两个半月的工资。她这两个月算是对老板一次彻底的奉献了——没有动员,远非自愿,一种专政式的奉献!她眼泪汪汪,实在丢不得这份工啊!家里的弟妹还在满怀希望地等她寄钱回家报名上学呢。都怪自己没骨气,再坚持挺下去不就好了吗?

事情是这样的:一连两天加班赶货,第一天干到凌晨

1时,第二天一直干到凌晨3时,还没有人通知何时下班,也没有夜餐,永梦饿得实在挺不住了,便跑回宿舍吃了两口饼干,和衣躺在床上悠然入梦了。第三天早上,主管把他叫去宣布:你不遵守厂规,擅离岗位,被开除了。永梦胆子小,也不知去哪投诉,只有卷起铺盖走了。象这样的例子生活中举不胜举。尽管深圳街头粤菜馆里都有炒鱿鱼这道味道鲜美的菜,可生活中的炒鱿鱼却并不是人人都吃得眉开眼笑的!

2. 押金的妙用与身份证件的异化

在深圳的一些企业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进厂的新工人要先交押金,“未做工先收钱”,在临工中很少有例外的。这一规定既非“技术”引进,也非上级精神,更无法律依据,可至今照收不误。押金从80元到几百元不等,这些钱不入账,还与不还,什么情况下还,了无下文。明知不合理,打工仔还是要交,为了得到那份工作呗——你不干,别人就来干,劳动力供过于求,有什么办法?厂长也有他的理由:收押金是为了防止你学会技术就溜了,难道我这么一家工厂就缺你那点钱?唉,一个要“绑”人,一个愿被“绑”,奈何?

深圳外贸(集团)下属某厂规定:凡进厂临时工先收取劳动保证金1000元,3年后归还,若临时工违反厂规厂法,被除名的,其保证金没收。深圳某轻纺电子有限公

司招收了 30 个临时工，每人收押金 300 元，但两个月不安排工作，每月只发 20 元生活费。

在特区内做临工，得办理暂住证。向临时工多收办证费的厂家也不鲜见。南山区麻雀岭某服装厂帮办此证时，从临时工工资中扣了 150 元，说待到工作 9 个月后才把这笔钱还给他们。深圳华泰企业公司下属某电子来料加工厂更是高价收取费用，办理 500 人的暂住证，有 200 人按每人 103 元收费，另外 300 人按 107 元收费，共收取了 52700 元。好大的一笔收入！可是，临时工出钱办了证，许多厂家却往往扣住证件不发给他们。

与押金的妙用比起来，身份证件的异化更是使人啼笑皆非。外来打工仔、打工妹找到用工单位，都要验身份证件和文凭。在某些心术不正的老板看来，身份证件是“绑”人的最好绳索。一进厂就用种种的理由或借口将身份证件收缴上去，要办暂住证啦，要办理用工手续啦，然后你就不要指望你的身份证件能如期回到你的手中了。你很能干想跳槽吗？你不满老板拖欠工资或劳动条件太差吗？身份证件攥在老板手里，你就走不了。一位青年女临工给有关部门的信中写道：“春节回家要回身份证件时，还要交一笔钱作抵押。他比你更清楚身份证件对你的重要性。有一些经济头脑异常发达的老板，竟拿着上百张打工妹的身份证件去参加新股上市的抽签，总会抽到那么几张的，就该他发，谁叫他是老板呢？”

即使这样，许多临时工还庆幸自己有一份工可做。因为他们认了——这是自己选择的，作为换取做工的一种

代价。然而,这却意味着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1991年8月的一天,深圳市红荔邮局里,十几个打工妹围着一个男人求情,求他不要把她们的身份证件、边防证寄走。值班员黄燕波问明情况后觉得这家厂的老板侵犯了临工的权益,派人到派出所报了案。

据了解,这帮打工妹是从四川招来的。进厂一个多月,工厂便倒闭了,有几十个人领了50%的工资走了,而她们不是熟练工,学徒期间没有给厂里创造任何效益,香港老板便不想给她们发工资,和她们闹起来了,便叫门卫把她们的身份证件寄回四川,把她们赶出宿舍。

老板被“请”到了派出所。当民警指出这种做法已侵犯了她们的人身权益时,老板见派出所为这些妹仔出头,只好认错。

看来有法不依,而是一些小老板根本不知道,不懂得依或不想依。其实,在接受他们在特区办厂之前,就该让他们先学习特区的“劳动法”,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这样可以减少许多老板侵犯工人合法权益的做法。

经过民警的调解,老板最后答应回去发她们基本工资,并当场把身份证件还给她们。这十几个打工妹,个个面黄肌瘦,双目无神,有些人还穿着拖鞋,对派出所的民警千恩万谢,那场面令人觉得心酸。

一位读过政治经济学的打工仔把企业侵吞工人的工资、扣押身份证件列作为一个公式:管理奇严——工人无法忍受——辞职——扣款。这位打工仔说:“老板要的不只是剩余价值,在有空子可钻的时候,连整个劳动价值都想弄

去!”更多的打工仔、打工妹只有象上文提到的刘永梦那样，自认倒霉。

3.“罐装沙丁鱼”与“胜利大逃亡”

对于临时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制定了许多条例规定。然而，某些企业却自行其是。

订立不合法不合理的厂规厂法克扣临时工工资。宝安县某家具有限公司(合资企业)要临时工签订的“工作志愿书”中规定：“若试用期满后离职，必须在 15 天前书面通知厂方，否则扣除当月工资。厂方若对员工之表现有不满者，可以随时解雇，员工不得要求任何补偿。”西丽大厦一个临时工，去年春节探亲后没有及时赶回，单位扣掉她 300 元工资，说厂规定试行办法中有旷工一天扣全月工资的规定。深圳某塑胶电子有限公司的厂规中有这样一条：“凡是请事假 4 小时以上，请病假 8 小时以上的，从超产奖或奖金中倒扣 200%”。看病，临时工是不允许有事，不许生病的！

然而，临时工的生活环境又怎样呢？

每天下班后，黄贝岭一家来料加工厂的临时工们争先恐后要洗澡。原来，这家有 1000 多个临时工的工厂。洗澡房就是一条水管上安置有 10 多个水龙头，下面用木板分隔成 10 多个洗澡间，要有多少时间洗澡的临时工才轮得遍呢？有个女临工为了洗上澡，竟从傍晚等到深夜 1 点多。这家工厂一年 365 天，天天冲冷水，女工月经期间，即使是冬天也不例外，不少女工因此而患病。在这家工厂对

面另一家电子厂老板还算有良心，每月发给女工一张可使用 5 天的热水票。

我在深圳广播电台主持“安子的天空”节目时，收到很多打工兄弟姐妹的投诉信：

——一群沙湾龙宝公司某电子厂的打工者联名投诉：该厂把沙湾河的水直接抽上水池给工人用。那些又黄又臭的水，要他们洗澡、漱牙。在宿舍里连干净的冷水都不提供。伙食则差到无法形容：每天两餐饭，每餐原来 1 块钱，实际上价值才 5 角钱左右。一勺饭，除了几块肥肉，一点青菜外，没有其它。有些人饿得头昏眼花，反映到厨房负责人处，对方说：“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倒到厕所里去。”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工厂没有早餐，在外又吃不起。厂门口的店子里 1 袋面包 1 元钱，钱从身上掏出来还带有体温，为省下 1 元钱，他们有时情愿饿肚子！

——宝安县仅松岗铿仕厂一位署名叫小舟的打工者来信反映，该厂工人每天要连续上班 8 个小时外加 9 小时（除 10 月下旬到 11 月中旬少点外），在 6、7 月份期间，试过连续上两三天通宵班，两天没有睡过觉，更尝过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一整天），连一零丁点的汽水面包也没入肚，仍被逼加班赶货的滋味。当时许多地方都缺水，周围的厂家纷纷派人外出挑水，而这家厂却无动于衷。到傍晚，工人又饥又渴，个个停手静坐。当时正赶货，货车在外面等着装运，工人的反抗惹来的是漫骂与旷工计。此举激怒工人，大家相继罢工，而厂方除不给饭吃，连宿舍门也全部封死。另外，工人因劳累成疾乃致昏倒或生病住院，

厂方从不给报医药费，无论什么原因没来得及请假，按“迟到 1 分钟扣 2 元钱，1 天便要扣掉 108 元。小舟信中说：“我们是外来工，老板不把我们当人看，在特区这块土地上，公理何在？”

——石岩镇某厂发生了一件工人半夜集体跳墙事件。

这家工厂从事玩具服装生产。工人工资低，每天干十几小时，大概只有 2 元人民币，伙食费每天 1 元，一个月能有多少钱呢？很多工人干了一、两天便不声不响地走了。老板想了一个“绝招”，把工厂用铁丝网围起来，大门用铁锁锁住，工人住厂房上面，即使下班时间，也不准工人出去，怕工人一跑出去就不回来了。老板为了省钱，饭堂不请一个厨师，每天叫工人放下手中的活轮流去做，工人个个敢怒不敢言，最后发生集体跳墙，集体“胜利大逃亡”的事件。

八卦岭有家服装加工厂， $2/3$ 的面积用作车间， $1/3$ 面积给临时工食住，每天一班时间都在 12 小时以上。他们就象沙丁鱼一样，被一条条装进罐头里，几十个临工住在一起，走路要侧着身子行。正值青春期的他们，抵抗力差的便染上了各种皮肤病。这家厂的许多临时工，半个月没有下楼来。有一个临时工，竟然一个月没有下过一次楼。

再看，“每日工作不得少于 12 小时”，这样的条款竟出现在一家服装加工厂的劳动合同书上。另一家来料加工厂的车间墙壁上则书写这样一条标语：加班时间每月

不够 60 小时,不能领取全勤奖。有个企业“更上一层楼”:不加班者以旷工论处,3 次旷工者“炒鱿鱼”。

市劳动局监察大队成立后一年间,调查了 380 家企业,调查结果表明:违反劳动法规,超时加班加点现象普遍存在。

那么,这些超时的加班加点工资又该怎样算给临时工呢?不按法定标准少计加班工资,这是临工们常吃的亏。请看在八卦岭某服装厂:1990 年 11 月 20 日夜,市劳动监察大队根据该厂临时工们的反映,来到这家厂。临工们已从傍晚 6 点半开始加班,至深夜 12 点。问到加班费时,该厂的负责人回答说:“每小时 5 毛钱。”这样的加班费,不要说远远低于政府规定的标准,就连正常班的工资标准也达不到。

许多临时工责问企业为什么不按照劳动法规办事,有些老板则回答:“我这里就是这样,你不干可以,即刻走,来去自由。”

老板的话是容易说的,可临时工交的押金呢?没有领取的工资呢?加班费呢?……

4. “无形杀手”在游荡

从一些临时工的反映和一些调查的情况来看,许多乡镇企业,特别是基建行业的工作环境和安全设施存在的问题相当突出。

一个青年女临时工在一家电子厂工作不到 1 年,正常人说话声音低一点她就听不到,她自己说话的嗓门就

象在骂街。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她在高频噪声中工作造成的。一个做了几年电子元件插件工的临时工，那高速度的流水线作业，使他睡觉时，手脚不时神经质的抖动。

18岁的何拥军1992年春节后随“民工潮”从外地进入宝安县公明镇，只需填写一下姓名和年龄，他就进入了一家塑胶厂开“啤机”（一种塑料压模机），两天前他对这种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机器还一无所知，第三天他的左手掌便被这机器扎成肉饼，留下终生残疾。我在宝安县人民医院住院部的走廊病床上见到这位满脸稚气的高中肄业生，他正埋头阅读一本小说，问他对已失去左手，有什么感想时，他只是茫然摇头：“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象何拥军这样的伤残者在宝安县人民医院已不鲜见。据外科三区负责人介绍，该病区是脑、胸、手、泌尿外科病区，定编床位32—36个，但长期收住院病人50多人。3月28日住院病人49人，其中工伤事故病人占了19人。病房住不下，只好安排在走廊病床就医。我们在外科三区走廊上的14张病床上就发现有10张床是因工伤事故而住院的。黄义，男，19岁，2月18日进了县城某玩具厂，3月13日晚上9时顶替他人开“啤机”，次日早上6时受伤，左手掌被扎烂；李×，男，19岁。公明镇某工艺厂临工，因载报机失灵，将他左手4个手指齐齐裁断……外科三区负责人说，今年1—3月份就有35人因工伤事故入院就医。

环视四周，满目伤残，令人忧虑。我在医院了解到的仅仅只是一批由于开“啤机”，开冲床剪床等造成的手外

伤事故，而历年来事故发生率甚高的建筑、采石、电梯、锅炉等特种行业的伤亡事故同样令人担忧。据原宝安县劳动局统计，1991年全县发生工伤残亡事故535宗，伤亡548人，其中死亡事故48宗51人，比1990年上升30%多。至于那些隐瞒不报，私下了结，没有进入统计数字的工伤事故有多少就难于估计了。据县劳动部门的统计，1991年在所受理的3392宗投诉中，工伤问题占了764宗，平均每天2宗多，投诉数量之多仅次于劳资纠纷问题。可见，工伤事故频繁已是“三来一补”企业的一大顽症。

忽视对工人的技术培训，造成的工伤事故不断发生，有些工厂对发生的工伤事故并不做妥善处理。坪山镇惠德隆厂对新工人不作任何技术培训就安排上岗操作，致使工伤事故不断发生。1990年1月至7月，该厂就发生4宗工伤事故。有两个工人刚入厂就上岗，结果先后分别被机器切掉了3个手指头。南头一工厂一工人在正常操作过程中眼睛被突然喷出的高温塑料泥浆弄瞎了。厂里声称只先垫款让工人就医，所用款项以后将如数归还。

在宝安县横岗镇一家制品厂打工的18岁女孩阿芳，有一次要赶制一批日本货，生产主管考虑到她是老工人，工作比较认真，于是就把她从包装部抽调出来，负责操作一台冲床。虽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她毕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接受安全操作教育，就这样，一个所谓18岁的老工人因要赶货就匆匆的临岗上阵了。后来她的手指怎么被冲床压断的，她自己也搞不清楚。

阿芳这小女孩家里穷，16岁出来打工就没有回过家，原因是想节省来回的路费好给家里多寄点钱。出事后，她一句话也没说过只是哭，也许她除了用哭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恨之外（厂老板只负责她住院期间的医药费），她又能怎么样？她能向当地政府控告这家企业管理的不完善吗？她能向老板提出因工致残以后的各种赔偿吗？她毕竟才18岁！老实巴交的农民父母千里迢迢从老家赶来，他们又能为女儿做些什么呢？他们能向有关部门讨回这个公道吗？他们不能，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只有默默地流着泪把女儿带走……

一位名叫“路不平”的打工仔给有关部门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平湖有家丝花厂，该厂有名四川女工死在韶关火车站。从信中隐约看出该厂好象有一种有毒的气体在侵害工人的身体。来信人还说，如果有关部门肯为临工解决问题，为临工说话，就该下去平湖看一看。

经调查，证明信中提到的四川女工是病死的，并了解到该厂老工人经常不是得这种病就得那种病，有人则长期低烧，有不少人因为感冒，引起一种怪病，因治疗不方便，都请假回家了。而厂领导却一再声明，厂里决不会有有毒气体存在。而当调查组的人一进入车间，一股塑胶味刺得人难以睁眼，鼻子直发酸，机器声震耳欲聋，噪音干扰得人心情烦躁，空气闷热，没有排气设备，有口罩个个都没带，工人们都说大热天带上会闷死人。

工人工作实行二班制。去宿舍，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写家信。走廊里种种霉味扑鼻而来，什么杂物都有，厕所

从来没有人打扫，苍蝇到处飞，老鼠满地跑，垃圾堆在房间门口不知放了多久，发出种种臭味。

前不久，南山区劳动局的同志到昌盛印花厂去，车间里的严重空气污染，使得正常人不到 10 分钟就支持不住。这家厂受过多次警告不改，临工们的身体受到多大的损害呀！最后，这厂被作封厂停产的处理。

一些厂家工作环境恶劣，安全生产设备不完全，使伤残事故频频发生。

许多临工工伤，甚至致残后，医药费和赔偿费都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有的还遭到解雇，就业无门。

有的厂方忽视工人合法权益，逃避承担应尽的劳动保护义务。不少企业与工人签订的合同中劳保福利一项内容空白，还有的根本不与工人签订合同。企业不仅没有提供必要的劳动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而且工人长期超时工作，为数不少的工厂每天实际实行的是 8 小时工作制和 4 小时加班制。不少工人几个月也得不到正当的休息时间，长期处于疲劳状态，这些是工伤事故频频发生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行政监督和法律制裁也是安全生产管理的一大漏洞。有的乡镇对劳动保护不重视，对忽视安全生产的企业甚至加以袒护。而劳动管理部门人手不足，应付众多的劳资纠纷都忙不过来，根本无法进行经常性检查监督，加之没有一种权威性的劳动法规约束企业，低额的经济罚款和工伤赔偿对厂方没有构成有效的约束力，因此有关劳动条例、法规难以落实贯彻。上述各个环节，均在不同程度上对临时工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构成威胁。

深圳某公司在 1990 年 8 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临工们通宵加班的次日中午，有个女临工因劳累过度晕倒在食堂，头破血流，送到医院住了 10 多天，花去医药费 2882 元，但这家公司只同意报销其中 1000 元，一个老板这样说：“她不是在工作时间受伤的。”最后，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这家公司才不得不报销了全部医药费。

得到这样的结局，那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有相当部分的临时工还没有这种结局呢！请读一读一伤残临时工的信吧：

“我是 19835 月到观澜镇一家‘三来一补’厂做临时工的，当时我只有 17 岁。一天晚上，我被胶花啤机压碎了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送去医院住了 50 天。1986 年 3 月至 1987 年 10 月，我多次前往广东省人民医院、上海假肢厂做手术，费用是自己出的。

“我曾多次找到那家厂要求报销我的医药费和伤残赔偿费，但他们以我已经不在他们厂做工为由不肯报销，赔偿只肯一次性赔 800 元人民币。这个钱远远不够我用去的医疗费。我没有同意，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试问，假如伤残的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的感受又如何呢？

“现在我已得到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关心，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希望有关部门，更希望社会都来关心临时工中这类问题。”

5. 半夜惊梦几时休

“开门!开门!查户口啦!”“他妈的,怎么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在里面……”喊声过后,屋里一阵慌乱,女工忙着穿衣服。有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居然一脚踢开女工宿舍的门,冲进去撩开蚊帐看个究竟……

这是一位女工描述的场景。一些企业经常派保安查铺,有时打工妹已经入睡,突然灯光大亮,男保安破门而入,拉蚊帐掀被窝,将根本来不及穿戴的打工妹羞得无地自容。甚至一些企业在宿舍统一关灯后,发现有打工妹仍在讲话,就将其揪出罚站。还有的厂家更规定了吃饭时间不得超过 10 分钟,洗澡时间不得超过 15 分钟,加班每周不得少于 18 小时等等,不一而足,无非都是为了使工人能更好更多地干活,并夹带一些省电省水节省开支的考虑。而这种种侵权行为还被冠以“军管”的名义,在“增强职工的集体意识”的旗号下一幕幕上演。如此不尊重临时工的人格,不能说是普遍现象,但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对他们动不动就吆喝,骂爹骂娘是常事,哪个不识趣的,顶几句,则施以拳脚也不为过。对此他们只能忍声吞气,因为来找他们麻烦的人都不是好惹的,搞得不好,让抓住把柄,扣证件、罚款、或关起来,就更不好受。临时工中确实良莠不齐,手续不完备的大有人在。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是必须的,应该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格。

有些企业里的保安员如此肆无忌惮,俨然成为打工仔中的“贵族”,而那些“总管”、“代管”、“主管”之类的人,

却比“老板”还“老板”。

布吉工业区某手袋厂百多个工人中,有5个荣升为“代管”。同伴们为他们得到重用而高兴,看来老板没有小看我们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以后可以指望“代管”为自己人说话了。也有人担心:我们大多数是女工,为何偏偏选了个男的当“代管”?

时间一长,女工们慢慢发现那几个每月领老板2000元港币的“代管”比老板还狠:看着谁不顺眼就骂,就打,经常以少算工件来克扣工人工资,对于敢于反抗的人进行精神折磨。更可恶的是,他们还对女工要流氓,几个姿色好的姑娘差点被他们逼上了床!那几个姑娘不堪其辱,又要顾全自家脸面,或默默离去,或匆忙跳槽,或忍声吞气……1992年6月,手袋厂的女工终于集体投诉,发出了愤怒的呼喊:“老板雇‘代管’虐待工人,我们不堪凌辱!”有关部门接到投诉,极为重视,把那些违法“代管”绳之以法。

据调查,几乎每个“三来一补”企业都雇有“总管”、“主管”、“代管”,这“三管人员”又大都是老板的亲朋老友,他们对老板讲义气,对工人凭意气。他们中有些人不懂法律,也无视法律!他们虽然不是厂长经理,却管得宽,也相当有权。叫你别上班,你就被“炒”了;要罚你多少,扣你多少,也就一锤定音。因此,他们成了与工人冲突的直接对象。在深圳市某区劳动仲裁部门所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例中,有60%是这些“三管”人员给“管”出来的。

在深圳龙岗镇某电子厂,就曾发生了一起“痛打总

管”事件：该厂有 11 名来自井岗山的妹子，她们没命地干，总管却诸多刁难，总想多扣她们几个钱。这次“出粮”（发工资），她们又领教了总管的厉害。忍无可忍的井岗山妹子团结一致，据理力争，誓要拿回被无理扣除的工资。总管自然不把她们放在眼里，口口声声要“炒”掉她们，争执之间，不免有些“动手动脚”，总管自恃有人撑腰，没想一交手，工人都袖手旁观，没人同情总管，眼看着总管被井岗山妹子痛打一顿。最后，连工厂的铁门也被推倒。“哼，他也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井岗妹子如是说。

不少劳动仲裁干部指出：由于这些企业管理上的弊端，劳动争议往往表现为群体性的，再加上工人一方往往都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矛盾容易激化，处理不当不但会给企业，也会给社会造成危害。

对于一些企业打工“贵族”滋生出来的事端，在特区已日益引起大家的关注。

1990 年 6 月，由日本投资者与深圳某公司合资办的一家电子公司，因职工对工资低、生活福利差，加上老板让中方总管答应从 4 月份开始增加工资，直至 6 月份还没有兑现，导致 2500 名工人停产罢工。

市总工会接获信息后，即组成调查组前往该厂调查。由于该厂没有成立工会，调查组到厂后，双方都表示不信任，主持工作的日方董事，担心市总工会到来，会支持工人闹事，使事态发展得不可收拾，他与中方总管强调只有把带头闹事的工人开除出厂，别无其他办法处理；工人则指工会是“消防队”，只会替厂方“灭火”，维护不了工人的

合法权益。由于工会的秉公处理，工人很快消除了疑虑，老板看到工会能稳住大局，也就从怀疑变成信任。在处理的过程中，总工会一方面广泛听取工人的意见，对他们的合理要求表示支持；一方面同日方明确表示，既尊重投资者的利益，又更要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生产恢复了，老板也接纳了工会代表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1)员工的工资在原基数上增加 110%；(2)新进厂工人由原基础工资加生活补贴约 150 元提高到 180 元；(3)改善职工福利，腾出一间大房间作职工文娱场所，拨款 5 万元购置音响等设备，以活跃职工文娱生活。扩建职工宿舍 4 栋，以改善居住条件；(4)在女工宿舍楼装太阳能热水器，解决 2000 多名女工无热水洗澡的困难。

这次劳资纠纷的圆满解决，不但使工人们感受到深圳工会的力量，老板也体会到工会在调解劳资矛盾上所起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该厂日方经理专程来到市总工会，激动地说：“我们厂出了点事，你们很快赶到现场，为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十分感激。”他们还正式向总工会递交了要求在厂成立工会的申请报告。

中方总管通过这件事的教育，也改变了对工人们的看法，积极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不久，他在众打工兄弟姐妹的支持下，当上了该厂的工会主席。

6. 老板姓“赖”，工人姓“欠”

临时工每天 8—16 小时的紧张劳动，工资只有 300

元左右。有的企业,为了赶货而不顾临工的死活,连续几天加班,工人叫苦连天。蛇口丝绸某公司的全体女工为此提出抗议。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企业有意无意地拖欠临工的工资,不计算加班费,没有星期天,一年只给春节的几天假;而且有些老板滥招和开除临工,压低临工的工钱,甚至对临工的工伤不予赔偿。如福田区某电子厂,去年连续拖欠临工工资两次达几个月之久。《广东省经济特区劳动条例》明文规定:“用人单位每月至少发放一次工资,并应规定和严格执行发放工资的日期。超规定日期的,从第六天起每日按拖欠工资数额的 1% 赔偿职工损失。”但目前仍有一部分企业经常性地拖欠职工工资,也没有作任何赔偿。宝安县平湖镇一工厂拖欠 1989 年 6 月至 12 月工人工资有 120 人次共 4800 元,拖欠 1990 年 1 月至 8 月的工人工资有 80 人次共 24000 元。南头一工厂本规定每月 13 日发放工资,但实际上都是 20 日以后才发,工人都敢怒不敢言。

行内人士在谈到某些“三来一补”企业的劳资矛盾的根源时说,由于这些企业大多数是小额投资的(约占 70%),又大多是“二三手老板”,因此“微利少算”是一大特点。一个手袋厂,原加工一打手袋给 0.25 元,已属偏低,当工人加班加点拼命地干,月工资超过标准工资时,老板反以为单价定高了,便逐月将单价递减到 0.085 元……这样,产生纠纷与争议也就难免了。

深圳市曾经发文对临时工的基本工资待遇作了明确规定,但有些企业却不顾工人利益,想方设法压低工人的

工资。如 1989 年原宝安县劳动局颁布了《关于我县“三来一补”企业临工工资行规定》明文规定临工每月工资不低于 200 元，加班工资每小时不低于 1 元。龙岗某电子厂新工人试用期为 3 个月，试用期的工资为每天 5 元，试用期满后，每天工资为 5.5 元。半年以后，每天工资为 6 元，加班工资按这个基本工资的 10% 计算，即每小时加班仅为 0.5—0.6 元。平湖某蜡盐制品厂，1990 年 5 月份包装部 34 名工人（按件计酬），工作 30 天以上（含加班时间）26 人，工作 27—29 天的有 8 人，月工资在 200 至 240 元之间的仅有 5 人，月工资 119.73 元至 199.63 元的达 29 人。

一个自称是管理人才的外省人，打通了多方面的关节后，承包了某区的一家服装厂。他招了 50 多名工人，工厂开工了。没几个月，生意做大了，他以“流动资金不足”为由，动员工人“发扬当家作主精神”，暂不拿工资，等工厂渡过难关再加倍奖励大家。工人信以为真，加班加点。没想到半年后的一天，这位厂长人随货去，杳如黄鹤，全厂工人 2 万多元工资成了无头债。工人们真是欲哭无泪。还有一家酒楼，被几个港商承包经营，雇工 100 多人，港商不久弃楼而去，欠下工人工资 10 万元。

据统计，宝安县 1990 年 1—10 月，就因克扣拖欠工资发生大规模劳资纠纷近 40 起，小规模劳资纠纷更多。1992 年 7 月 10 日，《深圳商报》报道华大尊荣服装厂被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勒令整改，就是由于该厂拖欠工资，克扣证件，无限制加班加点和生活条件恶劣引起。

张老板在市内黄金地段有一家酒楼。别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这儿是铁打的酒楼流水的打工妹。他每月都在酒楼面前的电线杆上贴上一张“招聘启事”，象姜太公一样悠然自得地等待上钩的鱼儿。除了几位亲属和已被他骗取贞操的打工妹之外，谁也不能在这儿干上3个月。他深知自己酒楼的地理优势，面对络绎不绝来应聘的打工妹，他笑嘻嘻地每人收取10元报名费，然后有选择地录用一些，达成这样的协议：“试用期间（3个月），包吃包住外每月另发工资80元，如试工通过，每月工资加到500元。”看上去这协议合情合理，颇具诱惑，其实不管你多么努力，也别想在这试工通过。洗碟子、端盘子、铺桌布、开吸尘器这些玩意都不是什么高新技术活儿，在试工期间他也无需担心你不认真、不尽力。这样一来，张老板可谓巧妙地获取了最廉价的劳动力。

1991年7月，八卦岭一家皮鞋厂一下子开除了100多名工人，理由是不遵守厂规。其实际原因是厂部突然对车面部车间的工人减去10%的工价，本来工资就不高，再往下减，工人一时受不了。刚开始有大部分的员工向厂方提出抗议，可一连几天都没有人关注和答复，因此全体车面部员工在宿舍里不去上班，过后老板发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叫人去通知：“如下午再不去上班者，一律按自动辞职处理，并在3天内搬出宿舍。”

工人们说：“恢复原来的工价，否则不要叫我们去上班。”

3天以后仍没有人去上班，人事部便贴出车面部全

体员工被开除的通知，并且当月工资被扣下！经有关部门出面调解，老板才收回勒令，照以往的工价计算工钱给工人。

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外商独资企业制定的厂规厂纪不合理，对工人的要求很苛刻，对工人缺乏思想教育和劳动纪律、法纪教育，动不动就罚款，以罚代教的现象较为普遍。南头添利厂规定，上班时间工人如讲话每人罚款 5 元。有一次，连续工作了 12 小时的工人已经完成了当日的工作任务，因为提前 10 分钟出来排队打卡，被管理人员发现，结果有 18 位临时工每人被罚款 50 元港币。许多工人因为怕被解雇而违心地接受罚款。宝安平湖镇一企业 1990 年 4 月份全厂 227 人受罚款 74 人，5 月份全厂 260 人受罚款 72 人，6 月份全厂 215 人，受罚款 124 人，最高罚款 78 元。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于是，工人扣押老板、打老板、集体上访的事情时有发生。诚然，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索回自己的劳动所得。可是有些工人却因此干出了违法事情。有一家工厂，因老板拖欠工资好几天了，几个打工仔气愤不过，跑到公路上去等老板。一辆颇有气派的小卧车开来了，小伙子们拥了上去，老板慌了，连斥带吓，反而惹起众人的火气，老板挨了一顿揍。打工仔出了气，却没捞到好处——老板反到公安局告了他们一状。那些小伙子们本是有理的，现在却成了违法之人。

这些打工仔不懂得借助法律，不懂得向劳动管理部门要求仲裁。也许他们想：自己无权无势，上诉也是白搭，

劳动部门还不是向着企业老板?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在劳动仲裁中,到底谁是赢家?

7. 谁是赢家

“只要工人投诉,赢的可能性就有 90%。”这是一位劳动仲裁干部的戏言,他所在单位历年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中,工人一方的胜诉率达 90% 以上!这样高的胜诉率,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事实并不是象某些打工仔所说的“企业大晒,老板大晒”(大晒,广东话高于一切之意),而是法律大晒,劳动法规大晒!

有个叫李标的打工仔,为了要回被企业无理扣下的 117 元工资,打了 6 个月的“官司”往返市区 30 多次。在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帮助下,他终于拿到自己应得的这 117 元。可是,除去他所花的车费,已是所剩无几了。有人笑他“得不偿失”,他说:“我认为值得,花钱买个公道。”说得多好!

1991 年夏的一天,市总工会接待室来了两名投诉者——一位姑娘带着她那年过半百的父亲。姑娘声泪俱下的泣诉,引起在场人员的同情。

她名叫小燕,今年才 19 岁,来自湖南省常德市农村,两年前经人介绍到深圳一家来料加工厂当临时工,去年 10 月 6 日因清洗机器发生意外,右手食指被扎去一节,中指被切断两节,经抢救治疗,伤势虽然得以控制,但断了的手指暂时不能再植。厂里给小燕调换了几次工种,她都是无法适应。今年 1 月,厂方以“表现欠佳,又欠合作,

警告无效”为由将其辞退。临走前，小燕要求厂方负责接好断指或赔偿经济损失。老板又以“进厂时间不长，贡献不多”为理由，拒不赔偿。小燕含着泪回到农村。少了几节手指的她，连洗衣服也困难，粗重的农活怎么干啊！乡亲们都为她抱不平，叫她起诉老板。春节后，小燕先后给厂里写了几封要求赔偿的信，老板虽然给她回了信，但却不肯答应她的要求。小燕又向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妇联、深圳市总工会、深圳市劳动局写了控诉信。最后，在老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了深圳市总工会。

总工会领导对这宗投诉十分重视，认为是一起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他们先派人与有关单位联系，责成该厂先将前来投诉的父女俩安置下来，然后指示权益部，组织一个工作组深入下去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负责调查这件案的李钦文部长，带着调查组，一边深入有关工人中座谈，弄清事情的真相，一边查阅有关政策法规，包括查阅香港的有关法规。经过认真调查分析，确定小燕是因公受伤右手残废。按我国法规，因公受伤致残者，应由所在单位负责照顾工作及负担生活费。按香港的法规，工伤事故，雇主也应向劳工赔偿损失。调查组还特别咨询了有关医院做断指再植手术的价格，又从特区目前生活水平等几方面的综合考虑，研究了一个应由厂方给予小燕赔偿万元左右经济损失的方案。在交涉过程中，起初港方老板不同意，一会儿说大陆没有这条法规；一会儿提出由小燕填写劳动保险卡，由他们到香港保险公司去申请，保险公司赔多少，他们全数给小燕；一会儿又从香港请来

律师，准备与工会对簿公堂。调查组的同志义正词严地指出：“在我们国土上办企业，就得按我国法规办事，我国法律规定工人的合法权益是不容侵犯的。如果要打官司，工会奉陪到底！”调查组的同志还到劳动部门、法律部门、仲裁部门咨询，在正义和真理面前，老板不得不服输了，终于基本同意调查组的提议，由厂方一次性赔偿给小燕工伤费 8500 港元，赔偿后处理费 780 元人民币。

对于工伤，《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暂行规定》里明确指出：无论是固定工、临时工或轮换工均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凡临工因工负伤厂方必须立即送到附近医院抢救，首次治疗费 5000 元以下的由市社会保险机构支付，超过 5000 元由保险机构和厂家各支付一部分。支付比例均有详细分配。其次，临工因工负伤医疗期工资，由原厂家按本人负伤前一个月正常出勤实发工资总额支付。另外，临工因工负伤医疗终结后，根据残废部位及程度分别有明确的规定享受待遇标准。

目前临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表现是十分严重的，必须引起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究其原因，不外有三：首先，临工管理法规不够健全，执法和监督工作不够严格。虽然特区已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劳动条例》、《临时工劳动手册》等一系列法规，但劳动管理和劳动制度本身存在不少漏洞，工伤保险和用工监督等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因而容易被钻空子。有的企业利用公安与劳动部门在协调上的薄弱环节，私招滥雇外省临工，不办暂住证，不签劳动合同，不搞劳动保险；有的还趁工、青、妇组织未建

立或不经常下厂监督之机,公然损害临工的合法权益。其次,有的企业老板盛气凌人,带着施舍的态度,声称“来深圳办厂只是为赚钱,不是办福利”,把临时工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多数管工是老板的亲属,同老板穿一条裤子,对临工变本加厉。不少中方人员素质低没有原则性,生怕得罪了“财神爷”,甚至为了讨好外商而不惜损害临工的利益。再次,临时工年纪轻,文化素质低,不懂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调查中,70%以上的临工为初中、小学毕业,年纪约20岁左右,80%来自农村,且不少来自外省。为了不被开除,他们忍辱负重,埋头干活,即使被打也不敢还手。竹子林有个姓刘的临工,被管工打后逃走,生怕报复,就连派出所为他索回的医药费,也没敢来领。许多临工不知道工会、妇联是干什么的,更不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

来自广西的打工仔阿清,听说劳动局有个专门处理劳动的部门,以为是专为企业说话的,便特意跑去看,读完了贴在墙上的宣传品,他放心了,觉得找到了“靠山”。他还知道了工厂要签合同,签了合同还要拿到劳动局鉴证,否则出了事就麻烦了。后来,有位工友和厂方发生了矛盾,他便帮助拿劳动争议申诉书,在委员会的干预下,工友的合理要求得以实现。阿清深有体会地说:“有仲裁委员会主持公道,我们老老实实干活,企业也实实在在地待我们,多好!”

当然,要求仲裁的也不净是工人,也有企业告工人的。如有些工人故意旷工,有些在接受培训后不辞而别等

等,都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

有竞争就要有规则,有冲突就要有裁判。自 1986 年我国恢复劳动仲裁制度以来,现已成立了多个仲裁委员会,结案多宗。通过仲裁人员的辛勤劳动,调整了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维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

8. 希望在人间

1990 年初,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在深圳一次局级干部会议上说:“今天我们都应该知道特区好,特区美,可我们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得来的吗?不要忘记还有 100 多万临时工,是他们给我们建设了这一切,而他们现在住的是什么?吃的又是什么?我们住在三室一厅的房间里,很难体会到他们的苦楚的!”一席话令举座动容。

是的,他们是主人。

在深圳的来料加工企业中,打工仔、打工妹占 98%,建筑行业占 72%,商业、服务、旅游业占 86%以上。百万打工仔的涌入,使特区形成了活跃的劳力市场,带来了人才、技术、信息的流动,为各类外向型工业招揽人才和选择劳力提供了便利。深圳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他们,他们给特区奉献了许多许多,在特区的海天之间也写满了自己渴望。

“外地临时工到深圳来,首先要让他们赚钱,其次要让他们学到文化、学到技术、学到特区文明。”李灏同志

1986 年关于临工问题的谈话，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的一贯政策。许多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也把提高打工仔的劳动素质，改善打工仔的生活条件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如赛格集团的打工仔普遍反映，在这里他们不受歧视，有正常的提升机会，各级领导都努力改善他们的住宿、吃饭条件，有稳定的工作时间，企业免费开办一些培训班让他们业余时间参加，病、事假能得到热情的关照……他们感到，“赛格是我们的家。”不少大型国营企业、大的中外合资企业做到了这一点。深圳中华自行车有限公司就是这类企业中的典型。在“中华”，临时工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中华’的主人！”

中华自行车有限公司由莱英达轻工(集团)公司、香港大环自行车有限公司及美国世稳自行车有限公司合资兴办，年产自行车 100 万辆，90% 外销。公司现有员工 1933 人，其中临时工 1454 人。临时工在工资、奖金、公费医疗、劳保福利、住房、劳动保险、评模、提升等方面与正式工享受同等待遇。总经理施展熊先生说：“我们公司没有临时工概念，进了中华的人，就是中华的员工。”公司的各个阶层(除决策层外)都活跃着临时工的身影。督导层中有班组长 90 名，临时工占 50%。1989 年公司评选十大劳动模范，就有两名临时工当选。喷漆车间班长、临时工曾显强 1984 年来厂工作，1986 年被提升为班长，1989 年被评为厂里十大劳模。公司把他妻子从农村调到公司安排了工作，并给了他一套新房。象曾显强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他们说：“我们最大的心愿是为公司多

作贡献。”

施展熊总经理强调：“企业的发展要依靠人，所以，人是我们公司的最大资产。不管什么设备，我们替换不可惜，而好的人员要替换，就是一种损失。”公司鼓励员工好学上进，并专门成立培训中心，聘请日本、美国、台湾的专家讲课，不仅使学员学到了文化、学到了技术，也更新了员工的观念，培养了员工对公司的感情。1990年，培训中心完成了8.2万人次的培训任务。

公司领导认为，如果公司不照顾员工，员工也不会热爱公司。他们千方百计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解决员工的困难。临时工正式签订合同后，每月平均收入都在700元以上。公司每年给员工加薪10%，年终有相当于两个月的奖金。“中华”是在全市最早实行员工（包括临时工）公积金制度的企业。根据员工的工资总额，员工和公司各拿出10%左右作为公积金为员工存起来，作为员工将来的退休养老金。员工们说：“公司不但关心我们的现在，也考虑到我们的将来。在这样的公司里工作，我们还有什么不安心呢？”

在“中华”，临时工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一切劳保福利外，每逢生日，工会还会送上生日卡，开庆祝会。工伤、生病有人探望。临时工肖家亮，工伤住院，公司领导管理人员多次去医院探望。施总经理因马上要出国，抽不出时间，还派人买了一个水果花篮送到医院，在花篮的彩带上亲笔写上：“肖家亮工友，祝你早日康复！”同病房其他病友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啊！”

施总经理说：“人家父母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有责任把他们引导到正道上去。”公司在厂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专门拨出 1300 平方米的一层楼，投资 70 多万元，办起了文康活动中心，有图书杂志阅览室、电视录像室、桌球台、卡拉OK 等娱乐设施，每个周末组织舞会，电影晚会等。公司还成立了足球队、乒乓球队，并定期组织文艺汇演和员工郊游活动，引导员工健康成长。

中华自行车有限公司创建 6 年来，自行车产量年均递增 109%，企业利润年递增 310%，创汇年递增 241%。如此好的经济效益，是公司尊重临时工、关心临时工、培养临时工的敬业乐业精神的回报。作为“中华”员工主体的临时工也在为企业创造财富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找到了归宿。难怪“中华”的员工流动率只有 1%。

百万临时工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深圳，参与特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从我们调查情况看，中航企业集团公司、赛格集团公司、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沙头角保税区富华实业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合资企业，在保护临时工的合法权益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商业、服务行业也可以。问题较多的主要是来料加工企业和乡镇、村办企业。如果深圳的企业都能象“中华”等企业那样，让临时工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人，那么，对实现特区发展的新目标，对深圳的社会治安，对提高临时工的整体素质将是十分有益的。

无疑，能够为打工仔提供“家”意识、归宿感的企业在深圳也是比比皆是的。为了克服某些企业中存在的侵

犯打工仔合法权益的现象，市劳动局监察大队、市总工会权益保护部、市团委青年权益保障部、市妇联法律顾问处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他们认为，市劳动局和司法机关应适当审查各企业的厂规；企业所在地派出所和居委会应经常检查企业员工的权益保障状况；应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爱护打工仔；要让打工仔学习了解有关法律知识以保护自我，这既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也是深圳企业深化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

他们告诉我：“只要打工仔向我们投诉，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只要打工仔的权益受侵犯的反映得到证实，企业一定会受到严厉惩处。”

是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打工”在特区及整个大陆沿海地区都是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打工”去，现在实际上是“工作去，”“劳动去”，“开拓去”！这一代打工青年来特区闯世界，创世界，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社会的保护与尊重！

深圳，160万打工仔、打工妹，在特区演绎了很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他们在特区的日子，经历着磨炼，忍受着烦恼、孤独甚至苦难。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为特区创造着财富。

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终将离去！为特区留下一份美丽。

160万人，流动的太阳方阵，流动的青春部落，他们憧憬着共和国的明天——

明天会更好！

• 后 记 •

深圳是一棵月亮树

1

生命里有些很贵重的东西，会在我们不经意时丢失。
如青春，如时间。

在这个日趋繁华、富丽的都市，我常常在反思。这一代打工青年，对深圳的选择，注定要影响他们的一生。

他们丢失了青春？

他们丢失了时间？

看着他们成群结队而来，三三两两而去，我好想说一声“珍重”。那种感觉就象慢慢咀嚼泡泡糖，开始时有点甜味，到头来有点苦味。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

1、20 年代的中国青年选择“走西口”，“闯关东”；

3、40 年代的中国青年选择“投奔延安”；

50 年代的中国青年选择“支边垦荒”；
6、70 年代的中国青年选择“上山下乡；”
8、90 年代的中国青年则选择“打工”——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内地走向沿海地区，从国内走向国外……
时至今日，有 160 万人选择了闯深圳。

160 万大军，如此年轻，如此青春，他们构成了这个都市的风景线，其打工经历构成了这座太阳新城的文化意蕴。

正是他们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奇迹，使深圳成为世界瞩目的梦想之地。

3

“感谢深圳塑造了我。”在一篇自白性文章 中我如是说。

我之所以能从一个平凡而普通的打工妹成长为“深圳青年十杰”、“深圳市文明市民”，是因为我身后有 160 万人。

偶尔粉墨登场，只有为打工同胞呼吁之心，绝无哗众取宠之意。

只想实实在在地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多做些实事。于是，有了《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有了《安子的天空——打工者情简》，有了《青春絮语——打工仔打工妹情简》。

而这第四本书《人性的超越——100 万临工扫描》，杀青之际，心中总有点惴惴不安……

深圳是一棵月亮树。

160万人，在树下聚聚散散，分离重逢。

要镂刻这一代人的打工实践和精神旅程，我显得力不从心。

只好求助于在书中出现过名字的熟悉或陌生的朋友，他们的文字或独白，被我编排在一起，构成了这本书的脉络。

陈晓青、罗文光、王威、黄文胜、刘远志、郑耀贤、江冠宇、孙达成、周明……仍然是“安子信箱秘书处”的朋友，我至爱的先生客人一起对这本书倾注了关心与智慧。

只是想，本书作为一个经验事实，能为社会各届人士垂注深圳打工一族提供一份研究文本。

是为跋。

1993年4月14日

于深圳通心岭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I5MDQwMTk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904019.zip",  
  "filesize": 52353387,  
  "md5": "7782ba28ecd1f0d7bcd851af22017e7e",  
  "header_md5": "87098425d393c18f6c091fbe34af2107",  
  "sha1": "e1be5e8d34ffa293e8cec147855d2ee86651aed5",  
  "sha256": "d8f4e77eb014aa090981a240b8b3757e17c41f9cb25e6b5dc9a49e81844d995b",  
  "crc32": 2717133770,  
  "zip_password": "6622Ee",  
  "uncompressed_size": 52264581,  
  "pdg_dir_name": "12904019_\u255a\u2566\u2568\u2558\u2561\u2500\u2502\u00bc\u2558\u255c  
100\u2550\u2265\u2534\u2518\u2563\u00f1\u2524\u2264\u2554\u00bf\u251c\u03a6_p220",  
  "pdg_main_pages_found": 220,  
  "pdg_main_pages_max": 220,  
  "total_pages": 228,  
  "total_pixels": 68489844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